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
40
辑

湖南文史

周谷城题

湖南文史杂志社

湖南文史 HUNAN WENSHI 第40辑

编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编/田伏隆

副主编/丁江 高原

责任编辑/朴永子

出版/湖南文史杂志社(长沙市迎宾路15号)

发行/湖南文史杂志社发行部

印刷/湖南省政协机关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长广准字第0152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7 字数168,000

版次/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长沙第1次印刷

国内统一刊号/CN43—1175

定价/2.50元

● 顾 问 李炎巨 吴立民
李 鳌 林增平
刘晴波
● 主 编 田伏隆
● 副 主 编 丁 江 高 原
● 责任编辑 朴永子

湖南文史

19490

目 录

(总第40辑)

·毛泽东与民主人士·

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与周世钊的交往…………… 陈明新 (1)

- | | |
|---------------|--------------|
| 一、周世钊先生简介 | 十一、草台班子的戏也要唱 |
| 二、建国后第一次见面 | 十二、平调风要不得 |
| 三、消费可以促进生产 | 十三、照顾老人 |
| 四、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 十四、后门风有两三尺宽 |
| 五、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 | 十五、蒋介石还要听我调查 |
| 六、夜间工作的习惯能否改变 | 十六、到延安等地参观学习 |
| 七、当领袖很不自由 | 十七、光是有际的 |
| 八、思想问题是打不通的 | 十八、他们是要我站岗 |
| 九、我是有职无权 | 十九、周总理对毛主席最忠 |
| 十、游泳能锻炼人的意志 | 二十、两边都是革命群众 |

·烽火忆往·

第十八军第十一师湘阴受降记…………… 杨伯涛 (47)

最后一战——无条件投降——第十八军第十一师湘阴受降
——集结湘阴的日军概况——受降仪式——解除日军武装实
施概况——胜利完成受降任务——美军联络官参加受降——
咸宁遣俘

回忆军事委员会战干团女生大队…………… 顾群英 (62)

在战干团女生大队军训和学习的经过——在新生活运动总会
妇女指导委员会妇干班受训和实习

· 湘 籍 文 化 名 人 ·

忆欧阳敏讷…………… 刘乐扬 (69)

女教育家书法家周昭怡传略…………… 王 俞 (78)

官宦世家 书香门第——敦品力学 名列前茅——校园新秀

“颜公”书徒——侧身天地 锋芒初露——桃李园丁 民主校

长——赤子丹心 疾风劲草——书苑女杰 为霞满天

情交戏艺 缘结须生…………… 刘春泉 口述 (91)

——我的艺术生涯五十年

一、生为流浪女 他乡作故乡

二、迫于生活 严父无奈授艺 不谙世事 幼女痴心学戏

三、走村串巷百般苦 登台卖艺六岁红

四、酸甜苦辣 尝尽苦中苦 生旦净丑艺出百家师

五、湘赣往复少安宁 舞台上下多是非

六、旧艺人得见天日 为艺术为真理衣带渐宽 万死不悔

新社会虽遭波折 对别人对自己坦诚作人 此生无愧

七、要生存要发展冀湘剧老树吐花 不泥古不守旧求唱腔旧调翻新

八、惜取夕阳无限好 何须惆怅近黄昏

· 三 湘 人 物 ·

长沙影珠山下三怪人…………… 朱茂怡 (111)

一、李承干——二、杨宣诚——三、郭之奇

包凯传略·····	熊志翔(123)
邹永成事略·····	焦传爱(128)

· 回 顾 湖 南 解 放 ·

参加湖南和平起义活动忆略·····	欧阳敏讷(130)
-------------------	-----------

程颂公义举——李默庵倒戈——鹤鸣公赴港——黎明前流亡

我参加合作小组与和平起义前后·····	苏琢如(139)
杨光耀湘西起义记·····	汤健民(147)
胡风璋“投降”的前前后后·····	黄由亮 何大鹏(155)

· 金 融 史 话 ·

湖南省银行始末·····	陈 纪口述(158)
--------------	------------

省银行成立前的湖南金融概况——成立初期的省银行(1928—1935)——抗战时期省银行的悲惨遭遇——“护行保产”——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体制——日益完善的人事制度

· 中 统 军 统 史 料 ·

军统特务破译密码的人和事·····	陈 达(166)
-------------------	----------

我的特务生涯·····	刘峻德 口述(171)
-------------	-------------

· 我是怎样进入特务组织的——赢得蒋介石的青睐——隐藏在心底的不满情绪——彼岸向我慢慢靠近——终于冲出了漩涡

· 往 事 钩 沉 ·

- 回忆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扶 屏 口述(180)
- 入狱——囚徒——斗争——出狱

· 建 国 后 史 料 ·

- 零陵大火前前后后……………陈雁谷(194)
- 匪徒活动——坚决镇压——重振家园
- 财会人才的摇篮……………龚业隆(203)
- 记湖南中山财经专科学校

· 社 会 生 活 ·

- 晃县“同善社”的来龙去脉……………张朝玉(209)

订正 · 补充 · 质疑

- 对文士员的《近代中国新化邹氏地学与武昌亚新地学
- 社》的订正与补充……………邹兴辟(212)
- 对曾伯贤的《我所知道的克强学院》的订正……唐徒春(215)

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与周世钊的交往

陈明新*

我于1958年10月至1976年4月，任周世钊同志的秘书共18年。“文化大革命”以后，1969年4月河西第九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结束时，军宣队和工宣队原先决定派我到韶山陈列馆工作。后来他们知道我和周世钊的关系后，将我改派到省革委生产指挥组政工组工作。省革委生产指挥组政工组的领导明确向我交代，只要周世钊同志工作需要你，你就陪他去，只要讲一声，不必办什么请假手续。他们又对我说，你名义上在生产指挥组政工组工作，但你实际上仍然是周世钊同志的秘书。1973年4月，组织上把我从省革委生产指挥组政工组调往省革委政工组统战组，我又名副其实是周世钊的秘书了。在这18年的时间里，对于毛主席和周世钊之间的交往有些了解，现就我记忆所及，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

毛主席和周世钊相识于1913年春天，他们两人都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的学生。在第一师范他们同班读书五年半。他们两人既是同班同学，又是同在一个寝室睡觉。1918年夏从第一师范毕业后，他们两人又在长沙市修业小学共过事。因而他们之间关系密切，感情也好。建国后周世钊到北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他会议到京时，不论工作怎么繁忙，毛主席总要设法抽时间约他见面叙议一次。每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快要闭幕时，周世钊就给毛主席去信。一般是去信后三四天，毛主席就来电话约他去见面。因此周世钊给毛主席去信以后，每天上午8时至下午6时，什么会议我都不去参加，我就在房内等候中央办公厅的来电。可是1962年周世钊从北京前门饭店624号房间给毛主席发出信已有一个星期，中央办公厅还没有来电话。周世钊责怪我是外出失职没

* 陈明新曾任周世钊秘书多年，现任湖南省政协办公厅老干办主任

有守候电话，没有接到中央办公厅约他去见毛主席的电话。我怎么向他反映情况，他也不肯信，他总是对我发脾气。后来闭会时，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三千多人集中在中南海怀仁堂照像。快要照像了，毛主席对工作人员说，请大家等一下，我要约个朋友先谈谈话。他们两人在一间房里坐下后，毛主席对周世钊说：惇元兄，你从前门饭店寄给我的信我收到了。这几天因为我工作很忙，没有单独请你到舍下见面，很抱歉。今天我们两人就在这里谈谈，然后我们一起去照像。他们两人谈完话照完像后，周世钊对我说：老陈啊，毛主席给你平反了。不是你外出失职没有接到中央办公厅约我去见毛主席的电话，而是毛主席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约我到他家见面，所以中央办公厅没来过电话。我错怪你了，很对不起，请你原谅。现在我就毛主席和周世钊之间交往中的有关诸情况，分二十个问题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周世钊先生简介

周世钊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和著名的教育家，字惇元，号东园。1897年农历二月初十，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区东湖塘麻山石子冲一个农民的家庭里，1976年4月20日在长沙逝世。1913年春，周世钊被宁乡县选送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入预科第一班。1914年春天，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周世钊成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入第八班，他与毛泽东同编在一个班上。周世钊和毛泽东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两人同在一个班上读书，同在一间寝室睡觉，在第一师范学校度过了五个春秋。周世钊在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曾任学校文学部部长，首批参加“新民学会”。他政治上倾向进步，同情革命运动。青年时期的周世钊热爱教育，立志从事教育事业，期望“教育成名”，主张“教育救国”，用“教育改造社会”。1918年从第一师范毕业后，他曾在长沙市修业小学教书。1921年秋，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学习教育和文学。他在南京东南大学毕业返湘后，长期在长沙从事教育工作。开始在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教书，继任《南岳日报》主编，并兼任当时省立高级中学和初级中学的国文教师。长沙“马日事变”以后，他离开《南岳日报》，先后在长沙明德中学、省立二中、长

郡中学、周南女子中学、第一师范学校、长沙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师。“七·七”事变以后，他至湖南蓝田，在周南女子中学教课，并任教务主任。1946年1月，随周南女子中学迁回长沙。先后在周南女子中学、明德中学、妙高峰中学、第一师范学校任教。

建国以后，周世钊历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代理校长、校长、名誉校长、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湖南省文教委员会委员、长沙市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省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副省长、中国民主同盟湖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二、建国后第一次见面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胜利，湖南的和平解放，全国大部地方的军事占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产生……对于这些捷报的传来，周世钊表示由衷的高兴。他从内心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搞好学校教育工作，为新中国培养更多更好的、又红又专的各种各样有用的人材。他欢呼，他高兴。他发电报给毛主席表示祝贺。他曾于1949年9月28日写了一封长信寄给毛主席，毛主席于1949年10月15日复信给周世钊说：惇元学长兄，迭接电示，又得9月28日长书，勤勤恳恳，如见故人。延安曾接大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城南学社诸友来电亦已收到，请兄转告他们，感谢他们的好意。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但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陈泽同先生的意见书已收阅，当交此间工业机关研究，请兄为我代致谢意。他的工作问题请告他直接向湖南当局要求解决，不要等候我的

答复。谨此奉复。敬颂 教祺 毛泽东。

1950年9月，毛主席请他的亲戚张森洪同志顺返湘省亲之便，嘱她便道约王季范和周世钊赴京参加国庆观礼。但在这时，王季范已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先期入京。因而张森洪于9月28日只偕周世钊乘车北上。

周世钊说：我到北京后，张森洪把我安排住在西柳井惠中饭店。10月1日上午9时，我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了1950年的国庆观礼。10月5日下午，在中南海毛主席家的客厅里，我见到了多年未见的毛主席。这是毛主席和我解放后的第一次见面。我和他握手寒暄之后，毛主席问我来北京会见了哪些人？我向毛主席汇报来京后看望了徐特老、谢觉老、熊瑾老、王季老。毛主席即嘱他的秘书电话约他们几位老人到家来叙谈。并对我说，他们还有来，我们到外边走一走何如？随即准备了两辆汽车。一辆是毛主席坐的，一辆是警卫人员坐的。我和毛主席同坐在一辆车上。汽车开到景山公园，毛主席和我刚下车步行约二十步，警卫人员走到毛主席面前对毛主席说，今天园里游人太多，不便久留，请主席上车。毛主席一面上车，一面说今天游不成了，回去吧！在回途的车上，我问毛主席，您是什么时候胖起来的？毛主席说在长沙常常东跑西跑，在江西和长征时期，常常骑马打仗，活动多，胖不起来。在延安十多年，坐窑洞，写文章，骑马打仗的机会不多了，我就慢慢地胖起来了。我又问毛主席，我看到您对一些熟人的信件，都是亲自动笔答复，为什么不叫秘书代劳呢？毛主席说，秘书不了解那些人的情况，不知怎样下笔，必须经过我详细告诉他，他才能写，不如我自己提笔写几句还省事得多。我和毛主席回到中南海，已经是傍晚的时间了。几位老人都已到齐，同进晚餐后，我们就在毛主席家的客厅里谈话。见到毛主席以后，我的住处作了变动，由惠中饭店搬到北京饭店和王季老同住隔壁。10月7日，毛主席在参加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纪念招待会后，来到我的住房，王季老也由隔壁房来见毛主席。我和王季老向毛主席表示，像我们这种对革命没有贡献的人，住在这样高级的招待所，实在感到惭愧和不安。毛主席说，你们过去搞了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就算是有益的贡献嘛！毛主席问我们两人，你们过去参加什么民主党派吗？王季老回答说，没有。我说我对民主党派不感兴趣，我不

愿加入。毛主席说，现在全国解放不久，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和农村发展党员采取慎重的态度，吸收党员比较少，你们最好先参加一个民主党派。民主同盟是知识分子的组织，你们参加民盟好了。我们问毛主席，现在全国大陆已经解放了，台湾什么时候才能解决？毛主席说，台湾也会要解决的，但要时间。因为解放台湾必须要有海军，没有海军是不行的。等我们的海军强盛起来以后，台湾问题终究是要解决的。祖国会统一，台湾要解放，这是我们的决心，请你们放心好了。但是台湾问题到底在那一天、在什么时候会解决，现在很难说死（“文化大革命”以后，1972年10月，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王季范和周世钊时，王季范老人对解决台湾问题极为关心，他又问毛主席说，主席，台湾问题您还不下决心解决，您要拖到什么对候啊？毛主席说，会要解决的，但还要等一下。王季范老人又问毛主席说，还要等好久？毛主席说，还要等两年）。老实说全国解放得这样快，这是我们所预想不到的事。当我们的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已经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要渡江南进的时候，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摆出了一种和平的架势，他搞求和缓兵之计，企图保存他的反革命的残余势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当时我们革命队伍中的有些好心人和一些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害怕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抱同情态度。他们劝我们接受南京政府的和平要求。他们说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穷寇，按孙子兵法，穷寇勿近。他们说如果革命再继续前进，就会引起美国的干涉，这时斯大林同志也劝我们划江为界，南北分治。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听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因为如果我这样做了，第一是对不起我们现在的人民，第二是对不起死了的皇帝秦始皇。所以除于1948年12月我为新华社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外，我还写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诗，以鼓励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猛追穷寇，彻底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湖南是和平解放的，程潜的湖南和平起义，湖南问题的和平解决，对于两广，对于整个大西南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在这一点上，程颂公的和平起义是有功的啊！所以程潜到北京时，我是亲自到北京车站去接他啊！为了照顾他部下有关人员的生活困难，除了给程颂公本人工资外，我还亲自批准每月再给他特别办公费5000万元（当时五千万元就是现在的五千元）。陈明仁和程潜一样，对湖南的和平解放也是有贡献的人。

员之一。陈明仁这位将军很会打仗，很能打仗。他守四平我们就有打得开啊！问题是他的枪口对错了，他不该把枪口对向人民。现在他把枪口调过头来，他现在不是把枪口对向人民，而是把枪口对准了国民党反动派，这就对了。他要求仍然带兵打仗，好嘛！我们就给他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五军的军长，请他守南大门，这不很好吗！

王季范和周世钊商定，向毛主席提出到东北参观的请求，毛主席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并对他们说：你们从张家口、大同、太原、石家庄、保定回到北京。这样兜一个圈子多看些地方。你们这次走的地方，还不太安静，我可以派几个警卫人员同去。周世钊说：我们这些穿绿长褂子的教书匠，要什么警卫呢？毛主席说：你们从北京饭店出发，别人怎么会知道你们是穿绿长褂子的呢！非派警卫跟随不行。

周世钊从东北参观返回北京之后不久，就返回了长沙。回长沙时，毛主席送了周世钊狐皮大衣一件，中山服一套，内衣内裤各一件，皮鞋一双，袜子一双，床上被盖一套，脸盆一个。

三、消费可以促进生产

1950年9月，周世钊到华北参观之前，毛主席和他谈到华北一些地区人民生活的改善情况时说：华北地区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面，华北很多地区人民生活很苦，常常是缺衣少食的，‘榆叶半年粮’已成为惯例。现在解放才两三年，农民分了田地，绝大多数的人已经过着饱食暖衣的生活了。一些农家妇女，过去终年不用肥皂，现在要买肥皂了；过去洗脸不用毛巾，现在她们要买毛巾了；过去她们只在水缸里照照自己的容颜，现在她们要买背面嵌有梅兰芳戏装照片的镜子了。有一些农村干部批评她们是吃不得饱饭，刚刚翻了身，就这样浪费。这些干部的看法实在是错误的。用用肥皂、毛巾和镜子，可说是农民起码的生活要求，怎么算浪费呢？并且她们这样做，还可以刺激生产嘛！同样分了田地，勤劳耕种的人家就有余钱剩米去买自己想买东西。耕种不力的人家，是想买也没有办法。对比起来，不是可以刺激生产的积极性吗？有人主张禁止一些地方的跳舞场，我看不必那样的性急。一些有钱的阔人，要他们去做公益的事，他们每每一毫不拔。让他们到跳舞场去跳出

几个钱来供大家使用，不也是一件好事吗？天津市有一个呢织厂的厂长来北京开会，他不肯穿自己厂里的呢料衣服，临时新制做了一身布衣，以示朴素。我看这是虚伪的作法，也是大可不必的作法。我认为当着大家生活还困难的时候，你一个人特殊阔绰奢侈，那是错误的，甚至是罪过；但是，当着大家生活已经富裕，你个人特别装穷，过分俭薄，也未尝不是错误的行为。

毛主席的这些话是五十年代初期说的，但对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我认为仍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四、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1957年7月，周世钊到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学院开学后不久在7月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毛主席约周世钊和蒋竹如（蒋也是毛主席的同班老同学）到中南海。他们两人到了毛主席家里，毛主席询问了学院的教学情况之后，谈到了自学的重要性。毛主席并介绍了他十九岁时在湖南图书馆学习的经验。毛主席说：那是1912年，我从湖南公立高级中学自动退学后，寄居在湘乡驻省中学学生宿舍，我每天到二里之外的湖南图书馆去看书。中午为了节省时间，不回宿舍，买两个烧饼吃了就算解决午餐问题。我在图书馆从早到晚，没有什么休息。下雨下雪的日子，也照样前往，从未间断过。当时我是十九岁。十九岁的青年，应该说是读了很多书，但我那时读的书不多。我在图书馆借了一些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穆勒名学》、《原富》、《法意》、《社会通论》以及西洋历史和小说等，我觉得每读一书，都有新的收获，得到新的启发，越读越觉得不肯放弃，因此我就忘了疲倦和饥饿。一天只有中午吃烧饼的时间，是唯一的休息时间。因此，半年的时间不算长，而我在知识上的收获却不小。

毛主席说：但是，我最大的收获还不在这里。我在湖南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大地图。看了世界大地图以后，我才知道世界原来有这么大。在这以前，世界究竟有多大，我是不太明确的。当时，我认为我们湘潭县不算小，湖南省就更大，全中国古称天下，更是大得不得了。那天，我在世界大地图上一看，看见我们中国只占世界的一部分，小了，湖南

就更小了，我们湘潭县和韶山冲更是没有影子了。世界真大呀！当时我想，世界既大，人就会很多。每一个人都要生活，既要过物质生活，还要过文化生活。据我看，一般人的生活应该是过得幸福的，但在我们韶山、湘潭和长沙，我所看到的广大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缺衣少食，挨冻挨饿，目不识丁，做一世文盲，还常常被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勒索催逼，被卖被杀戮。为什么广大人民的生活过得这样痛苦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只是由于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缘故。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肯定是要改变的。总有一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会变成合理的社会制度，广大人民痛苦的生活会变成幸福的生活。因此，我感到我们青年的责任极其重大，青年人的前途极其广阔。因为要改变社会制度就要革命，革命就要靠青年。我想到这里，当时就下了这样的决心：我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所以，这回我在湖南图书馆的半年，是我读书历史上值得纪念的半年。

五、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

周世钊说，我是个教书先生，解放前在长沙教了几十年的书。解放后共产党安排我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这是党对我的信任。为了提高我的政治觉悟，为了使我的工作搞得更好，1951年秋天，党把我和湖南几个办教育的同志调去北京学习。在我们的学习期间，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毛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他的住所的一个会客厅里，接见了我们湖南几个在北京学习的老朋友。我们大家把准备要向毛主席陈述的话讲完之后，又向他汇报了湖南过去一位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女同志，因为身体瘦弱，疾病纠缠，目前参加工作和学习都有很多困难，闷守在家里。她自己感到处在新时代，不能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怀着掉队、落后的苦闷时，毛主席对她表示十分惋惜，并且对我们说：这是因为她不注意体育运动的结果。你们几个人都是干教育工作的人。你们应该把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你们必须记住，一个有志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必须注意锻炼身体，使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才能担负起艰巨复杂的革命工作。不锻炼身体的人，就不能干好革命。你们不是读过《红楼梦》这部书吗？《红楼梦》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贾宝玉，

一个是林黛玉。依我看来，这两个人都不高明，都不能革命。贾宝玉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料理，饮食起居要别人照顾，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这种全不肯劳动的公子哥儿，他无论如何是不能革命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好哭脸，她体弱、多病，她只好住在潇湘馆里去吐血、闹肺病，她又怎么能革命呢？说到这里，毛主席用手指着他院子里的树木和花草对我们说，你们看，院中的花草原来长得很好，因为昨夜下了一场大雨，花草遭受了几个钟头的风吹雨打，就差不多全部凋零了。但是，院中的树木却不怕风雨的侵袭，依然是枝强叶壮，苍翠可爱。在我们今天的新社会里，我们能需要像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的青年吗？我们不要。我们今天需要的青年应该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有坚强革命意志的青年。我们今天的青年学生应该是既有文化、又会劳动，既会动脑，又会用手，既能文、又能武的全面发展的新人。我希望我们的青年学生，男的就不要学贾宝玉，女的就不要学林黛玉。我希望我们的青年学生，都要学树木的坚强，不要学花草的脆弱。你们在座的几位，都是办教育的人，我希望你们要特别注意，你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男学生培养成为贾宝玉，把我们的女学生培养成为林黛玉。我们不要这样的青年。

六、夜间工作的习惯能否改变

1950年10月上旬的一天。毛主席约王季范和周世钊到他家中座客，吃过晚饭在客厅里谈话时，周世钊说：主席，您晚上通夜工作的习惯是不是对身体有妨害，是不是考虑可以改变？毛主席说：我这种生活和工作习惯养成已久了。不是我喜欢晚睡，也不是我爱夜间工作，是形势所驱，事实所迫，不得不如此的。我们在延安的时候，抗日战争正在华北各地开展，那时战场很多。各个战场上汇报请示的电报都在晚上到达延安总部。这些电报有要求指示的、有要求供给物资的。当时我们物质条件差，接了这些电报后，我们不能把它搁置到第二天，必须即刻研究回答。对于这些电报的回答，有的要找人商量，有的要开会讨论研究，等开会讨论研究的结果出来以后，我们又要将开会商讨的结果电报回答。这些工作任务完成以后，常常就已经到了天亮了。久而久之，我们

大家就索性通夜工作，天亮以后才收拾睡觉。进城到了北京以后，情况虽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党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重要文件要送我们审批的也多半是下午送来，我们也只好把它放在晚上办，所以晚睡的习惯仍然没有多大改变。事实需要，不得不如此。周世钊说：您通夜工作，但要找人商量，找人开会，别人怎么办？毛主席回答说：他们也好只好不睡。像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同志等都成了夜里不睡觉的同志。周世钊又问：其他的工作人员怎么办呢？毛主席说：那好办。他们轮流换班服务就是了。江青说：只有我，常常是奉陪到底。毛主席说：我们把延安的这种习惯带进了城，带到了北京。现在我想改也不好改了。我们这种生活和工作习惯我不希望别人学，但我也也不想改，因为夜间工作安静些，对工作有好处，尤其是对写东西有好处。所以就是别人有意见，我也不会改了。

周世钊说：关于毛主席通夜工作的问题，除了1950年10月那次谈话时谈到这个问题外，在六十年代的一次谈话中，我又从关心他的身体出发，再次建议他改变这种生活和工作习惯，毛主席仍坚持己见，并且对我说：你不要认为我们在延安的时候总是天天紧张，时时紧张。我们也有娱乐的时候。我们在延安的十多年时间里，在工作之余，有的时候晚上我们也举行舞会，我们也去跳跳舞。这就叫做革命的乐观主义。那时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同志也喜欢跳舞。但是我那位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很不喜欢。她对我跳舞这件事很不感冒，很讨厌。我和她常常为这件事闹意见，吵架。跳舞有什么跳不得啊！跳舞尤其是跳交际舞，这是高级娱乐。跳舞起码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通过跳舞，活动全身，起了锻炼身体的作用。这就是说跳舞对身体有好处，尤其上了年纪的人跳交际舞确实对身体更为有益；第二可以通过跳舞结识一些朋友，交换一些有益的情况，所以才叫做交际舞嘛！当然跳舞要有些规矩，要有些纪律，弄得不好也会出乱子。但只要做好工作，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贺子珍同志就是对这些不理解，一味的对我跳舞有意见。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主席嘛，我和恩来同志他们这些人去跳舞，自然来请我们跳舞的女同志就会多，跳交际舞两个男的，两个女的一起跳也可以，但那不好看，这叫做不合舞规。但贺子珍同志看了我和女同志跳舞，她就很有意见，经常为这事找我闹。然而闹来闹去，影响到工作，最后经过中

央同意，就这样我和贺子珍同志离了婚。周世钊说：听说江青同志过去是搞文艺的，是个电影演员，您是怎么和她认识的啊！毛主席笑着说：说来很有意思。有一次我在延安作关于矛盾论的讲话，她可能在场听了我的讲话。就在我作完关于矛盾论讲话的第二天，不知是通过谁的介绍，她一个人冒里冒失地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请她坐下后她就对我说，主席，昨天听了您关于矛盾论问题的报告，很受教育，很得益处，很有启发。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不过我有个问题今天想请示一下主席，请主席答复。我说有什么问题你就提吧！江青对我说，有两个人同时住在一间房子里。一个人身体特别好，一个人身体特别差。身体好的这个人要求时时刻刻打开房里的窗户，流通空气。因为只有打开窗户，空气流通，他才不致于得病，否则就会得大病。但是身体差的这个人又要一天到晚关上窗户。因为他身体特别差，吹不得一点风，如果一打开窗户，一吹风他就会得大病。就是这么一对矛盾，请问主席您如何解决？我当时对她说，你太天真了。以后江青就经常到我这里来，我和她的关系就这样好起来了。有天晚上我们开会，我记得是开到半夜十二点半钟，恩来同志突然对我说，主席请您出去一下，我们要讨论研究一个问题。既然恩来同志临时有事要我退出会场，我就只好走出会场在另外一间房子看书看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讨论研究我和江青的婚姻问题。据我所知在中央讨论研究我和江青婚姻问题时，意见也不太一致，我就知道恩来同志明确表示不同意，但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结果中央还是同意我和江青的婚姻，这样我就在延安和江青结了婚。

七、当领袖很不自由

有一次毛主席约见周世钊，周世钊问毛主席：主席，您工作这样繁忙，您还得空到外边走走不啦！毛主席说：我们刚刚进城的时候，那时我比较自由。有时我也一个人到街上走一走，有时我还到馆子里去吃点东西。在我们进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只要有空，我就一个人跑到黎锦熙先生家里去聊天。黎锦熙先生是一位很有学问的教授。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文字学家。我很佩服他。因此我很喜欢和他聊天。因为和他聊天能得到有益的收获。有一次我正在黎锦熙先

生家里和他聊天，机关里有事要找我。他们到处找我找不到。后来有人估计我很可能是到了黎锦熙先生家里，于是乎他们就派车派人到黎锦熙先生家里来找我。他们居然在黎锦熙先生家里找到了我。我同他们一起回去后，警卫人员对我提出了批评。他们说，主席您今天这样一个人出去是很危险的。因为当前阶级斗争的情况很复杂，阶级敌人时刻在想方设法破坏我们的事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他们进攻的主要对象。您是人民的领袖，人民给了我们保卫的权利，人民要我们负责保卫您的安全。今天在没有找到您之前，我们警卫人员个个心里都很不安。以后您再也不能一个人随便出去，出了事可了不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请主席服从我们的安排。他们这些意见对不对？他们的这些意见当然是对的。因此，我就没有不接受他们对我的批评的道理，也没有不服从他们的安排的理由。我只好对他们说，接受你们对我的批评，服从你们的安排，初犯不追，下不为例，以后我改就是的。我的这几句话逗得警卫人员个个哈哈大笑。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一个人到黎锦熙先生家里去聊天了。所以我说当领袖是很不自由的啊！

八、思想问题是打不通的

1958年7月，周世钊当选为湖南省人民委员会的副省长。受任新职，思绪万千，他于10月17日致函毛主席，陈述心事。10月25日，毛主席复函周世钊，信的第一段说，赐书收到，十月十七日的信，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实事，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字，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闻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

点醋而已。刚刚上任省人委副省长三个月的周世钊，接到毛主席给他的这封来信，深有感慨地说：毛主席的这封信，给了我精神上极大的鼓舞，工作上极大的帮助。

1959年，周世钊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毛主席约他到中南海家中见面叙谈。周世钊到了毛主席家中同他握手问好后，毛主席向他说：惇元兄啊，你现在是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堂堂的副省长了，我祝贺你啊！你现在分管什么工作啊？工作好搞吗？顺利吗？有什么困难啊！周世钊回答说：我主要是做民主党派的工作，具体是做民盟的工作。1950年10月，主席曾指示王季老和我，叫我们两人都参加民主党派，我按照主席的指示办，现在我早就是民主党派的成员了。我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后来我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会的组织。因为民盟的成员大都是在教育界，而且绝大多数又都是大学教师、大学教授，也有少量的中小学教师。我做民主党派的工作，又不得不联系教育工作，所以省人委就分给我管教育工作。毛主席说：教育工作是个很重要的工作。湖南省人委要你管教育工作，这是共产党对你的重视啊！你要好好的工作啊！周世钊说：省人委要我管教育工作，我知道这是共产党对我的信任，我也深知我的责任重大。但是工作不好开展，困难很多。首先是个思想问题。我刚才讲了，民盟的成员大都在大学，而且他们又大都是大学教授。我自己又不是大学教授，我怎么去管他们，我怎么去工作呢？再说经过这次整风反右运动以后，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因为他们都吸取了整风反右祸从口出的经验，有些人明明晓得他有思想问题，我去找他谈，他就是不肯讲。思想问题真是难得打通啊！毛主席听了周世钊的汇报后笑着说：思想问题能打得通吗？思想问题是打不通的。思想问题你越打，他越不通。思想问题只能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才能解决问题；思想问题只能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以理服人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如果你抱着对某某人打通思想的态度去做某某人的思想工作，我可以肯定地说，你越打，他越不通。不信你就去试试看。就拿你自己来说吧，你刚才不是说你不是大学教授，因而你就不敢去做大学教授的思想工作。这就是你的思想问题，对不对？如果我抱着打通你的思想问题的态度，去做你的思想工作，我就会对你说，这是组织给你的任务，你必须完成，你应该去完成，你必须去做好，你应该

去做好。但是这样非但没有解决你的思想问题，反而增加了你对问题的反感，你说对不对？但是如果跟你过细分析一下现状，你就会知道，一方面你虽然不是大学教授，但是按照你的资历，按照你的本领来说，我看你完全够得上一个文学方面的教授，只是因为你长期在中学任教，中学没有教授这个职称罢了。这就是说，你去做大学教授的工作，完全具备了兵对兵，将对将的条件了。所以湖南省人委分给你管教育工作，这不仅是对你的信任，而且是对你的重用。他们相信你有能力有资格做好这份工作。再说你必须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经过整风反右以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实践中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别无他路可走。你去做大学教授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派你去做的，又不是你自己要去的。他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我想他们就一定会拥护你去做他们的工作的，他们也会欢迎你去和他们交朋友，欢迎你去和他们谈话。你在和大学教授们做思想工作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怎样看一个人。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方法问题。我认为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不是反革命分子，都有其优点和缺点。一般说来，每个人的优点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只不过是程度不同罢了。任何一个人，自从他怀胎以后，直到他死后，都有其优点和缺点。一个人在他娘肚里怀胎以后，他们的父母因为有了一个小宝宝，感到高兴，感到自豪。他给了他的父母精神上的鼓舞，无疑也会对他们的父母工作上带来好处，这就是一个人怀胎后的优点。但是，一个人怀胎后也会给他的母亲带来这样那样的不舒服，这就是未出生胎儿的缺点。一个人到了老了死后，也还有其优点和缺点。其优点是后人可以用前辈人的优良传统，用他们的好思想和好作风来教育后代好好学习，好好工作，这就是老人死后的优点所在。但是，一个人死后，如果他要安葬的话，他就要占用一块土地，如果是火化了的话，他也要占用一小块地方来安放骨灰，这就是人死后的缺点。我们在看任何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他的优点，不要先看他的缺点。因为一个人，尤其是那些缺点多一点的人，如果不是先看他的优点，而是先看他的缺点，那他简直像个反革命。这种看人的方法错了。如果抱着这种态度和方法去做人的思想工作，当然也是错误的。因而也不会有好的效果。所以我认为，你

到大学里去找大学教授们做思想工作的时候，你要事先调查一下，某位教授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在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你在和教授们谈话时，要先看他的优点，而且还要多看他的优点，肯定他的优点。你到他的单位，甚至到他的家里和他谈话，你多讲他的优点，他就自然会讲自己的缺点，他就必然会说自己不足的地方。这样你就可以因势利导，鼓励他发扬优点，克服缺点。这样你的工作就好做了。所以，我相信只要你方法对头，敢于工作，善于工作，你的工作一定会有成效的。听了毛主席这番话，周世钊很是高兴。据他自己说，毛主席这次跟他的谈话，对他做好教育工作和民主党派的工作，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九、我是有职无权

六十年代初期，有一次周世钊到北京去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约见了周世钊。这次谈话重点是谈民主党派的问题。毛主席对他说：“民主党派的工作也是党的工作。你做好了民主党派的工作，就算是完成了党交给你的光荣任务。民主党派的成员，尤其民盟、民进、农工、九三学社的成员，大都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专家学者。他们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只要我们做好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将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民革的成员，大部分是旧军政人员，也有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他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会作出贡献。将来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时，他们更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会作出很大的贡献。民建、工商两会的成员，主要是过去工商界的人士，也有在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他们对于如何搞好经济建设，尤其是对于如何搞好企业的经营管理很有经验。他们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会作出很大的贡献。民革、民盟、民建、农工、民进、九三、工商联这几个民主党派，在全国各个省市都有他们的组织，还有台盟和致公党，成员不太多，只有在北京和全国大一点的城市才有他们的组织。他们的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主要是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他们都是爱国的，他们对我国的建设事业，也会作出积极的贡献。全国所有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合起来一共有多少呢？一共有十万多一点。经过整风反右以后少了一点。中央统战部的负责人会找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商

量，打算在适当的时候，在他们各自联系的群众中再发展一点，还发展到十万多一点。因为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成员一共有十万多，这是国际上知道的。少了对国际的影响不好，所以要再发展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友好关系，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但是必须明确，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执政的党，各个民主党派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前提。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周世钊问，您这个长期共存要长到什么时候啊！毛主席接着说，所谓长期共存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不是在同一个人时候产生的，但要在同一个人时候消亡。你学过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政党、阶级的论述吗？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将来全世界都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世界大同以后，国家就会自然而然地消亡了。国家消亡以后，政党也就自然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了。到了那个时候，共产党消亡了，各个民主党派自然也就会消亡了。长就长到这个时候。所以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生命是：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所以我说做民主党派的工作是光荣的，民主党派的工作是大有可为的。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但又是一个很穷的国家。穷固然不好，但也有好的一面。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嘛！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上下，团结一致，依靠我们的力量，推翻了三座大山，打垮了蒋家王朝，消灭了国民党八百万反动军队。1949年10月1日，在我们开国典礼的时候，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各族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既然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就要站好，我们就要永远站下去。我深信我们中国人民，包括各个民主党派的成员在内，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加上国际的援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也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国家治理好。我们能够打天下，我们也就能够治理天下。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有骨气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爱国的。只要我们把各个方面的工作搞好，依靠中国的工农大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我深信我国人民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但是，我们的国家底子薄，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的确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首先大家要虚心学习。向书本学习，向行家学习，向一切有经验的人学习。

只要对我们的国家建设事业有利，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经验，我们也应该学。我过去跟你讲过，你是一位没有戴帽的文学教授，你也是专家。你在南京东南大学毕业后，教了几十年的书，而且教得很好，很有文才，你不算教授算什么啊！不过教授也好，专家也好，都有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不管什么人，只有虚心学习，才有进步。你是湖南的副省长，又是湖南省一个民主党派的头头，你主管湖南省的教育工作，兼做民主党派的工作，你也要好好学习，才能不断进步，才能把工作搞好。希望你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认真学习党的有关文件，尽职尽责，把工作搞得更好。周世钊说：我们这次开民主党派的会议，实际上也是一次学习的会议。是一次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会议。我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我主要就是做点民主党派的工作。别的工作我就不管了。不是我不管，而是我无权管。我们这些党外人士安排为副省长是配像的，是做样子给人家看的。我是有职无权。我名义上是个副省长，分给我管教育工作，实际上我的权就是做民主党派的工作，除此以外别无他权。名义上分给我管教育工作，实际上教育工作的情况我无权过问，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另外您说要搞好工作，要好好学习，要学习新的东西，这当然完全是对的。但是我在家里每天除了做点民主党派的工作外，就是看书看报，什么文件我也看不到，叫我怎么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啊！我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就是从报纸上学，不是从文件上去学，因为我没有文件可看。毛主席说：有这样的事情啊！我设法告诉张平化同志，我叫张平化同志他们以后就教育方面的问题和你多商量。我也叫他们以后要将有关文件送给你看。周世钊这次从北京回来以后的第三天，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的负责同志，就送来了一些党内外文件给他看。几天以后，张平化同志也专程来看望他，鼓励他大胆工作，积极抓工作。从这以后，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文件，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有关文件，都及时送给他看。省教育厅的负责同志也经常来向他汇报和请示工作。周世钊也经常到各地去视察学校。后来省委的有关负责同志，不仅就有关教育工作的事情经常和他商量，而且省委召开有关会议时，也常请他列席会议。当时许多人问我，周世钊是不是已经入党了？那时社会有一种传说，说是周世钊是由毛主席介绍，由中共中央批准直接加入共产党了。当别人问我时，我都回答说：据我所知没有这么一回事。省委请他列席

参加有关会议，我看这是省委对他的尊重。

十、游泳能锻炼人的意志

1955年6月，毛主席来湖南视察工作。毛主席决定到他已经离别三十多年的他青年时期活动过的地方——爱晚亭、白鹤泉、云麓宫、望湘亭等地去看看。周世钊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6月20日毛主席上岳麓山，周世钊也应邀参加了。周世钊回忆陪毛主席参加那次活动时说：我们湖南这个地方，每年六、七月间总是要下大雨、涨大水。而每年的阳历六、七月间，又正是阴历端午节的前后，所以在这个时候涨的大水，我们湖南人把它称做“端午水”。1955年6月的中旬，天天下大雨，所以湘江水猛涨。那个时候长沙市和岳麓山之间的湘江水面要比没有涨水时的水面宽五分之二以上。从岸上看去，只见波澜壮阔，不辨边涯。当时，毛主席要到岳麓山参观，湘江是必经之路，毛主席肯定会下水游泳。于是中共湖南省委的有关负责同志，早就作好了保护毛主席游泳时的一切安全准备和安全措施。果然毛主席提出他就是要到湘江涨水时去游泳。那天是个晴天，上午十点半钟，毛主席从城北码头乘小轮船逆江而上。大家担心毛主席的安全，都想用各种理由来劝阻毛主席不下水。有一位负责同志首先说，主席啊！今天的江水，挟带泥沙，显得不那么清洁，似乎不适合游泳。毛主席马上就回答说，水清水浊，不是决定适不适合游泳的主要条件。你说的这一点，可以不必考虑。当时我也接着对毛主席说，主席，现在湘江水涨，水面又宽又深，游泳也许不便。毛主席马上就对我说，你不要说外行话，庄子不是这样说过吗？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水越深，浮力越大，游泳起来当然就要越便利些，你怎么反说不便呢？小轮船开到猴子石附近以后，毛主席穿上游泳衣，缓步下船，走上木划子。他从容地坐在木划子的边沿上，将两脚伸入水中，用江水将全身弄湿，作好游泳的准备。负责陪同保护毛主席游泳安全的十多个年轻小伙子，早已跳入水中，等到毛主席入水游泳时，他们就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或沉或浮地围绕在毛主席的周围，向西岸前进。这时，我们这些站在小轮船上不会游泳的人，很自然地停止了交谈，个个都聚精会神地看毛主席游泳。毛主席

游到哪里，我们大家的目光就一致地移到哪里。我们只见毛主席在水中时而侧泳，时而仰泳，姿态安闲，显得轻松不费气力。毛主席在游泳时还时常看看两岸的风光，看看天空的云朵。有时毛主席又看看小轮船上他们游泳的人群。小轮船上有的同志问他：主席累了吧？请您上船来休息一会再游吧！毛主席回答说：不累就不要休息，到达对岸才上来。大约经过半个多钟头后，小轮船已经开到了西岸的牌楼口，小轮船上的人群指着还未到岸的游泳人群说：这不是横渡湘江，而是斜渡湘江。斜渡比横渡距离要多一倍，所以花的时间就更多了。不久，毛主席和同游的十多人先后在牌楼口的北面半里的地方登岸。毛主席这次横渡湘江，从下水到登岸，整整用了一个钟头。毛主席穿好衣服后，步行到牌楼口，登上汽车，向岳麓山驶去。我们小轮船上的人群，也同时离船上岸登车，陪同毛主席到岳麓山，这时，大家都流露出愉快的微笑。

周世钊回忆毛主席横渡湘江后没有休息就登岳麓山的情景时说：汽车只能开到白鹤泉，白鹤泉以上，那时通云麓宫的车路没有修好，只能步行向上。毛主席和陪同他的人下车在白鹤泉休息片刻后就往云麓宫直行。中共湖南省委的有关负责同志准备了三台轻便的轿子，是供毛主席、程潜和杨树达先生坐着上山用的。毛主席坚决不肯坐轿，他穿着皮鞋，走在前面，直向云麓宫一步一步地往上走。路上有些小石子，穿皮鞋很不好走，但他却走得很快，气也不喘，他一边往山上走，一边还和陪同他的人谈天笑笑，一直这样登上矗立岳麓山高峰的云麓宫。到了云麓宫后毛主席还不肯坐下休息，他就直接去巡视云麓宫墙壁上挂的诗词和对联，看完后，毛主席又走到宫外的望湘亭，他站在石栏边，眺望美丽如画的桔洲、湘水，当看到长沙市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时，他说，长沙和过去大不相同了。这时毛主席问陪同参观的有关同志说：云麓宫壁间柱上悬挂的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的联语和一雨悬江白，孤城隔岸青的诗句为何不见了？陪同的有关同志告诉他说：岳麓山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火的摧残，解放后才逐步修复，这些东西还来不及恢复原状。下午二点钟，毛主席及我们这些陪同人员都在望湘亭同时共进午餐。吃饭时毛主席谈笑甚欢，他丝毫没有倦意。我觉得他似乎还和青年时期一样，因此我对他说：主席，您是上了六十岁的人了，身体还是这样健康，还能在湘江涨大水时横渡湘江，走路登上云麓宫，我真为您

是大大赛过许多年轻人。如果把今天的真实情况讲给青年人听，青年人一定会感到无比的兴奋，他们会认真向您学习。毛主席回答说，这算什么！爬山吧，仅仅就是这样一点短路，游水也算不了什么难事。回到宾馆住地以后，我又问毛主席，我说，主席，游泳尤其是像今天这样涨大水下水游泳困难不啦？毛主席对我说，你又讲外行话，游泳比走路还要容易。人在水里游泳，水的浮力帮助你运动。水越大浮力就越大，水帮助你运动的浮力也就越大。游泳比我们每天走路要容易得多。因为走路腿要使劲，不使劲就迈不开步。所以我认为游泳不仅能够锻炼人的体质，而且能够锻炼人的意志。像今天这样的大水，要敢于下水游泳横渡湘江，没有一点勇敢精神是不行的啊！但是游泳也容易出问题，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我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几个会水的同学到湘江边上南河港去游泳。南河港那个地方有个缺点，就是河边时常停泊着一列很长的木排。游泳的人要从木排上跳下水去。这里离岸有好几丈远，河水很深，不但初学游泳的人觉得不方便，就是会水的人也要担心发生危险。那一次我们几个同学从木排边游到江中，又从江中游到木排边的时候，我的手没有攀上木排，身子已经向江底下沉。幸亏得到陈绍林同学的救护，我才脱险。那一次我差点出了洋（毛主席讲出洋的意思，就是说差一点被淹死）。我毛某今天还能活在世上，要感谢陈绍林等几位同学。

十一、草台班子的戏也要唱

有一年周世钊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小组会上发言和在大会上发言时，都谈了他对教育问题的看法外，在毛主席约见他的时候，也向毛主席汇报了他对教育问题的看法。他向毛主席汇报说，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教育问题，几乎成了这次会议的热点。在开会之前，我到了几个地方去看了看学校，现在学校里的比较多，主要问题是教育经费太少，教师水平太低，教育质量太差，校舍不够用，危房太多，许多学龄儿童不能入学，一些高小毕业的小孩子上不了初中。这个问题在农村还稍微好一点，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地方读书，他们可以跟父母去干些农活，不致于出什么问题。但是在

城市里就成了大问题。因为孩子的父母要上班，家里没有人管，十几岁的小孩就会成天到处玩，什么打群架、斗殴他们会无所不干，这样就会出大问题。我认为国家不论财政经济怎么困难，教育经费要增加。宁肯别的地方少开支一点，但教育经费要多开支一点。我的意见，我除了在小组会上谈了之外，还写了书面的东西在大会上发言。您是人民的主席，请您也指示有关单位，要他们增加一点教育经费。毛主席说：我看你这位堂堂的副省长现在是有职又有权了，不是有职无权啊！你是主管湖南省教育工作的副省长，很关心湖南的教育工作，这很好啊！这是你尽职又尽责的表现，也是你对人民教育事业负责的表现。教育经费紧，别的经费也紧。你提议要增加教育经费的支出。在国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适当多增加一点教育经费的开支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增加得太多。因为第一，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叫做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如果教育经费增加得过多，势必会影响其他事业的发展，就会出现比例失调；第二，我们国家的财力还是有限，目前不可能拿出太多的钱来办教育。孩子要读书，国家的财力又有限。怎么办？我们党有个优良传统，叫做依靠群众解决困难。我们大家都喜欢看戏，而且爱戏的人又喜欢看好戏。北京人特别喜欢看梅兰芳先生的戏。梅兰芳先生的戏演得好，唱得好，大家很喜欢看他的戏这是很自然的。我也很喜欢看梅兰芳先生的戏。但是，如果谁要下个决心，看戏我就是要看好戏，我就是要看梅兰芳先生的戏，非梅兰芳先生的戏我就是不看，那么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你这一辈子就莫想看戏。你就会看不到戏。为什么呢？因为梅兰芳先生他不可能天天唱戏，即使他经常唱戏的话，他大部分时间也只有在北京唱，只有北京人才能看得到他的戏。实际上北京人也不是人人都能看得到梅兰芳先生的戏。因为第一是票数有限，第二是票价太高，有的人想看也看不起。所以我看梅兰芳先生的戏算是正规的戏，是大戏院里的大台戏。我认为梅兰芳先生的戏要唱，草台班子的戏也要唱。有些草台班子的戏也演得很好的啊，是很受群众欢迎的啊！所以我说正规的戏要唱，非正规的戏也要唱，全国人民才有戏看。我们办教育也是这样，要做到全国应该入学的孩子都有学校读书，学龄儿童都能入学，我看只有和唱戏一样，正规的戏也唱，草台班子的戏也唱。就是要提倡国家办学，群众办学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国家在力所

能及的情况下，逐年适当增加一点教育经费的开支，把公办学校办得更好，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不断增加学校的招生人数，把更多的青年学生招收到公办的学校里来读书。同时就在国家公办的学校里，在条件允许的地方，例如在城市里，我看可以实行二部制。一部人上午读书，一部人下午读书，这样也可以解决一部人读书难的问题。另外，还可以发动群众办学，依靠群众来解决困难。例如在农村可以发动群众集资办学，搞一些民办学校，也可以是群众集资一部分，国家补助一部分，这叫做民办公助。在城市里，尤其是大一点的工矿企业，可以发动他们自己办些子弟学校，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办子弟中学。这叫做发挥两个积极性。我相信只要我们把问题和大家讲清楚，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周世钊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后，据他自己说，好像一个天大的困难得到了解决，心里非常高兴。他说，我当时真想马上就回长沙去，将毛主席这些关于解决教育工作困难的指示向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南省人民委员会主管文教工作的有关负责同志汇报，把湖南的教育工作搞好。可是我是全国人大代表，不好早退。只有等会议结束后，才回去汇报。周世钊从北京回到长沙以后，他就将毛主席的指示向有关负责同志作了汇报。当时，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根据湖南的实际情况，认真贯彻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问题的指示，掀起了群众办学的热潮，较好地解决了学生入学难的问题。

十二、平调风要不得

在大跃进期间，有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省人委办公厅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指示，组织在湘的全国人大代表到宁乡县视察。代表们住在宁乡县人委招待所，白天到公社、大队参观视察，晚上回来，早出晚归。有天到一个公社视察，在听完汇报后，公社负责人留代表在公社就中餐。这个中餐，吃了两个多小时。所有宁乡县的各种名菜名酒都摆了出来，一桌一共上了68道菜。这68道菜，鸡鱼鸭肉不知用了多少。对于这一极为丰盛的中餐招待，代表的看法也很不一致。有的说这个中餐吃得真正太好了，太丰盛了，这体现出了人民公社的丰收景象，体现出了人民公社对我们这些人民代表的极大热情；有的说我是有生以

来第一次吃上一个中餐一桌上了68道菜，这是我们的幸运，问题就是有很多菜根本没有吃，浪费太大，有的说公社是打着招待我们的旗子，行着他们自己吃喝的牌子，这种搞法我看有问题……

这年周世钊到北京见毛主席时，主席问他：惇元兄，今年开会前到了什么地方参观视察？看了些什么东西？有什么感想？周世钊回答说：到了我的老家湖南宁乡县去视察农村人民公社。通过这次到农村参观视察，看到了农村的大好形势，看到了三面红旗的威力，受到了一次很深刻的教育。不过有两个问题我看也值得研究。一个是粮食亩产的数字上我看有些虚假现象。有的说一亩田一次能产几千斤，有的甚至说一亩田一次能产万多斤，我看有点不实在；再一个是我们这次在一个公社吃了一个中餐，一桌一共上了68道菜。公社负责人对我们说，招待我们的菜没有花一个钱，都是公社自己生产的。不知道公社怎么能搞出那么多的菜来。很多菜我根本就没有吃，摆了一下就拿走了，我看浪费实在太太大，这种搞法要不得。毛主席说：现在不仅湖南的农村形势好，全国的农村形势都好。你还不错。你看出了问题。现在农村确实有一股华而不实的浮夸风。农村到处在放什么卫星，一亩田只有60平方丈宽，一次怎么能做到亩产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几万斤。那是吹牛而已，实则办不到。这在事实上他们是瞎胡说；在科学技术上，他们是反科学。从科学技术的观点来说，也办不到，至少是目前办不到。你们是全国人大代表，是堂堂的国会议员啊，人大代表国会议员到了农村，他们不好好招待你们行啊！他们招待你们的目的，是要请你们到北京来跟他们说好话嘛！他们油了你的嘴吧，你吃了他们那么好的招待，你不仅不为他们说好话，到还要讲他们的不是，还要到我这里来告他们的状子，我看他们会骂你的。不过我看你是个好人，你敢于说真话，你敢于和错误行为作斗争，可敬可佩啊！不与错误行为同流合污，敢于向错误思想行为作斗争，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惇元兄，我看你真不错呀！他们招待你们的68道菜，都是从下面刮来的，所以就没有花一个钱嘛！他们招待你们68道菜所用的鸡鱼鸭肉，都是从各个生产队调来的，这不仅是你所说的浪费问题，而且是侵犯了群众的根本利益，群众对他们这种搞法是很不满意的。他们是名曰招待你们，实则他们自己大吃大喝，这股平调风要不得，必须坚决纠正。

十三、照顾老人

1950年10月，周世钊和谢觉哉、王季范在毛主席家中叙谈，当话题转到第一师范，谈到第一师范一些过去的教师的时候，周世钊借机向毛主席汇报说：主席，我记起了一师校长张干先生嘱托的问题。张干这个人，主席可能还记得。他现在长沙市妙高峰中学教数学，家庭生活颇困难，他托我向主席提出要求，适当给以照顾。毛主席说：我过去对张干是不满意的。他当我们校长的时候，年龄还只有三十左右，有能力，很能活动。我认为他是一定要向上爬的，爬到反动统治队伍里做高官。但是刚才听你说，他现在还在画粉条，几十年了，他还没有向上爬，这是难能可贵的，可以照顾。谢觉哉插话说：主席这个论断是不是有调查呢？也许张干曾经向上爬没有爬得上去呢？毛主席说：谢老这话未必对。张干是有向上爬的本钱的，如果他下决心向上爬，一定爬得上去。经过几十年没有爬上去，可见他没有向上爬的决心。这也就算他有一定的操守，仍然可以照顾。他过去是我们的校长，现在仍然在教书，他年纪老了，生活有困难，我们要照顾老人。周世钊将毛主席这些指示回未后向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的领导作了汇报。省委统战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将张干先生安排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的参事，使张干先生的生活有了保障，困难得到了解决，张干先生对毛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

1962年，周世钊谈到张干先生的困难问题，谈到毛主席在第一师范读书驱张的问题，毛主席说：那是1915年上半年的事情，当时省参议发布了一个新的规定，命令规定这年秋季开学时，每个师范学生要缴纳十块钱学杂费。这对那些穷学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当时学校里有人说这个规定是校长张干先生为了讨好政府当局而搞的，许多人提议要赶走张干校长，要张干下台。加上当时我们从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的一部分同学对合校后要读半年书有不满情绪，两个问题合在一起，对张干先生的意见就更大了，于是乎一场驱逐张干校长的学潮就不得不发生了。在第九班同学的发动下，全校很快就掀起了一股罢课的热潮。同学们四处散发传单，说张干先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类的话。当时我看了这些传单，我认为没有击中张干先生的要害。我就对同

学说，我们又不是反对他当家长，而是反对他当校长。我们要把他从校长的宝座上拉下来，就要揭露他对上如何阿谀奉承，对下又如何专横跋扈，办事如何无方，如何貽误青年学生的事实才行。当时好多同学建议我重新写一个，于是乎我在一师后山上的君子亭里起草了一个传单。有人说这是驱张宣言。我的稿写好以后，经与罢课发起人商量同意后，立即派人送印刷厂坐守印刷，等二天早晨传单印好带回学校就在校内广为散发，闹得第一师范学校满城风雨。后来当时的省教育司知道这件事后，也很恼火，就马上派了一个督学来一师找学生调解，要求学生立即复课。学生坚决不同意，提出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上课之类的口号。省教育司的督学也没有办法，只好对学生说，这个学期反正快完了，你们还是上课，下个学期张干不来就是的。张干先生为此大发脾气，派人调查这个传单是谁写的。后来查来查去，居然查出是我写的。张干先生当时挂牌要开除我和其他十七个所谓闹事的同学。幸亏王季范先生等人从中做了很多工作，才没有将我们十七个同学开除。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要感谢季范先生的。因为如果没有他从中努力工作，我和其他十七个同学很可能真的被开除出第一师范学校。当时我可能就没有地方读书了，第一师范学校这张毕业证书我可能就拿不到手了。我认为第一师范学校是个好学校。因为它有一批很好很过硬的好老师。我最敬佩袁大胡子。这位老先生很有学问，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他很喜欢我，对我的要求也是很严格。我有很多东西是他教给我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要感谢他对我的教育。由于第一师范学校有一批好老师，加上那时学风很好，所以第一师范学校为革命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的人才，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蔡和森、何叔衡他们都是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嘛！你是办教育的人，你要和其他同志一道，要设法把第一师范学校办好。现在我们又回过头来讲张干先生。我听说当时张干先生离开第一师范学校以后曾对别人说，历史上只有校长开除学生的，哪有什么学生开除校长的事。这是盘古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对于张干先生这个人，1950年我就跟你讲过，对于张干先生这个人，过去我对他不太喜欢。但是我认为他是个好人。现在看来当时我们要把张干先生赶走也没有多大的必要。张干先生现在老了，身体不好了，我们作为晚辈，作为他的学生，应该尊敬他。我们要关心他。关心老人、照顾老人、尊敬老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何况

张干先生是我们的校长，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更应该照顾他才对。

周世钊从北京回来后，他亲自到了张干先生的家里，将毛主席对他表示关照之类的话转告了他。张干先生一面表示感谢毛主席对他的关怀，一方面再次要求周世钊向毛主席上书反映他生活困难。周世钊这年给毛主席去信时，又谈到张干先生生活的困难。毛主席于1963年5月26日复信给周世钊，信中说：悼元兄，信收到，甚谢！复信一封，人民币二千元，请转致张次仑（即张干）先生为盼！祝好！毛泽东。周世钊从邮局将钱取回后，第二天就送到张干家里。张干先生那时身体不好，他拄着拐棍用力站了起来。周世钊扶着张干先生请他坐下，并对他说：您老人家身体不好，生活困难，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您老人家的实际情况。毛主席对您老人家很关心，他特地给您寄了人民币2000元来，他要我转交给您老人家，请您收下。张干先生接过毛主席送给他的2000元，眼泪双流，他说：感谢毛主席对我的关心！感谢毛主席对我的照顾。毛主席是第一师范学校的好学生，是人民的好领袖，毛主席真是大好人啊！

周世钊对于第一师范的情况知道的较多，哪位生活上有困难，他就写信向毛主席汇报。而毛主席知道后总是极力相助。1963年12月13日，毛主席给周世钊来信说：悼元兄：看了田仁尊兄的信，表示生活极为困难，似有求助之意。送上五百元，请予转交田仁尊兄为盼。生好！毛泽东。如有其他穷师友因生活困难，日子难过的事，请告我，应予援助，都由你经手。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援助性质。又及，过了不久，周世钊又向毛主席上书汇报了两个一师老同学生活困难的事，毛主席于1965年1月12日给周世钊来信：悼元兄：寄上三千元，请你酌处。他们两人或者不要送得太多，或者要送此数。如果不要送得太多，剩下来的即存你处，有人要，由你酌送。祝好！毛泽东

十四、后门风有两三尺宽

1972年8月，周世钊上书毛主席，他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不正的种种现象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此信共约四千字，其中有这样几段照录于后，

——林陈黑帮利用文化大革命运动，背着毛主席，排挤异己，扩大黑帮。很多水平高、能力好、有斗争历史、工作经验而又忠于职守、卓著

成绩的党内和党外的老干部被他们假借各种名义给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扣平反，不予复职，造成各方面工作的困难，损失极大。亟应进一步贯彻您的指示，落实干部政策，并由中央组织检查组分赴各省市进行检查。

——林陈为了破坏主席的知识分子政策，对文化界、教育界、科技人员、医务人员、各类大小知识分子都加以臭字的谥号，……统统称为臭知识分子。一些年龄稍大，家庭出身稍差，而工作经验、教学经验都较好，文化水平专业水平都较高的人，常被斥为反动学术权威，反动资产阶级分子，强令其退职退休，用一切办法排遣出去。

——主席素来特别重视青年培养教育问题。但经林贼的阴谋破坏，共青团、少先队等组织完全瘫痪。学校教师、工厂干部对管教青年学生、青年徒工也大大放松。下乡上山的青年学生，社队也不重视思想工作，差不多可以说，广大青年处于很少人管教的状态。……窃以为共青团、少先队的工作应该恢复，并提高质量。

——窃以为理工科大学要特别提高教学质量，以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同时还应该恢复科技大学，适当延长其学习年限，以提高学生的造诣。文科大学中是否可指定几个有条件的设置历史研究所（或单独设立），招收大学毕业生中的文史学习比较有基础的入学，用适当长点的时间，研读古今文史名著，章学诚谓：六经皆史。……目前能胜任这种研究所的教师的老人已不多，再过几年将难物色。因此能早为之，便利比较多。至于近代史和世界史当然也更为重要。

——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多的书可读。窃以为五四以来一些比较好的书可以经过审查开放一部分，同时文教领导部门应组织力量编写新的读物，凡革命斗争故事、革命先进人物、战斗英雄、劳动模范、革命知识分子、好的村史、家史和一切好人好事，都应以生动浅显和笔端带感情的文字写出来。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农民革命的英杰，一切好的发明家、工程技术人员、艺术家、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医药家、教育家也可以一分为二地写出具有教育作用的部分，……另外，还应编写一些有关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气象常识、史地常识等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常识读本，以提高读者的文化科学知识。

——我们看到一些基层干部除以私人关系开后门的作风颇为严重之外，又每每以派性和私隙作祟，借机会报复，打击别人，……窃以为中

央和省市可考虑设这类报告或投诉的机关，负责对所提问题深入调查，作出结论，经过有关上级的审核批示解决问题。

周世钊能在1972年那样的政治气候中向毛主席提出这些建议，这是他对共产党对祖国、对人民、对领袖的赤诚之心，是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无比热爱。就在这年的国庆节，周世钊又到了北京，毛主席又接见了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和他的老师王季范同志一起同毛主席交谈。这次谈话的内容很宽广，如国际问题、台湾问题、工业问题、石油问题、农业问题、统战问题、干部的作风问题。在谈到统战工作问题时毛主席说：再过一个时候，统战工作要恢复，政协工作要恢复，民主党派工作也要恢复。因为统战工作不仅过去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而且现在和将来永远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周世钊说：还恢复它干什么啊！现在庙也没有了，和尚也没有了，也没有人去烧香了。毛主席说：你不就是和尚吗？怎么能说没有和尚啊！在谈到社会风气问题时，周世钊说：现在林彪反党集团虽然被粉碎了，但是它的余毒还永远没有肃清。林贼一伙背着毛主席乱搞一气，把社会风气搞坏了，把干部的作风搞坏了。现在下而的干部，尤其是那些基层掌实权的干部，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拉关系，开后门，行打击、搞报复。现在社会上的后门风严重得很。这种风气现在是又深又宽，请主席要设法纠正才行。毛主席问：有好宽啊？周世钊说：那硬有两三尺宽。毛主席说：恐怕不止两三尺宽啊！恐怕要有一个汽车开得过去那样宽啊！

十五、蒋介石还要听我调遣

有一次周世钊到北京开会，毛主席约他到家中见面，周世钊对毛主席说：主席，我最近看了一本《保卫延安》的小说，很受教育。保卫延安确实是一场伟大的战争，但又是一场危险的战争。蒋介石那时是美式装备的武器，而解放军是小米加步枪，蒋介石有八百万军队，而解放军在数量上比它少得多。但结果居然解放军打胜了。毛主席说：《保卫延安》这本小说我也翻看过，是写得很不错。这本小说主要是歌颂彭老总的。彭大将军在指挥保卫延安的战争中是有功的。一场战争，要看战争的双方那一边会打胜仗，那一边会打败仗，主要不是看交战双方部队武

器的优劣，部队人数的多少。而要看交战双方各代表的是什么，要看它是代表人民利益呢，还是代表反动派的利益。如果它是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而战，它就是正义的，它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那怕它的武器差一些，人数少一些，它也会打胜仗，它也能打胜仗。如果它是代表反动派的利益，那怕它的武器再好，人数再多，也会打败仗。因为它是非正义的，它没有群众的支持，因而它就寸步难行。这就叫做正义的战争必胜，非正义的战争必败。蒋介石有美式装备的八百万军队是不错的。它有八百万，我有四万万五千万（这是当时全中国的人口总数），我比它多得多。蒋介石还要听我调遣呢。你不是看过《保卫延安》这本小说吗？小说中有很多故事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你说我们保卫延安这场战争是一场危险的战争，那也是真的。当时胡宗南有那么多军队，不仅在数量上多于我们，而且在武器的装备上也优于我们。他把进攻延安的架势一摆开，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所以蒋介石胡说要三个月内消灭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党中央经过再三研究，决定暂时放弃延安，撤离延安。如果我们当时不放弃延安，和胡宗南正面拼，那我们就会吃亏。我们采取了撤离延安和胡宗南打运动战的办法，我们相信人民群众，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运动战中消耗敌人的主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我们就取得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我们当时决定撤离延安，暂时放弃延安，不是不要延安，而是为了更好地保卫延安。经过延安保卫战，延安仍然是人民的延安，延安显得更加伟大。战争总会有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目前打不起来。但是局部战争、小的战争世界上天天在打。如果将来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我个人的意见，我们指挥战争的中心还是放到延安去。因为延安的人民太好了，延安这个地方太好了。周世钊说：我有次和原来刘戡的参谋长、现在是湖南省政协常委的文于一谈到他们打延安的问题时，文老自己说：如果那次我不是因为有事出来了，我也很可能被打死了。有一次刘戡要我带领一些部队去捉毛泽东。部队到了一个我们原先估计毛泽东所在的地方。我们到东边问老百姓毛泽东那里去了，东边的老百姓对我们说：毛泽东往南边去了，我们走到南边没有看见毛泽东，问老百姓毛泽东往那里去了，南边的老百姓对我们说：毛泽东往西边去了，我们走西边，又没有看见毛泽东，我们又问西边的老百姓毛泽

东往那里去了，西边的老百姓又对我们说，毛泽东往北边去了，我们又走到北边，也没有看见毛泽东，又问北边的老百姓毛泽东到底往哪里去了，北边的老百姓又对我们说，毛泽东刚往东边去了。转来转去，我们整整转了一天，连毛泽东的影子也没有找到。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毛主席就是在我们那天转来转去的那个山顶上。我们那么多部队在那个山下转了一天，就是没有办法知道我们要捉的毛泽东是在哪儿，脱离了人民群众真是没有办法。毛主席真有办法，毛主席真正了不起。毛主席说，他们是一堆蠢猪。我谅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能找到我。不过那次也真的有点危险。我们只有 100 多人在一个山顶上，连敌人走路的声音和他们讲话的声音，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们在那个山顶上困了一天，吓得战士们连尿都不敢拉。但我不怕。我相信他们找不到我。因为我除了有 100 多名警卫战士外，更重要的是有广大的人民群众。我相信广大人民群众会设法保护我们的。所以我总是做战士的工作，你们不要怕，敌人找不到我们的，群众会保护我们的，你们放心。我们打仗作战能取得胜利，除了发挥指挥员的正确指挥和战士们的勇敢作战精神外，更离不开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支持和爱护。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就会一事无成。这就叫做人民军队为人民，人民群众爱护人民军队。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就是因为它背离了人民，它脱离了人民群众，所以它得不到任何真实情况，因此它总是吃败仗。有一次我和恩来同志行军走到一个山头转弯的地方，我们走过后，我叫他们找块板子写上毛泽东由此去的牌子插在那里。开始他们不敢写，我叫他们一定要写，后来恩来同志他们还是写了。这个牌子的去向是真的。可是敌人以为是假的，结果敌人又吃了大亏。所以我们和敌人作战，就是对他们采取假假真真，真真假假，弄得敌人调头转向。这样我们就在运动战中抓住时机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直到取得战争的胜利。周世钊说：您那次从延安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也是很危险的啊！毛主席说，很危险也很不危险。说危险是因为蒋介石这个人是一个坏到了极点的人，什么事情他都干得出来。只要他那句娘c·p的话一说出来，要干什么他就能干什么。我到重庆去和他谈判，是到了敌人的大本营，蒋介石很可能对我下毒手，这是危险的。我去重庆之前，也作好了坏的思想准备。我想我是为全中国人民的和平而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蒋介石居然敢把我杀死在重庆，

我也死得光荣。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死得其所，死得光荣。说很不危险，是因为我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代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和平愿望而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如果蒋介石真正敢于在谈判桌上对我毛某下毒手，那么他在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就输了理，反对和平、破坏和平这顶帽子他就自己戴上了，他那套假和平真备战的面目就完完全全暴露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了，他就不好向人民交代。再说他请我去重庆和他和谈，还有位什么美国大使先生在那里作保障嘛，如果蒋介石把我在谈判桌上杀了，他也不好向他的主子交代。所以我谅他不敢对我下毒手。我们党中央那时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作了再三的考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从和平的愿望出发，多数人同意我去，也有少数人不同意我去。他们认为事情确实有危险性。当时我对大家说，如果我不去，反对和平，破坏和平这顶帽子就会戴在我的头上，蒋介石就会大吹大擂，他就会大造舆论，说中国共产党不愿和平，毛泽东是个好战分子，我们就输了理。我才不上他的当！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从和平的愿望出发，为了和平我决定去，中央也同意我去。可是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他总是以他的心理来衡量别人的心理。他万万没有想到我毛泽东真敢去重庆和他谈判。我一到重庆，蒋介石慌了手脚，弄得他措手不及，临时作准备。开头几天，我无事可做，就只好每天和张治中先生聊天。我那次到重庆和蒋介石和平谈判，能够安然无事，要感谢张治中先生。四川重庆市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们，为我在重庆和蒋介石和谈，在安全保卫工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要感谢他们。周世钊说，主席，您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为什么没有负过一点伤啊！毛主席说，我们和敌人作战打仗时，我经常和战士们一起行军，我也时常到前线去了解情况。但是我就是没有负过伤。不说是大伤，连小伤也没有负过。这可能是因为敌人的子弹没有长眼睛，它找不到我毛泽东嘛！

周世钊说，1950年的那场抗美援朝战争，也是够紧张的啊！那时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全国人民得到解放，建设新国家是大好机会。人民希望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那时您就决定抗美援朝，派志愿军到朝鲜作战，我当时怕影响我们的和平建设，但后来居然把美帝国主义打败了，这是了不起的事。毛主席说，关于抗美援朝的问题，1950年10月我

就跟你谈过，那时是急切要进行和平建设。如果要讲和平建设的理由，我可以讲得百条千条。但是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美帝侵朝的目的，实际上是要侵略中国。它当时进攻的矛头已经直指我国的东北。如果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然它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就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我们又怎能和平建设呢！如果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就会得寸进尺，它就会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美帝国主义当时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中国身上。从朝鲜一把尖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它就是要从这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我们进行抗美援朝的目的，就是要不许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得逞。这叫做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关于我们派志愿军到朝鲜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共同抗击美帝一事，当时确实有人不同意。他们认为没有必胜的把握，因此他们不主张派志愿军出国。我们是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的。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密详细的考虑和研究，我们制订了持久的战略，我们对这场战争充满了胜利的信心。那时我们分析美帝国主义的军队有一长三短。它的钢铁多、飞机大炮多是它的唯一优势。但是它在世界上的军事基地多，它到处树敌，到处布防，兵源不足是它的第一短，远隔重洋，侵略朝鲜，运输线太长，武器物资供应困难，是它的第二短，为侵略而战，师出无名，士气十分低落，是它的第三短。这三短是它的致命伤。它虽有一长，但不能敌这三短。我们则为抗美援朝而战，为保家卫国而战。我们的战士士气高，我们的兵源足。我们是正义的。正义会得道，正义会多助，正义必胜。但我们不希望速战速决。我们要进行持久战。我们要一步一步地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它一年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年。它十年不撤退，我们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只好心甘情愿，同我们进行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问题，我们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这就是说，美帝侵略朝鲜之战，不管它怎样挣扎，它一定要彻底失败。我们那时就是依靠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的武器，依靠战士们的勇敢精神，依靠中朝人民的支持，依靠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与美帝国主义打仗。战争的结果，完全证明我们的估计是正确的。中朝人民胜利了，

美帝国主义失败了。这就是历史的结论。抗美援朝这一仗，我们不仅打出了军威，而且打出了国威。抗美援朝这一场战争我们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是经过抗美援朝这一场战争以后，我们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看来我们打这场战争还是值得的。周世钊说，毛岸英同志也到了朝鲜，但是他刚刚出国不久，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是不是和彭老总没尽到责任有关？如果您不派毛岸英同志到朝鲜战场上，我看他是不会牺牲的。毛主席说：不能这样说。岸英的牺牲，责任完全在美帝国主义身上。岸英是为保卫中国人民、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而出国作战的；他是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而牺牲的。彭老总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不能去责怪他。当时我得到岸英在朝鲜战场上不幸牺牲的消息后，我的内心是很难过的。因为我很喜欢岸英这个孩子。岸英牺牲以后，当时有人提议要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我没有同意。我说岸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抗美援朝、为保家卫国而牺牲的，就把他的尸体安葬在朝鲜的国土上，让它显示中朝人民的友谊，让中朝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不必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到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在那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是极力主张发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的，后来居然得到党中央的赞成，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这个决定得到了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我作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上战场，光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个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青年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到农村进行过劳动锻炼，但他没有正式上过战场。青年人就是要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要在战斗中去成长。基于这些原因，我才派他到朝鲜去的。周世钊说，我们那次和印度在中印边界上打仗，当时的外电报导说，我们和印度打仗是好比快刀切豆腐，不值得一打。您为什么打了一下就收兵回营啊？毛主席说，那次我们和印度打仗，是保卫边界之战。印度侵占我们的边界领土，它是非正义的，因而它必败。打仗要有个交战的双方。我们只打

了一下子对方就被我们消灭了，就没有对象了。我们那次和印度打仗，是边界保卫战，是小仗。把我们的边界领土收回，目的达到就可以了，不必再前进了。因此，我们就只好收兵回营了。

十六、到延安等地参观学习

1971年春，经过和王海容同志联系，周世钊又到了北京。他这次去北京和1967年去北京一样，先是住在王海容同志家里，后来又住到北京饭店。王海容同志告知，毛主席请王季范、周世钊、张国基、楚中元四位老人到外面去看看。这次的接待工作，毛主席委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负责，具体的联络事宜由一位姓张的同志来安排。经过上下左右的联系，四位老人一致同意到延安老革命根据地去参观学习。在四位老人去西安之前，张同志和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有关负责同志进行了电话联系。据张同志说，在电话中也告知了陕西省接待部门的有关负责同志，王、周、张、楚四位老人是毛主席的旧友，也是毛主席的好友，这次他们到延安去参观学习，是毛主席请他们去的，他们四位老人是毛主席的客人，请他们一定要热情接待。张同志说陕西省革委会管接待的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毛主席的客人来了，我们一定好好接待。张同志将联络的有关情况向四位老人作了汇报，以消除四位老人怕没有人接待的顾虑，坚定他们去延安参观学习的信心。张同志还将他和陕西联络的情况详细地向吴德作了报告。吴德还是有些不放心，于是，他给当时的陕西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写了信，信中说：“瑞山同志，谨主席嘱示，有客人王季范、周世钊、张国基、楚中元四位老人前来延安参观学习，请热情接待，尔后面谢。”吴德亲笔给李瑞山写了请他热情接待这四位老人的信后，他还是有些不放心，仍怕陕西接待不好毛主席的客人，他交代张同志带去人民币伍千元，粮票壹千斤，并对张同志说：“如果陕西不招待毛主席的这些客人，就由我们北京市委来招待。”

毛主席的客人王、周、张、楚四位老人加上工作人员共11人，是乘坐火车去西安的。四位老人到达西安时，到火车站接待的是南京步校在陕西支左的一位矮矮胖胖的解放军革官。经过介绍相识后，张同志在车站就将吴德给李瑞山的亲笔信交给了这位解放军同志，那位解放军说，

“我把您们送到宾馆后，我马上就将吴德同志的信交给李瑞山同志。”

大约是那天下午二点多钟，四位老人及工作人员在接待人员的陪同下，到达了西安市郊的丈八沟招待所。这是陕西当时接待高级贵宾居住的地方。据说西哈努克亲王到陕西时，也就是住在此地。四位老人及工作人员全都住在三号楼。当四位老人进入各自的住房后，我到四位老人的房里看了一下。就房子来说，那是漂亮的，算是当时的第一流水平。但是房内的设备就比较简单，连洗脸洗澡用的毛巾及香肥皂都没有，我和张同志商量好了，打算那天晚饭后上街去买。大约是那天下午五点半钟左右，李瑞山同志专程从农村赶了回来，他连办公室和家里都没有去，就直往丈八沟招待所看望毛主席的客人——四位老人。李瑞山到达丈八沟招待所后，在三号楼的会议室里，看望了四位老人及其工作人员。在会议室里，李瑞山和四位老人大约寒暄了半个小时后，他请四位老人回房休息片刻准备吃饭。在四位老人及工作人员回到房里后，发现每间房内都大大变了样，不仅卫生间内摆上了新一色的洗脸洗澡毛巾、香肥皂、高级卫生纸，而且每间房内还摆放了“中华香烟”及各种水果和高级糖。床上用品也全部换上了新的。面对这一切，四位老人感到非常高兴。王季范和周世钊问我说：“老陈，这是你们做工作才改变的嘛！要么就是李瑞山同志来才改变的。我看原来他们是把我们当作普通客人看待的。”我只好对他们说：“不是我们做工作改变的。他们原来就做好了热情接待您们四位老人的准备，只因我们来时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他们利用李瑞山同志和您们四位老人见面谈话的时机，将准备晚上才做的工作，提前做了。”王、周两位老人说：“那就好！那就好！”

四位老人到陕西的目的，主要是到延安参观学习。他们在西安市休息后，首先在西安市参观学习了两天，然后去延安。西安到延安相距有400多公里。坐汽车去怕老人受不了。于是决定坐飞机去。延安人民热情接待了毛主席的客人。这四位老人都是毛主席的老朋友，所以他们对于能有机会来到毛主席革命过的地方——延安参观学习，都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对毛主席在延安的每个纪念地的陈列是看了又看，抄了又抄。他们拍了很多很多留作纪念的照片。从延安到南泥湾还有一段路程，是简易公路，不太好走。陪同参观的人员劝他们不去，四位老人都说，南泥湾是毛主席在延安时号召大生产的地方，我们不去看看，那就是对不

起毛主席。四位老人不仅在延安参观学习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还到农民群众家里去看。他们发现延安人民群众的生活还比较困难，一致表示回到北京以后，要向毛主席如实汇报，要请毛主席建议党中央和国务院加强对老革命根据地的支援。他们还要陪同人员特意买回了几个窝头叫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吃。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进行教育。

从陕西回到北京后，王、张、楚三位老人回到了各自家里居住。周世钊仍住在北京饭店。张同志对他说，在北京，您想到什么地方看看，想看些什么东西都可以，您提就是，我们一定做到。一天在张同志的陪同下，周世钊到了河北省遵化县看农业生产。遵化县的负责同志，对于周世钊的到来，表示热情接待。来时，遵化县的负责人和保卫及医务人员乘坐两部小车接到县的边界。周世钊走时又送到县边界。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热情？他们说这是毛主席的客人，我们不热情就对不起毛主席。周世钊在北京住了一个时候之后，又到了南京、上海、武汉然后回到长沙。周世钊所到之处，都是当时的主要负责同志出而接待。例如他到南京时，是许世友同志亲自出而迎送并陪同参观，我对许世友同志说：“您指定一位同志负责接待就行了，不必您亲自出马。”他说：“那不行。这是毛主席的客人，是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我必须亲自出面接待。”

十七、光是有际的

1967年6月17日毛主席和周世钊谈话时，周世钊对毛主席说，现在是搞文化大革命，是在搞群众运动。在这场群众运动中，各种各样的议论很多。例如对主席的思想，现在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您的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有的说您的思想是毛泽东主义，有的说您的思想是光耀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因此他们提出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领导地位等等。对于这些说法和提法到底对不对？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我现在连搞不清楚！毛主席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席卷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大革命。在这样一场大的群众运动中，出现了对一个问题的各种说法和提法是不足为奇的。但最后也是会统一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它是一种思想体系，是一种正确的思想体系。既然它是一种思想体系，又为什么把它叫做毛泽东思想呢？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来代替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而不用别人的名字来代替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呢？这是因为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确定我为党中央的主席。1935年以后，中国的革命就再也没有走什么弯路了。在1935年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就慢慢地产生并形成了这种指导革命的正确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又必须有个名称。因为那时我是党中央的主席，所以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就必然要用我的名字来代称，而不能用别人的名字来代称。但是，党中央确定把这种思想体系叫做毛泽东思想，就决不是说毛泽东思想就完全是我毛某一个人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包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内的思想，只不过是和我的名字来代称罢了。当然其中我的东西可能要多一点，要不然我怎么能当党中央的主席啊！中国的革命，从1935年以后，一直从胜利走向胜利，所以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说法是对的。关于毛泽东主义的问题，这种提法也没有多大的错误，他们硬要这样讲也未尝不可。不过自从党中央把这种思想体系确定叫做毛泽东思想以后，它在我们全中国人民的头脑中已经享有崇高的威望，它对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很好，因此就用不着去改它，也没有必要去改它。关于那种什么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要大树特树我的领导地位的提法的问题。那些大讲大树特树的人们的真心实意是，名曰树我，实则是要树他们自己。关于所谓权威的问题，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权威。任何权威都不是树起来的。权威是在革命的实践和斗争中形成的。那些想要利用我这块牌子来达到大树特树他们自己的目的的人，终究有一天是要失败的。关于光耀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是无稽之谈。光从来是有际的，再大的光也是有际的。你看见过无际的光吗？他们要这样讲，除了说明他们是无知之外，别无其他解释。

十八、他们是要我站岗

1967年6月17日，毛主席问周世钊：你到北京以后到了什么地方，看了些什么东西啊？周世钊说：我到北京后看望了谢老（觉哉）、徐老

(特立)、王季老(王季范)、张国老(张国基)、楚中老(楚中元)几位老朋友。除此之外我每天就是看书看报，有时也上街走走看看。我是住在北京饭店，北京饭店大门口东侧就是王府井大街的南口。在那里每天有很多全国各地的各种小报，有时我也买几张看看。那些小报大都是报导全国各地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特别是报导各地进行武斗情况的消息为多。他们报导武斗的消息大都采用国民党蒋介石时代打仗发急电的方法，就是某某地告急、急急急、十万火急。毛主席说，让他们去告去，急不了好久，总会要想个法子解决问题的。周世钊说，我还到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看了一眼。我看见在这两个大学里，主席的语录很多，在清华大学有好几个地方的房子里，都有主席的塑像。有的还塑得很好，很像主席的像貌。毛主席说，我很讨厌那些东西。到处搞些语录干什么呀！我早就跟他们讲过，不要到处搞语录，不要到处搞红色海洋，不要搞那么多的红本本，那是极大的浪费。他们就是不听我的。现在他们又到处在搞什么毛主席塑像，说这是对主席的什么忠忠忠。我看他们那样搞并不是对我的什么忠，他们是要我站岗。

十九、周总理对毛主席最忠

周世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天对我说，现在提倡大家都要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我看对毛主席最忠，最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人是周恩来总理。我可以举出两件事情来证明。一是五十年代末期，有一年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南下到广东视察工作。路过湖南长沙时，毛主席的专列在长沙火车站停留了一个时候，毛主席没有下火车，中共湖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张平化等同志都到火车上去看望毛主席和周总理，并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汇报了湖南的工作情况，后来，大家都陪毛主席和周总理在火车上共进晚餐。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共湖南省委的负责同志也把我接到毛主席的专列火车上，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我随同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一起，到火车上去看望毛主席和周总理，同他们一起，陪毛主席和周总理在火车上共进晚餐。席间省委的负责同志敬毛主席的酒。我记得那次用的是真正的贵州茅台。我虽然不会喝酒，但那次我也喝了一杯。服务员把几杯酒倒得满

满的放在桌上，大家准备向主席敬酒。这时，周恩来总理出于对毛主席的忠诚，他怕毛主席喝完这几杯酒后身体受不了，不喝又不礼貌，他站起来对大家说，我来代表毛主席喝。他一口气把摆在桌上敬毛主席的那几杯酒，全部喝光了。这时毛主席含笑站起来举手伸出大拇指对大家说，恩来到底不愧为是我们伟大的总理，不愧为是我们伟大的外交家啊！毛主席的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们在席上陪毛主席和周总理共进晚餐的每一个人不约而同地感到，周总理对毛主席的照顾真正周到，周总理对毛主席最忠。二是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毛主席不管在北京那个地方接见外宾，周总理对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总是亲自过问，亲自检查。他认为安全保卫工作万无一失时，才亲自陪同毛主席接见外宾。如毛主席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在其他有关工作安排就绪之后，周总理最后听取安全保卫工作情况的汇报。然后，周总理亲自顺着毛主席进入大会堂必经之路慢步行走，到处用脚踩一下，看看地毯底下有没有危险品和爆炸物。然后，再到会客厅检查。周总理对毛主席接见外宾时要坐的沙发，逐个检查，他把沙发翻过来看一看，用手摸一摸，然后他亲自坐一坐。对会议室内外的每个门和四周墙壁，他都要过细检查，确认无危险品和爆炸物后，他就命令安全保卫人员对毛主席所经过的线路和会客厅严加警戒，直到毛主席接见完毕才能撤离岗哨。在做完这些工作后，周总理才亲自陪毛主席接见外宾。所有这些，都是周总理对毛主席忠诚的表现。现在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周总理全力维护毛主席的安全。周总理对毛主席的忠诚，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二十、两边都是革命群众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以后，周世钊对这场运动的兴起很不理解。他致函毛主席，要求到北京见面，陈述他的意见。毛主席复函说：不必来京，事情可以合理解决。

长沙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由于省人委地处长沙市的中心地段（当时省人委办公地址在今省农业厅内），交通方便，有利于联系工作。当时省人委的大多数副省长都住在省人委院内及其周围。也由于副省长的家里房屋较宽，又都有电话可用。因而当时多数副

省长的家里，都驻扎了一至两个群众组织的司令部。周世钊的家里，在省人委东侧的教育街53号，是一栋两层楼的小洋房，很适于驻扎一两个群众组织的司令部。到1967年5月底以前，曾有十多个群众组织的司令部要求进驻周世钊的家里。每个群众组织司令部的头头来要求进驻时，我都是以两条理由和他们交谈（五、六十年代任省级领导同志的秘书，都是和领导同志住在一起），一是讲周世钊年岁太大，身体不好。如果你们进驻他家，对老人的生活必有诸多不便，这是对老人的不敬；二是如实告诉他们，周世钊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最要好的同班老同学，现在是毛主席最要好的朋友。如果你们的司令部进驻他家，对他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会不利，他就会上书毛主席，就会要麻烦毛主席，这对毛主席是不忠。许多群众组织司令部的头头，经过我用这两条理由和他们交谈之后，一般都同意不进驻周世钊的家里。唯独“湘江风雷”有个支队的司令部，他们来了五个人硬要进驻周世钊的家里。我用那两条理由和他们谈了一个上午，他们仍然坚持要进驻。到了中午12时，我只好请我的岳母娘做饭请他们在我家吃中饭。他们在我家吃完中饭后，我请他们的“上级”来人谈判。他们的“上级”来了之后，我仍以那两条理由和他们交谈。结果“领导”的水平到底是高明一些，他们同意这个支队的司令部不进驻周世钊家。当时，省人委所有副省长的家里，只有周世钊的家没有驻扎群众组织的司令部。所以后来周世钊有次开玩笑对我说，老陈，你才是真正的保皇派啊！我回答他说，不是我保了您，而是毛主席保了您老人家。

随着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开展。一个所谓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滚滚而来，红卫兵查抄“走资派”家里的行动随即而起。我虽然阻止了群众组织的司令部未进驻周世钊的家里，但是我没有办法能够阻止红卫兵对周世钊家中的查抄。我用那两条理由和他们的头头谈判后，毫无效果。他们坚持一定要抄，非抄不可。没有办法，我只好让他们抄。红卫兵在周世钊家里，抄走了现款和存折人民币1万多元，拿走了一些旧书和衣物之类的东西。当红卫兵从箱子里拿出一件很高级的狐皮大衣时，周世钊的夫人余宣同志说：这件狐皮大衣是1950年毛主席请周老到北京见面时亲自送给周老的，红卫兵才未将这件狐皮大衣拿走。当红卫兵从箱底里搜出毛主席给周世钊的一大堆信时，有

的红卫兵看到毛主席给周世钊的每封信都是称周世钊为惇元兄或东园兄时，就问周世钊，惇元和东园是哪一个？周世钊回答说：惇元和东园都是我，是我的别号。有些红卫兵马上就说：你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典型人物，你真是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毛主席比你大得多，你怎么要他称你是兄啊！你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啊！对于红卫兵这种无知和可笑的追问，周世钊只好采取无可奉告，不予回答的态度。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1967年6月6日，长沙“六六惨案”发生后，我看到周世钊的心情确实比较紧张。因而我找了有关领导，设法购买了两张飞机票，我陪同他于1967年6月9日到了北京，我们两人先住在王海容同志家里，后来住在北京饭店626号房间里。通过王海容同志的联系，毛主席于1967年6月17日约见了周世钊。毛主席问周世钊：惇元兄，我们多久不见了，现在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还好吗？周世钊说，好什么啊！红卫兵抄了我的家，钱也搞了去了，书也搞了去了，有些好一点的衣物之类的东西也搞了去了。毛主席说：哎哟！红卫兵真的不简单啊！你这样一位堂堂的副省长他们也敢到你家去抄家啊！不过没有什么关系，钱吗叫你的秘书找红卫兵把它要回来就是了（1968年春，我找长沙市红卫兵司令部及长沙市查抄办负责人协商同意后，已将抄去的钱全部如数退还给了周世钊），书被抄走后很可能搞散了，难得追回，那就由我来负责赔偿好了。毛主席问：你是怎么来的啊！现在住在那里啊！周世钊说，我们是通过湖南省军区的负责人龙书金的帮助才买到飞机票，才能进入机场，我们是坐飞机来的。通过王海容的安排，现住在北京饭店。毛主席说：龙书金我不认识他。但是我知道他是个好同志。他很能打仗、很会打仗啊！我知道他是十八勇士之一啊！（当时龙书金同志住在‘京西宾馆’我设法到‘京西宾馆’找到他，将毛主席讲的这些话，如实转告给了他。龙书金听后内心非常感动，当时流出了眼泪，并说：谢谢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的鼓励，我一定好好听毛主席的话，把工作搞得更好。可惜龙书金没有按他自己说的去做。后来他犯了大错误，上了贼船，他和“四人帮”一起共同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毛主席，成了千古罪人。这是要由他自己来负责的。但是后来在有关资料上，把十八勇士改为十七勇士。我认为这也不太好。因为它不符合历史事实）。接着周世钊向毛主

席汇报了湖南长沙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向他汇报了长沙“六六惨案”的有关情况后，毛主席就湖南长沙当时进行武斗的问题，讲在平塘是如何打的，讲在河西又是如何打的，讲得清清楚楚。周世钊问毛主席说，主席，您怎么比我们还了解得清楚些啊！毛主席说，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嘛，他们会时常向我汇报情况的，再说你看我的办公桌上，不是放着一大堆小报吗！有些情况我是从小报上看到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的大革命，是一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革命。用不着争争吵吵，更用不着武斗。那样只能给阶级敌人有机可乘，对广大革命群众是不利的。湖南的群众组织很多，但归纳起来可分两大派。一派叫做‘高司’派。这是以湖南的高校学生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其中也有很多中学生，也有一些工人和其他群众参加。据我了解，机关干部参加这一派组织的要占大多数。再一派叫做‘工联’派。这是以工厂中工人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它的群众主要是工人。其中也有大、中学生，也有机关干部和其他群众参加。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把所有的群众都卷进去了。就我们湖南来说，不管他是‘工联’派，还是‘高司’派，我认为两边都是革命群众。两派的组织都是革命群众的组织。‘高司’的群众基础是学生，学生素来是革命的先锋队；‘工联’的群众基础是工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从它们的历史情况和它们所处的地位来说，没有不革命的理由，也没有不是革命的群众。两派并没有什么原则的分歧。两派只有联合起来，也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是副省长嘛，湖南的事你还是要管管，当说的则说，当管的则管。至少是教育方面的事你要管，不必负气。周世钊说，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我怎么管啊！毛主席说，如果你愿意入党，我可以作介绍。你既是副省长，又是湖南民盟的负责人，怎能对湖南的事袖手旁观呢？周世钊说，今天这个局面，民主党派还能起什么作用，连个庙都没有了。毛主席说，庙可以重修嘛！修庙是积福的事，我出点香火钱。湖南现在的情况比较乱。你既然已经来了，既来之，则安之。你就暂时不要回去，在北京住一个时候再说。经费由我负担，我请你的客好了。这时周世钊问毛主席，主席，江青同志好吗？毛主席说，我多年就打单身了，好什么啊！第二天，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同志专程送来人民币

2000元，并说：这是毛主席叫我专程送来给你们两人的生活费。主席说先送去2000元，如若不够用，以后再说。经过王海容的联系和安排，周世钊就在北京饭店住下来了。王海容说，你们就住在这儿，周伯伯出去用车，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安排，明天会有人来直接找你们联系的。第二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接待处一位姓朱的同志来到北京饭店对我们说，上面交代了，您们两位在北京期间由我们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接待处接待，具体交由我来联系，您们生活上有什么事情，就直接找我联系。过了两天，我打电话要车，朱同志问我说，是那位出去？我说，当然是周副省长出去。如果是我出去，我是不会要车的。我也不敢要车。朱同志说，你完全同样可以要车。只是车型不同而已。周世钊从乱哄哄的长沙来到平静的首都北京，又与毛主席见了面，他感到非常荣幸。在他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并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他相信湖南的问题会得到合理的解决。他认为“高司”的观点是对的。但是出乎他的预料之外，1967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对湖南问题的表态（湖南当时简称七二七表态）支持了“工联”。说湖南的“工联”是革命造反派的组织，湖南的“高司”是保守性的群众组织。这是为什么？中央对湖南问题的表态，跟毛主席和我讲的完全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周世钊当时几次对我这样说。当时我无法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四人帮”从中搞了明堂的结果。

周世钊1967年住在北京的时候，正是北方水果盛产的时节。毛主席两次派人送了两箱很大一个的水蜜桃给他吃。由于水蜜桃又好又多，吃不完怕坏，因此他要我将一部分水蜜桃搭回长沙给家里的人吃。家里的人吃了毛主席送的水蜜桃，感到非常荣幸。

我们在去北京之前，由于当时我的观点是“高司”观点。我也参加了省人委办公厅“高司”观点的一个群众组织。周世钊在去北京之前，基本上也算是“高司”观点，或者说是倾向于“高司”这一边。因此我们去北京时，也带了一些材料去。其中较多的是“高司”观点的材料，也有部分是“工联”观点的材料。我们到了北京之后，在长沙的两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知道周世钊到了北京，认为周世钊能够通天，毛主席一定会接见他。因此长沙两派的群众组织都派人到北京来找他，向他汇报情况，送交材料，请他向毛主席汇报他们的观点及要求。他对两边群众

组织来的人都以同样的态度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答应设法向毛主席转交他们送来的材料。在中央对湖南问题“七二七”表态以后，“高司”成了保守的群众组织，从省到地县市，“高司”观点的群众组织兵败如山倒，所有组织都一一垮了台。因而“高司”方面就再也没有人来找他了。就在这时，“工联”方面的群众组织加强了对他的争取的工作。他们确定长沙市某中学的一名教师某某专门对他进行书信联系，给他寄材料。他们认为我是个铁杆“高司”派，不利于继续任周世钊的秘书。于是他们确定了长沙市某中学的一名教师某某任他的秘书。不久“工联”给周世钊确定的这位秘书从长沙来到北京，企图把我赶走由他来接任周世钊的秘书。当这位秘书到北京时，我奉周世钊之命，到北京火车站去接他。我在北京火车站见到他之后，他握着我的手说：老陈，我这次来北京的任务是两条，一是周老有病住医院（此时周世钊因病住在北京医院中央政治局委员住的高干病室内），“工联”的负责人派我来看看他老人家；二是“工联”派我来接任他的秘书工作。我对他说：某某，我也是两条：周副省长知道你要来北京后，他要我到车站来接你，因此第一我是代表周副省长来迎接你的；第二我也知道你来北京是想来接任我的秘书工作的。我的态度是当仁不让。因为我任周副省长的秘书是共产党派我来的，不是我自己要来的，更不是哪个群众组织让我来的。因此任何群众组织都无权撤换我这个秘书。只有共产党才有权叫我走，别无他人。在共产党还没有叫我走之前，我绝不放弃这个岗位，否则我是失职行为。我把他接到北京医院后，即回到北京饭店。某某某和周世钊在医院里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交了一些材料给他。某某某到北京后住那里呢？周世钊对我说：就让某某某同志和你住在北京饭店，睡我那个床算了。但是由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北京饭店坚决不同意，没有办法，周世钊只好将某某某安排在他的亲戚家里住了两晚后就返回了长沙。这时是1967年秋天了，我任周世钊的秘书工作已近10年。在这10年中，由于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我和周世钊之间一直是工作协调，关系友好。这时，也就是在这时，我和周世钊之间发生了分歧，产生了矛盾。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不那么好了，我工作起来就感到困难了。表现在：一是因为观点不一致，话说不到一块了；二是由长沙某某某给他寄来的材料，和这位想来接任秘书的某某某带来的材料，“工联”方面

是要他呈送给毛主席，但是送不上去。他怪是我从中搞了什么名堂；三是他想这次在北京还见一次毛主席，但是毛主席没有再次约见他，他也怪是我从中阻拦；四是“工联”方面派来的这位某某某，既是他的学生，他们之间观点又一致，他想要这位某某某来当他的秘书，不想要我继续担任他的秘书工作，因此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就紧张，工作就难搞。还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次，徐老（特立）的秘书徐乾同志到北京饭店来看望他。在送徐乾下楼时，我们三个人一同乘电梯下到第一楼。因徐乾有件东西丢在周世钊的房里，他们两人在一楼客厅休息，在我上六楼去拿东西时，周世钊对徐乾说：这个陈明新坏透了，我不要他当我的秘书了。我要某某某来当我的秘书。徐乾对他说：陈明新跟您当秘书这么多年，我看他工作得还很不错嘛，怎么您老一下就不要他呢？对于某某某从长沙寄来的材料，和某某某从长沙借来送给他的材料，是不是他找了王海容请她转送毛主席，可能是王海容不愿送，因而材料没有送上去。据我所知，后来周世钊自己另找了一个渠道转送。他找了周恩来总理家里最要好的一个熟人朱端绶同志（国务院建材部的一个司长）转呈周总理，再请周总理转呈毛主席。后来据说周总理要朱端绶同志转告周世钊两句话，周总理说：毛主席要我转告周世钊同志，叫他不要管这个事，要他保持晚节，请您将毛主席这两句话，如实转告给周世钊同志。周世钊从北京医院出来，在北京饭店住了一个时候之后，于1987年11月底回到了长沙。离京时中央办公厅又来了同志，问钱够不够用。我向他汇报只用了950多元伙食费还剩余1040多元，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才回去了。周世钊回长时，我给省人委办公厅当时掌权的群众组织“警卫东”打了电话，请他们派车接周世钊。但是他们没有派车接周世钊。我们到长后已是晚上9点多钟，当时没有出租汽车可租，我们两人只好租了一辆板车回家。

周世钊回到长沙后，来看望他的人特别多。在来看望他的人中，除了他的老朋友之外，主要是“工联”群众组织的人员。由于我和他在北京就产生了分歧，关系比较紧张，加上我们回长后当时“工联”在长沙准备了三个人选，由他物色一个给他当秘书。省委统战部当时掌权的群众组织“永向东”也为他准备了一个当秘书的人选，一共是四个人来争当他这个秘书的职位。这样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就更为紧张。在我们回长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实际上是不需要我为他工作。一天他到省委去，张平化问

他，周老，您这次到北京住了这么久，见了几次毛主席啊？周世钊说：只见了一次。本来还想见一次的，就是我那个秘书阻拦，没有见到第二次。张平化接着说，恐怕不是那么回事嘛！是因为主席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和您第二次见面嘛！我看陈明新同志没有这个本事来阻拦您和毛主席见面。如果他真有这个本事，我看他就了不起。这次他与张平化的谈话中，他没有直接向张平化提出换秘书的问题。过了几天，周世钊派他的大女和小儿子找丁维克和张平化同志，公开提出要换秘书的问题。张平化对他的大女儿和小儿子说：你父亲公开提出要换秘书是可以的。但是有两条：第一，把陈明新同志换下来以后，派谁去当周世钊的秘书，要由共产党来决定。任何一个群众组织都无权撤换周世钊同志的秘书，它们更无权来给周世钊同志选派秘书。只有共产党才有权撤换他的秘书，也只有共产党才有权来给他选派秘书；第二据我们了解，陈明新同志任周世钊同志的秘书工作多年，他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他不仅完成了他作为秘书要做的工作，而且他做了很多他本来可以不做的生活上的工作。换了秘书以后，只做秘书工作，生活上的事情一律不管。你们回去后，和你父亲商量好，他决定要换，你们就打电话告诉我，我们马上给他调换秘书（有一次，我陪中央统战部一位同志到张平化同志家里，张平化当着我的面说：陈明新同志做周世钊的秘书工作多年，工作是做得很好的。省委对他的工作是满意的）。在这以后，我就不知怎么回事，我和周世钊之间的关系又慢慢地好起来了，工作又好做起来了。周世钊的秘书没有调换，仍由我担任，一直到1976年4月20日周世钊逝世为止。

1976年4月，周世钊面病住湖南医学院附二医院十四病室。由于他年老体弱，病情越来越严重。在周世钊病危期间，中共湖南省委和省委统战部的负责同志，多次到医院去看望他。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还及时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毛主席将周世钊病危的情况作了汇报。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于4月20日早晨从“北京医院”选派了两名医师乘飞机专程来湘为周世钊治病。但是就是在从北京专程来湘为他治病的医师到达长沙的那天——1976年4月20日早晨6时，从北京来的医师还没有来得及给他看病，周世钊就在长与世长辞了。周世钊在长沙逝世的消息传开后，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和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以及他的亲朋好友写挽联、敬祭幛、发唁电、送花圈的非常之多，总共收到花圈将近三百个。

第十八军第十一师湘阴受降记

杨伯涛*

最后一战

1945年4月，日本侵略军以夺取湖南湘西芷江飞机场之目的，集结重兵发动大规模攻势，狼奔豕突，气势汹汹。我军层层设防，节节抵抗，予敌重创，日军攻势锐减，顿兵于我军主阵地前雪峰山下。第十八军掌握战机乘势在日军右侧背转移攻势。第十一师首战告捷，攻取日军右翼兵团后方交通补给线要点山门镇，继续挥戈直入，席卷敌阵，进而攻占公路中心右下江要点，斩断敌后方交通大动脉，将敌包围。日军被迫突围逃窜，我军大获全胜！

这次战役由4月杪开始激战至6月初旬结束，历时两月余，中国人民八年鏖战，坚强不屈，使日军深陷泥淖，“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卒致弃甲曳兵大败亏输，成为侵华战争最后一次大败仗。8月，日本裕仁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取得空前的辉煌的胜利！

第十一师这次战斗，伤亡官兵400余人。我是湖南芷江出生，有些官兵曾向我表示决心：“要帮师长保卫家乡。”他们阵前英勇杀敌，有的壮烈牺牲，他们高尚的民族气节，爱国品质，使我极为感动，极为哀悼，我征得全师官兵的同意，在山

* 杨伯涛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门战场建立“第十八军第十一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坊”一座，以慰英灵永垂崇念！

我师于清扫战场后，胜利凯旋，暂驻辰溪休息，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亲临我师慰问，并集合官兵代表千余人开庆功会，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陈诚，由重庆进程到辰溪，慰问参战各部队，并召军长胡璉和我到陈的住所晤谈，对第十八军这次战绩突出，慰勉有加，7月第十八军仍回驻常德、桃源地区，第十一师驻于桃源，开始新一轮训练。

无 条 件 投 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国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在桃源驻地师部，收听到这一广播，官兵欢声雷动！在师服务的美军官兵，开酒瓶举杯狂饮，并拔出身上所佩枪支向天空发射，有的高歌狂舞，与我军互相庆贺，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21日，驻南京的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其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乘飞机飞芷江向我国呈递降书，机上飘着长长两道白布以为标识。在我军三架战斗机监护下，经过桃源上空，大家翘首观望，又一次掀起狂欢，我情不自己，作俚句志意。

喜听日本天皇投降

电波频率道五洲，屈膝降幡出日酋，
元凶巨恶仞授首，公理正义终崭头。
八年抗战史无前，全民凝聚力弥坚，
历尽艰险制强暴，巍然屹峙震宇寰。
炎黄儿女气节高，赴汤蹈火志不挠。
雷峰山峦挥大纛，虾夷授首恨稍消。
铜柱纪功孰与伦，翘首极目受降城，
阖族欢呼眉宇昂，神州重光焕新声。

第十八军第十一师湘阴受降

1945年8月21日，日本乞降使节今井武夫一行八人，飞抵芷江机场，向中国战区总司令何应钦投降，由中国战区总司令部参谋长肖毅肃接收乞降书，并由肖指示日军投降应准备和执行的一切事宜。今井武夫向肖呈上侵华日军兵力及驻地位置等图表。最后总司令何应钦召见今井武夫，颁示命令，规定日本侵略军投降仪式，于我军先遣部队空运南京驻防完毕后，于9月9日在南京举行。由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我国何应钦总司令呈递日本国投降书，何划分日军侵占区为十五个受降区，日本各在所属地区，向我指定的部队受降主官接受命令解除武装投降，听命安排遣返回归日本本土。受降区的划分，基本上是按照抗战时各个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序列，稍加调整而成。如第一受降区：以原在滇缅战场作战的卢汉第一方面军为受降部队，日本投降部队的集中地点，规定在越南北部河内附近地区，办理投降事宜的指挥所在河内；第二受降区，以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为受降主官、日本投降部队集中于广州附近地区，在广州办理投降事宜……以下类推；第四受降区，以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为受降主官，胡璉第十八军属于第四方面军序列，由王指挥胡收缴日军枪械，王耀武将驻在湖南境内的日军投降部队，令其分别集中于长沙、衡阳、湘阴、岳阳四处，主受降区在长沙，其他为受降分区。王先遣司令部参谋处长罗幸理进驻长沙，为王布置指挥所及调动日军集中，一切就绪后，王遂进入长沙，接受日军第二十军军司令官坂西一郎的投降。这时王的直属部队施中诚第七十四军，已由芷江飞机场空运南京，担任南京的警备任务，以保卫何应钦到达南京后的安全。遂任命第十八军军长胡璉率部队进驻长沙，指挥部队收缴集结在长沙、湘阴、岳阳的日军武器。军长胡璉命令我

第十一师为先头部队，并嘱我务必整肃军容，严格纪律，乘雪峰山战胜余威，以威武雄壮的步伐，进入日军主力所在地的湖南省会名城长沙，以资镇慑日军。我遵照军长命令，激励全师官兵，于9月3日，从桃源驻地整队出发，路经常德、益阳、宁乡至长沙湘江西岸岳麓山。我师一路行军，雄冠剑佩，光耀云日。沿途父老兄弟诸姑姊妹，闻讯奔走相告，扶老携幼，竞相伫立道旁，凝眸欢颜，观看自己军队的到来。莫不额首相庆，高呼胜利万岁，情绪高昂实所仅见。立马岳麓山上，长沙城垣，历历在目，从经劫难的长沙古城，今日终于光复，作为三湘子弟的我，首先入城，怎能不顾盼自豪而扬眉舒气啊。我遂指挥部队于灵官渡口，渡过滔滔湘江，部队昂首阔步进入长沙市区。军长胡璉率军司令部随即到达，部署收缴日军武器装备的任务，在长沙集结的日军，由军部指挥部队直接收缴，另以我第十一师担任集结在湘阴日军的受降，覃道善第十八师担任集结在岳阳日军的受降。我师在长沙耀兵数日即衔命前往湘阴执行任务。集结在这里的日军是一个师团，附属后勤等特殊部队，总人数三万余人。以下是在湘阴接受日军投降情况：

我第十一师奉命前往湘阴担任受降任务后，迅即由长沙出发，沿粤汉铁路线北上直趋湘阴，约于9月10日，部队到达湘阴县城近郊。我们和日本鬼子厮杀八年，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仇敌，现在第一次和宿敌接触，我当时并没有因他投了降，而放弃对他的敌意，处处执戒备态度，部队没有迳自进入县城，我命令在距城十里处暂时驻下，派出参谋副官人员对湘阴附近地形民情及日军宿营地范围，进行侦察，以掌握情况。得知湘阴是一座滨湖小城，人口原来就不多，现在寥寥无几，城址紧靠洞庭湖东岸，水运方便，城内只有南北向街道，其他多是小巷，城东南是一带丘陵小高地，东北则是一片平原，我遂命令日军所有驻宿城内部队，除留置看守仓库物资少数必要人

员外，全部撤出县城，整个日军部队统驻于城东北平原村庄内，决定师司令部率两个团驻于城东北小高地带，居高临下可以控制县城及东南平原的日军。另派一个营驻于县城内，担任仅有少数居民的治安，这时省政府委任的地方行政官吏尚未到达，须防止奸细乘隙滋事，并对洞庭湖广阔的水域进行监视，以免发生意外；又为维护湘阴及长沙间湘江航运的畅通，派了一个团（缺一营）驻于中段的铜官附近，担任沿江巡逻和检查过往船艇；此外开放县城内外各条交通道路，欢迎高乡人民返回故居，鼓励商店恢复营业和商旅往来，准许渔民下湖捞虾捕鱼等劳动生产活动。沦陷六年多的湘阴县城，绝大多数父老兄弟，在日寇铁蹄践踏下过着昏天黑地的苦难日子，仍然威武不屈，坚持抗战，终于取得胜利，使日月生辉，湖山重光，不愧为顶天立地，气节凛然的炎黄子孙。

集结湘阴的日军概况

集结于湘阴的日军，为日本侵华军第二十军所属第六十四师团，师团长为船引正之中将，除该师团外，另附有其他后勤等特种部队，共计三万余人。该师团是遵照我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的命令，到这里集结听候解除武装投降的。日军早前为了后勤补给及保持洞庭湖、湘江水路航运的畅通，在此设置中继站基地，拥有粮弹及其他军需品仓库，从事屯积储备。日军在附近劫掠得来的粮食物资，也向这里屯积。因此可供数万人就食，供应不虞匮乏。基地内拥有中小型机动船艇二十余艘，经常南与长沙北与武汉穿梭航行。集结这里的第六十四师团，携带全副制式武器装备，但所有机动车辆及战车重炮等，则集结长沙收缴。

受降仪式

我率领第十一师进入湘阴，安营扎寨布置戒备，一切部署

就绪后，随即发出通告文件，命令日军第六十四师团师团长船引正之派代表到我师部接受任务，船引正之当即遵命派其参谋长来到我师部求见，由我师参谋长吴廷玺出面接见，吴授与书面命令并口头宣示命令要点，定于1945年9月15日，举行日军投降仪式，呈出该师团及附属部队各单位的人员马匹，武器装备种类数量，军用物资等详细表册，以便照册接受，规定收缴武器装备等的办法，规定日军应遵守的纪律，规定日军活动范围，只能在我指定地区内，不得逾越。日军师团参谋长对以上各项规定，都点头应承遵照执行，表现极为驯服恭顺。

9月15日，按期举行日军投降、我军受降仪式。是日天气晴朗，在师司令部驻地的大厅内布置礼堂，礼堂正中设一长桌，我在北面正中就座，左为副师长王元直，右为参谋长吴廷玺，两侧卫士肃立，礼堂外亦列有副官及卫士。上午九时，日军师团长船引正之中将，率参谋长及随员二人到达司令部门外，由师部副官主任翟连运及随员一人领导，进入礼堂，船引正之在前，其参谋长等人在后，立正，一齐脱帽向我行鞠躬礼，我亦起身点头以表回答。船引正之随即双手呈上投降书及所要的表册，我双手接过。船引正之又将其身上佩带的手枪一支，战刀一把，十二倍望远镜一架摘下，双手高举一一呈献给我，再一次脱帽向我鞠躬行礼。我事前未料想到有此一节，所以毫无准备，只好自己站起身来也用双手接过，幸亏师部副官段象海很机灵，迅速由礼堂外转至我的身边，将手枪战刀望远镜接过去，我才从容转过面来，对着船引正之点头表示接受。在仪式进行中我没有准备讲话，船免在此场合感情冲动，教训日本人一顿，有失体面，因此出现片刻缄默。还是船引正之态度严肃地说了几句，译员翻译过来是：

“他本人和日军全体官兵，一定按照贵军所规定的一切，负责

执行。”译完后，我再一次点头表示满意。于是参谋长吴廷玺起立，宣布“仪式进行完毕！”船引正之等后退三步，向我鞠躬敬礼，即转身步出礼堂，离开我的师司令部。日军投降，我军受降仪式胜利结束，光辉地注入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史册！

解除日军武装实施概况

我师这次到湘阴受降，任务的关键是收缴日军武器装备，彻底干净解除其武装，这一任务的完成，绝不能草率从事，需要详为筹划，事前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曾召集有关人员进行讨论，最后作出决定，各负其责。日军师团长船引正之于呈退投降书后，前期各项工作，告一段落。9月15日，即按照所颁命令程序，开始执行，其实施概况如下：

一，对日军枪炮弹药等武器的收缴，由师部军械处主任组织各团军械官负责收缴。按日军部队番号秩序，逐次就地集合，当场解除武装，经检查验收，在我军的监督下，由日军的徒手兵，运至我预设的仓库或运输船上，交我军保管；对于粮食被服及其他装备物质，由师部军需处主任率领各团军需人员负责收缴；对于医疗卫生器材，由师部军医处主任率领各团医务人员负责收缴；对于日军各联队的马匹及少数运输车辆，由师部副官处主任及辎重营营长共同负责收缴。各部门按步就班，分头进行，执行颇为顺利，同时，应该说：在日军方面也作了最大努力，他们按照命令规定，周到准备，唯命是从，没有存隐瞒私藏，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凡是收缴到的武器装备及各项物资，除日本产的大洋马200余匹，需要饲养，我命令分配到辎重营及各团辎重连使用，没有上缴外，都原封不动，如数解交第四方面军司令部。

二，我师在收缴日军武器装备开始时，按战胜国的地位，

发号施令，摆布一切，无其他考虑，一以收光缴光，涓滴不漏的方针，严格执行收缴，根本没有将日军个人身上的财物，生活用品与武器装备区别开来。师部各收缴组一开始就遇到这个问题，为了达到涓滴不漏，是不是要对每个日军，都要搜身检查呢？他们向我请示。我意识到在国际公法上，战胜国对于战败国投降的俘虏，应尊重其人格，享受应有的生活待遇。我遂下令，对日军官兵个人概不搜身检查，准许他们保存其财物及生活用品。对于粮食及医药器材，我们也尽量给予照顾，每天数万人的口粮是不能缺少的，我们还让日军留足够一段时间食用的粮食，以免断炊之虞。在日军部队里还躺着一些患病的官兵，痛苦呻吟，也亟需医药。因此我命令师部军医人员，对日军卫生医疗系统部队，如野战医院等，适当保持原状，保留医疗药物器材，对已缴械的俘虏兵，继续执行保健任务。我军械人员在复查时，发现一日军，保留有短柄战刀一把，当提出责问，这个兵吓得自杀。经过调查，得知这个日兵，将匕首短柄战刀认为是生活用品，无意中加以保存，我遂命令日军师团部将此凶器全部收集交出，不追究个人责任。

三，日本侵略军，践踏我国土地，蹂躏我国人民达八年之久，残暴至极，罪恶滔天，积累了深仇大恨！这次我师官兵到湘阴接受日寇投降，仇人相见，格外眼红，官兵多有寻衅报复，以抒积恨之意，师部有见于此，事先对官兵婉为开导，申明纪律，不准伤害日军，但毕竟有少数官兵，激于满腔义愤，特别是有亲属被害的人，一时按捺不住，而采取粗暴行动，如日军因领取粮食物资或其他公差，进入湘阴县城活动时，与我师官兵在街道上相遇，怒火中烧，不可遏止，即横眉怒目赶上前去，喝令行进中的日兵：“停止，立正。”他们伸出巴掌给日兵几记耳光，然后叫其走路，有时他们也袭用几句日语“巴格亚鲁”、“开路”等夹杂着国语乱骂一阵。这种情况我得到

报告，认为这种行为有悖于对待俘虏的国际公法，有失泱泱大国人道主义的风度，即刻下令禁止。

四，我们发现日军士官，多有携带照相机的，他们以猎奇为目的，对我国名山大川，雄关险隘，贪婪地摄入镜头，作为侵略我国的军事资料；有的片中虽属他们的鸿爪雪印，生活痕迹，但多夸张炫耀，显示皇军的威武绝伦，置我们华人如草芥；有的则是寻觅病疵，恣意侮辱我国人民形象。凡此等等。他们把这些相片珍藏起来，准备携带回日本。我发觉这个问题，经过一番考虑，认为其中潜伏着许多问题，会造成恶劣后果，遗患将来。我遂准许军需组人员，对日军士官拥有的照相机同样收缴，对相片和底片全部予以销毁，这样收缴了照相机百多架。八年抗战，我们一班军官全副精力，都集注与敌拼搏，根本没有时间来从事个人爱好，大家对于摄影艺术这一门道，都是门外汉，十足的土包子。我对摄影也从未沾边，这样多照相机，一架没有留下，都全部上交了。

五，湘江滔滔，重扬波涛，湘江是我湖南省湘、资、沅、澧四水中最大的一支，注入洞庭湖，由此出城陵矶湖口与长江汇合，沟通南北航运，极为重要。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期间，陆上粤汉铁路，水上湘江航道，同时并用，运输补给，极为便利。当日寇船艇航行在洞庭湖和湘江水域时，他们扬帆往来，趾高气扬，骄不可言。殊不知现在形势已大改变，再不能为所欲为，横行无忌了，我第十一师奉命受降，在到达湘阴的同时，即派一个团（缺一营）驻于湘江右岸的铜官。任务是维护湘江航运的畅通，同时也对日军部队相互间的活动及物资的转运，进行检查监视，受命的第三十二团团长张慕贤，率领该团（缺一营）到达铜官后，即在江岸设置检查站，对日军往来通过的船艇，都要令其靠岸进行检查，有一次，有一艘日军汽艇，由湘阴向长沙快速行驶，航近铜官检查站时，执勤哨兵，即对之

扬旗呼喊！命令汽艇停航靠岸接受检查，该汽艇竟不理睬，没有任何表示，反而加快马力航行，我检查站哨兵见状甚为气愤，即开机枪瞄准汽艇射击，将之击沉，艇上四人溺水丧命，二人溺水得救。事故发生后，团长张慕贤据实向我报告，我转报军部和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均认为日军汽艇不遵守检查规定，咎由自取，我军执行任务没有错误，并转飭日军军司令部通知全部日军，以后因公在洞庭湖及湘江水道航行，必须遵守规定，以免再发生不愉快事件。这次事件严重警告了日本侵略军，你们过去那种残暴跋扈、恣意蹂躏中国人民，横行霸道的行径，应该彻底收敛了！只有遵守国际公法及我国法令，在新的时代面前，才能和平共处，平等相待，日军在受到这次警告后恪遵规定，湘江上和风熠熠，舟楫相联，秩序井然。

胜利完成受降任务

第十一师在湘阴胜利完成受降任务，没有遇到任何障碍或棘手事件，经过师部开会检讨总结，大家认为主要是我们本着中华民族传统的豁达大度、仁义待人的伟大襟怀，采取了以下的措施：

一、根据国际公法对待投降的俘虏，绝不报复，绝不虐待，给以应有待遇，公允正大实行人道主义。

二、让全部日军集结在一个地区宿营，规定他们的活动区域，不得逾越。我师不派人管理他们，不过问其内部事务，仍按其原来部队的建制系统，自己管理自己，这样日军指挥系统没有打乱，对我师的命令，俱能迅速贯彻执行，日军各部队没有被分割隔离宿营，声息相通，不致产生猜疑，对我师表示信赖。

三、规定我师官兵除因公务外，俱不得进入日军宿营地区游逛，官兵对日军多怀有深仇大恨，满腔怒火，一与日军接

触，不能控置而发生殴辱事件，自有此规定，就大大避免了。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日军安居宿舍不受干扰，都有人身安全之感，消除了当俘虏的恐惧心理，减轻了对我军的敌意。

四、我军只收缴战斗武器和军事装备，不收缴日军个人随身携带的财物，不对个人进行搜身检查，以此日军在这方面不承受任何压力引为安慰。

五、我师给日军供给充足的粮食，保持其部队的医疗单位及医药器材，维护其必要的通信设置，日军在宿营地内可以通信。

我师根据以上方针和具体措施，对日军进行管理和收缴其武器，起着显著的安抚作用。作为俘虏地位的日军，事前不知道我军对他们如何对待？自然不免产生诚惶诚恐，忐忑不安的恐怖心理，当发现我军态度磊落大方，没有寻仇报复，予以虐待时，也就安下心来，老老实实，缴出武器装备，变暴戾为恭顺，呈现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师受降任务的胜利完成，堪称在对日战争的战场上，没有开枪发炮，获得的最后一次战役大胜利。

美军联络官参加受降

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的美军，派驻我第十一师的联络官斯乐中校，率领一部份美军官兵在我师驻防常德时，帮助我师官兵掌握美式武器装备的使用技术，开办训练班，表演示范，以后又随我师参加雪峰山抗日战役，在战场上，以陆空连络电台与空军联系，召来由美军驾驶的飞机，协同我师攻击部队打击日军，作出努力。战役胜利结束后，美军联络总部以斯乐中校作战有功，调升他职离去，另派伍林格德中校前来，继任我师联络官，这次随师到达湘阴，在整个日军投降过程中，伍林格德中校没有参预我师部对日军处理方针的一切决定，只是由师

部参谋处，将日军情况按时给与通报。当部队在湘阴驻定后，伍林格德中校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亟欲亲睹日军的狰狞面目，来师部向我请求，准他前往日军宿营地一看。我知道美军官兵，对日本侵略军同样有刻骨的仇恨，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时，美国海空军遭受毁灭性的打击，美国人是不会忘记的，我徇其请，作了安排，我偕伍林格德中校及必要人员一同前往湘阴城区及日军一处宿营地视察。首先进入城区，到我师军械处一所仓库，视察收缴的一部份日军武器，排列的各种类型的刀枪火炮，寒光闪烁，耀入眼帘。日军在呈缴时俱经过整理，擦拭一新，零件完整，尽堪使用，在洞庭湖湖畔码头停泊有日军汽艇，艇上仍有少数日军驾驶人员负责保管，伍林格德兴趣勃勃，跨上一艘汽艇，亲自动手拆卸汽艇上的发动机及其他部件，仔细检查，意在发现其特点。我问伍：“日本的机器素质好坏，和你们比较如何？”伍答：“还可以，和我国的发动机差不多。”我们又继续到近郊一所日军宿营地视察，这座村庄住有一个大队，看到营地内清洁整齐，少数居民不受侵犯，秩序井然。我们事前没有通知日军，一掠而过，没有引起日军多大注意。我们看到这些战败投降做俘虏的日军，虽然垂头丧气，缄默寡言，不复存在耀武扬威的皇军风格，但仍保持着严肃整齐的军容，亲密无间的整体团结，这样的民族是不可轻视的。我们在今后的日子里，还得对之提高警惕，着意监视提防其军国主义侵略意识再次抬头。我与伍林格德中校都具同感。我在收缴的战利品中，拣了几面日军太阳旗，几柄战刀，几支手枪送给伍，伍非常高兴，认为是最好的纪念品，不待受降完毕，所有派在我国部队服务的美军联络官兵，俱调走回美。

我师正在收缴日军武器装备之际，忽然有一位不速之客，来到师部门外要求见我，这位就是仇整，仇亦山先生。我过去

和仇先生虽然从未见面，但在我们湖南人心目中，都知道仇先生是同孙中山一道闹革命的国民党元老，很负盛名，也都知道仇是湘阴人。我闻报立即出迎，寒暄之后，我请问仇先生光临赐见的来意？先生精神抖擞极为兴奋地说：“我听到日本裕仁向我国投降的广播，就欢喜若狂，浑身劲头十足，竟至废寝忘餐，反复思维，凭我这把老骨头，也要作出点贡献，认为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兼程借道，昼以继夜地赶回我千里迢迢的湘阴故乡，争取做第一名回乡的先锋，早日省视备受苦难折磨的父老兄弟姊妹，祭扫祖先坟墓，抚摩旧日园林，以解积年思乡之苦；对饱受苦难的乡亲，鼓励他们振作起来，重建家园。”仇先生并希望：“凡是在抗日战争中被迫离乡背井的人，都要闻风而动，早日赶回故乡，光复旧物，建设家园”。我听了仇先生这种爱国思乡的语言，充满诗情厚意，非常敬佩感动。这时湘阴正处于无政府状态，社会治安秩序还不甚安定。我为了仇先生完成这次壮举，特派了一班武装士兵，由一排长率领，护送他回到故乡。仇先生回到故乡的消息，不脛而走，广为传扬，大大鼓舞了民心！我派的这班士兵护卫仇先生近旬，邻里乡党回了不少，眼见家家户户喜气洋溢，社会秩序安定团结，仇先生乃令护理他的一班士兵撤回。

1959年冬，我沐受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政府的特赦，得知仇先生离开国民党，毅然来到首都北京，襄赞人民事业。我与宋希濂同到小北街仇先生寓所拜望，仇先生喜出望外，殷勤款待，备餐留我俩长谈，回首往事，滔滔不绝，兴趣盎然。

咸 宁 遣 俘

1945年10月上旬，第十八军全军担任在长沙、湘阴、岳阳接受日军投降、收缴武器装备的任务，俱告完成，所管理的日军俘虏，亦被我国政府全部遣返回日本。第十八军奉命由湖南进驻武汉。军长胡琏率第一一八师驻于武昌，第十八师驻于黄

被，我第十一师奉命进驻咸宁，我率领部队到达咸宁后，得知日本侵略军在占领武汉时期，以咸宁城东南十余里处的温泉镇，有一泓温泉从地下滚滚喷流，认为是日军休养胜地，在温泉上建成一座小型兵营，设置沐场以供利用。日军投降后，有被缴械的日军徒手兵6000余人，被安置在此集结听候遣返，我师奉命对这批日俘担任管理。我命令日俘迁出温泉兵营，给他们安置在便于管理的几个村庄内，温泉营房由第十一师司令部及直属部队进驻。营房俱系日本式建筑，卧室内没有中国式的高架床铺，俱系枕地的榻榻米。仓库内还屯有粮食，供日军食用，这批日军也都安分遵守规定，我师同对待湘阴日俘一样，只抓住其头目，对之发号施令，没有干预其内部事务。不久这批日俘在我军的监护下，登上咸宁车站火车，被遣送回国。

我们部队经过八年之久的战斗生涯，备极艰辛，这时才得到休整的安定生活，特别是日本鬼子给我们留下一座各项设备俱全的练兵场地，我们应该充分加以利用，我师在常德装备美械，因训练时间不长，即奔赴战场，武器使用技术还没有达到熟练要求。现在又得到军部分配到师的日造大卡车三十余辆，及收缴的大洋马二百余骑，都需投入新的训练。师部于制定训练计划，一切演习器材准备就绪后，申明号令，展开大练兵，每晨在军乐队奏出的雄壮乐声中，我与官兵齐集在操场上作朝会，然后分散各就备位，进行操练。我为促进部队机械化，特开办汽车训练班，我们为了掌握现代技术，不惜移樽就教，调用日军俘虏中的汽车部队官兵三十余人，编入汽车队工作，担任驾驶技术及保养知识的示范讲解，他们非常热心尽职，不辞劳累，把三十多辆大卡车整理得锃亮闪光，对我们作出有益贡献。我规定全师排连长以上带兵官都要分批受训，我作为师长也不能例外，也是其中的一员。我对各种兵器都要亲自操作一番，学会掌握性能和使用技术，对于驾驶汽车我更饶兴趣。我

以身作则，按预定课程按时到场学习，先学开大卡车，掌握基本技术，再学开美造吉普车和小轿车。这样办了几期训练班，大部分军官都受到训练，能够掌握技术，驾驶汽车。第十一师在日军建造的温泉兵营里，展开的大练兵，持续了半年之久，直至1946年4月，军队实行整编，部队裁员三分之一，练兵始告停止，6月奉命参加内战，离开可爱的咸宁温泉。

第十一师驻温泉镇兵营期间，湖北省省政府主席万耀煌莅临视察，我接待了他。见面后万和蔼地征询我和咸宁县政府官吏相互间交往情况，对他们有什么意见？他可以处理。我听了感到关切，立刻回答：“我们军政相处，和谐无间，有事互相商议没有歧异，军民间亦相安无事，请主席放心。”会谈后我引导万到温泉及周围设施看了一遍，对温泉倚山枕河，茂林修竹，极为欣赏。

回忆军事委员会战干团女生大队

顾群英*

岁月荏苒，不觉垂垂老矣！近余年来，每每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女生大队暨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妇女干部训练班那段峥嵘岁月，顿时心潮澎湃，一段青春激情又回旋在血管里，我应将这段史实写成文章，让青年一代了解中华民族在全民抗战之大时代的一个侧面，亦为同代人艰辛茹苦的奋斗提供一个见证。

在战干团女生大队军训和学习的经过

1938年，日本军国主义大举侵犯中国领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当时，我们在常德进入军事委员会战干团女生大队（战干团团长乃系蒋中正，副团长系陈诚，教育长系桂永清）女生大队共有400多名学员，都是从武汉、长沙、常德等地招考来的，学员中有不少高中生、大学生、教授、医务人员及科技人员等知识分子，还有四个十四五岁的小妹子，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学员们统一身着蓝色纱哗叽童子军服上装，黑布长球裤，脚穿叽皮靴，胸佩徽章，还配有军毯、黄书包、水壶等用品。此外给每个学员曾发过一柄刻有“蒋中正赠”字样的匕首和一枚方形铜质的纪念戒指。大队长系康世诚，中队长军事教官均由男同胞担任。

女生大队从常德出发，徒步行军，一路上群情激昂，身背

* 顾群英系湖南常德人，当时为两个女生训练班学员。

背包，翻山越岭，露宿风餐，有时还连夜挺进。当时，我编入三中队四分队，由于年纪小，分队长吴叔昆格外关照，走前随后，生怕小妹子掉队，休息号一响，我们席地而坐，队伍里随即响起《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生死已到最后关头》等抗日歌曲声，此起彼伏，歌声激昂悲壮，使我们的疲惫不觉为之消失。

这支队伍边行军，边训练，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起床、操练、洗漱、用膳、学习、就寝，都是听军号按规定时间统一行动，例如：吃饭八人一盆菜，限定五分钟吃完，去河边洗漱、洗衣，也要由分队长发哨带队，不准擅自行动。队伍开进乡镇县城，人群从四面八方潮涌面来，聚集在两旁夹道欢迎，并且同我们一起振臂高呼：“抗战到底！”“抗战必胜！”

“中国必胜！”等口号，人群中不时传来啧啧称赞：“哎哟！来了好多女兵，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女兵！”清晨，当队伍开拔时，人们又赶来相送，有的赞扬：这些女兵昨晚住宿借用的东西全部送还了，有的惊叹：昨晚有些女兵硬是在我家屋檐下过的一夜。这些场面，有的已被新闻记者赶来拍摄下来了。

在行军的路上，我们用石灰水在道旁墙上刷写了一条一条的抗目标语，我们慰问了沿途驻军，教士兵们学唱抗日歌曲，到伤兵医院慰问演出，代写书信，队伍经过沅陵麻丝溪时，遭到一伙土匪袭击，一名教官不幸牺牲。

行军途中，每天上午军事教官对我们进行各种军事训练，有列队操练，有军事演习和防空演习等，下午在野外草坪上同学们席地面坐，听大队长康世诚以及其他教官讲课，内容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抗日宣传、军事理论和防空救护等，我们都认真地记着笔记。宿营时，我们就各自背一捆稻草铺垫在地上就寝。

队伍风尘仆仆地进驻宜昌，女生大队风风火火组织了一台

有声有色的抗日话剧，吴叔昆扮演了一个被日寇杀害了全家人而悲愤成疯的妇人，台下是一片唏嘘愤恨，我与刘瑞英同学扮演出征的男子，反复唱道：“我现在要出征！我现在要出征！”激起观众热烈的响应。我们还分头在街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活报剧，鼓舞后方民众的抗战勇气和信心。

有一次，大队还组织了“抗战必胜”与“抗战必败”正反两面的辩论会，发言很踊跃，结果，“抗战必胜”的一方获胜了。

行军中，白天常遇日军空袭，我们的队伍不得不临时疏散隐蔽，所以我们的行军必须日夜兼程，每当空袭后，我们目睹惨遭日军飞机炸死的同胞及难童孤儿，心如火焚，有的同学振臂挥泪要求拿起武器奔赴抗日杀敌前线。

女生大队从宜昌、万县分别乘轮船抵达重庆，时值1939年春。我们到达重庆的次日清晨，军委会战干团副团长陈诚向我们训话，宣布我们女生大队已全部编入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妇女干部训练班受训。

这段时期的生活，虽已成为历史往事，但回忆起来，值然历历在目，当时的许多场面，都留有照片，成为珍贵的纪念。

在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妇干班受训和实习

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妇干班设在重庆曾家岩，与金陵女子大学相邻，该会的总负责人——指导长是宋美龄女士，妇指委会下设若干个专门小组，计有：训练组、组长刘清扬，文化事业组、组长沈兹九，伤兵服务组、组长唐国清，联络组（又称外交组）、组长史良，还有生产组，主要是办工厂，例如在四川江津白沙办了一座纺织厂，还有儿童保育组、组长陈纪彝，乡村服务组、组长刘清扬。我们所在的妇干班由著名

爱国将领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担任大队长，此外，李植青等也在此任职。在妇干班受训一个月期间，宋美龄指导长对我们学员的生活、学习和思想十分关心，每周偕同蒋介石先生必来指导一次，她向我们训话，内容是抗日救国之方，她是基督徒，还引用《圣经》中的话语启示我们，教我们妇女如何注重自身的品行修养。记得有一次礼拜天，宋美龄女士身着旗袍外套，和蒋介石先生一道领作礼拜时，都分别讲了话，蒋先生说，他平时很尊重母亲，很孝敬父母，所以也很尊重妇女，宋美龄女士则告诫我们妇女要团结一致，她说各民主党派中即便是知识分子、积极分子、爱国分子，也有表现不团结的，要求妇女要团结成一条心。

这期间，指导长宋美龄还召集我们400多名学员到她住所曾家岩进食一次西餐，以倡导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进餐时，她亲切地教我们如何使用刀、叉等餐具，气氛非常融洽活跃，之后，还赠送给每个人一张她办公的四寸照片。抗战期间，物资供应紧张，为了照顾学员的营养，宋指导长亲自指示食堂研究用粉碎的蛋壳制成蛋饼当早点发给学员，红桃季节，又指定食堂给我们煮了一锅别有风味的大红桃，以增进营养。当时还有一位外国老太太工作，为我们学员的生活顾问，每当食堂开餐前后，外国老太太总是忙个不停地指导如何注意食物卫生，并亲自教学员如何洗涤碗筷等等。

给我们讲课的多是专家或社会名流。例如：冯玉祥将军上军事理论课，宋子文讲授行政学，孔祥熙讲授经济学，何香凝讲美术课，柳亚子、陶行知讲文学，于右任讲授教育学。讲课与训话的老师还有章乃器、沈钧儒、邹韬奋、周新民、邓颖超、蔡畅、李德全、刘清扬等。受训一个月期满后，大部分学员规定要参加两年实习工作，然后正式分配工作，有少数学员推荐到中央音乐学院、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复旦大学等深造。

还有些则直接分到国府五院（立法院、司法院、行政院、考试院、监察院）工作，对我们四名年纪小的学员实习期满可保送国立中学继续读书。

实习工作：乡村服务、儿童保育、伤兵服务、部队服务、生产服务等。我被分配在四川省南川县乡村服务队，协助地方政府宣传抗日救国，办成人、妇女、儿童扫盲识字班。当时农村文化落后，有的高小毕业生就可以当老师，每逢纪念节日，出墙报，画漫画，刷标语，演话剧，协助当地政府开展禁止吸毒活动，教驻军唱抗日歌曲，慰劳伤病员等。

在这期间，值得一提的是宋美龄女士在抗日烽火中所倡导的儿童保育事业，她所领导的妇女指导委员会为此特设有儿童保育组，专门负责这项工作。该组组长陈纪彝是广东女华侨。在宋美龄指导长的关怀和指导下，全国各地共办了42个儿童保育院，收容的难童计有二万人左右，每院一般有二三百名。如当时四川荣昌县第二保育院就收容了200多个无家可归的男童，曾在这里工作过的章仲义大姐现尚健在。据她介绍说：该保育院设有院长、教导主任、保育主任以及各班级老师，分别管理孩子们的学习及生活。院内开设有小银行、小商店，还养有鸡鸭，孩子们每人每月发有两块钱（是院内自印的纸票），可在院内购买笔、墨、本子、邮票、肥皂、卫生纸等用品，节余下来归自己，仍可存入小银行，一分二分都可开存票。保育院的学习生活均军事化，实行大、中、分队三级编制，一切行动听吹号或哨声。到夏天，由老师带领学生们去河边洗澡、嬉戏，这些因战争失去亲人、家庭的不幸儿童，在保育院又得到了欢乐。由于各地的保育院为难童做了大量工作，1939年，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宋美龄女士召开了一次全国儿童保育院长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42名保育院长基本上都是女性，且包括各个党派。宋美龄女士亲切地接见了全体保育院长，与她们一一

握手，记得其中有一位中年女院长，衣着男装，腰缠皮带，英姿飒爽，显示巾帼英雄气概。确实，在这全民抗战的激流中，妇女们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1940年夏季的一天，蒋介石先生与宋美龄女士乘车去南温泉别墅避暑，途经南川县（我们的住地）宋美龄女士身着旗袍，脚履高跟，仪容端庄，稳步地走进镇公所庙合楼阁，视察我们的集体宿舍，询问我们的工作及生活情况，并就地指示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积极协助地方政府工作，与百姓搞好关系。

次日清晨，我们乡服务队女指导员杨素清假称带我们全队二三十个学员去南温泉洗澡，约莫走了十多里路，来到南温泉附近，郁郁的绿荫丛里闪出一座松树构造的精巧的别墅，大家才明白是带我们前去迎接宋美龄指导长。我们在客厅里静静地等候，这个客厅没有摆设，地板却油漆一新，门窗全是落地玻璃。不一会，蒋先生身着长袍、马褂，笑盈盈地走出来，

（队长急发“立正”口令）向我们连连点头说：“同学们好！”宋指导长随即出来，亲切接待我们，和我们一起座谈。她谆谆教诲，乡村服务的抗日宣传工作，不要满足于一些表面成绩，不能流于形式，要避免“人去政息”，应当深入民众，扎根社会，真正结出果实来，随后，宋美龄同30多个学员合影留念。她娴雅地端坐在中间的藤椅上，前排学员坐在地板上或分别蹲在两旁，后排的学员立在她身后，宋美龄指导长和我们都洋溢着欢笑，这张照片和蒋介石先生接见我们的照片，及别墅像片，每人都有一张，可惜我的这些照片全部散失。

1941年春，两年的乡村服务队的实习工作期满。我们离开时，当地民众和我们依依惜别，尤其是我们教过的一些学生，把她们亲手绣制的手帕袜子底赠给我们，乡政府送给我们一面锦旗，以表彰和感谢我们乡服队在实习工作中为当地政府和民

众所做的大量工作，大家流着眼泪，燃放鞭炮，一直把我们送得很远很远，这一感人的送别场面，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两年实习结束后，大多数同学陆陆续续分别到各部门工作，我也领到大笔记本，里面题有“实习成绩优秀”字样，下端印有“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公章。在《新运妇女》杂志上，登有我们400多名学员的通讯地址，在另一期的封面上有宋氏三姐妹欢聚在重庆的照片，出于某种原因，妇女指导委员会未能保送我们4名小学员进国立学校，但发给了我路费，我于是回到了常德老家，得到舅父的津贴，端续求学。此后，我与妇女指导委员会也就不复有联系，与同学们的音信也逐渐消失了。

我们这批女学员多是当时各界妇女中的佼佼者，是历史上一支较大的抗日妇女队伍，我仅仅是其中的一名年幼识浅的普通学员。由于当时历史的局限性，对这段经历的记述不免简陋，挂一漏万，以此作为抛砖引玉罢了。

如今时光一晃，已过去五十余载，当时青春年少的大姐们已进入古稀之年，甚至有的作古，因此为使这一段历史不致沉没于世，均望海内外健在的战干团女生大队及新运妇干班的大姐们惜时撰文著述，抢救这段珍贵史料，以再现这一段被人淡忘或不为人知的历史，增进后人对抗日战争的全面了解，促进海峡两岸同胞血液于水的骨肉亲情，并为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为中华民族统一大业，在我们有生之年尽一份心力。我写下这一点回忆录，聊表我对祖国尽点义务，献出余热。

如果大姐们还保存有干训团女生大队、行军、操练、学习、工作等各种有关生活照片，以及这段时期与宋美龄女士、蒋介石先生等有关照片和《新运妇女》杂志同学录等，祈请惠献，公诸于世。

忆 欧 阳 敏 讷

刘 乐 扬 *

(一)

老报人欧阳敏讷久病不治，寂然长逝。新闻界折损了一员伏枥已久的老将，党也失去了一位诚实无私、正直不阿的友人。敏讷的道路是曲折复杂、坎坷不平的。但其一生的足迹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对湖南的和平起义和新闻事业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出身富有的欧阳敏讷，一生朴素无华，助人为乐，同情众生。少年时代，他对大革命时期暴风骤雨的农民运动所加于家庭的冲击，不怀反感，对大革命失败后极其残酷的白色恐怖，深怀厌愤。他原名欧阳刚中，先后在岳云、育才中学读书。曾经和十多个志同道合的少年同学一道探求真理，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学习鲁迅，向往苏联，大家都以深藏于内而又紧张神秘的心情，悄悄地谈论着我国的红军，关心他们的胜败。我们完全接受了在中国社会问题论战中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任务的论点，那就是：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后来称为反对三大敌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立志要为之终生奋斗。1930年，我们成立了一个“朝曦学术研究社”，办过《朝曦》月刊。在一张全体社员的大照片上，题了八个字：“貌合神随，殊途同归”。敏讷很赞成地说：“目标可以相同，路径未

* 刘乐扬现为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厅级离休干部

必一致，只要殊途同归就行了。条条道路通罗马嘛！”

中学毕业后，敏讷去北平进了一所英文专科学校；课堂学习之外，订购了几种英文报刊，阅读了不少原文书籍；因此畅晓世界事务与国际形势，为后来擅长国际政治评论，成为三十年代优秀的青年政论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二)

自1936年起，欧阳敏讷在南京开始了报人生涯，到1937年10月止，先后在《早报》、《扶轮日报》和《创导晚报》担任编辑并撰写政论，文名渐著。尤以和姚蓬子共同主编《世界文化》而名动京沪，令人刮目。姚蓬子本是共产党员和左翼作家，1933年在上海被捕后解往南京，次年5月公开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叛变革命，成了受军统控制、为复兴社效力的变节分子。左翼文艺界都熟知姚蓬子其人，于是欧阳敏讷成了文化新闻界议论的主要对象，外界盛传欧阳是复兴社分子，但他的文章又与这个身份相矛盾。

1938年欧阳敏讷到长沙《力报》任主笔半年，主管国际问题专刊，写国际问题社论，得到文化界进步人士的支持。文夕大火前，张治中派其秘书张稚琴另办邵阳《力报》，任欧阳敏讷为主笔兼《力报半月刊》主编。当时地下省委领导的《观察日报》、《塘田学院》都在邵阳（省委机关也一度迁此）。地下党员与进步人士对邵阳《力报》及其半月刊也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翦伯赞和敏讷来往尤为密切。12月下旬，我路过邵阳，在《观察日报》同黎澍、杨荣国等同志交谈之后，去《力报》看望欧阳敏讷。他邀我到一家临江的酒楼上对酌。天寒岁暮，风雪满江，楼上只有我们两个客人。

开门见山，我一坐下来就提出了一连串问题，要求他回答、澄清。“为什么和姚蓬子搞在一起？”“姚蓬子叛变之

后，成了军统的使用人员，你是否也加入了军统？”“《世界文化》的国际论文不坏，是不是红旗政策、诱饵？”“1936年春天，你还支持过我编的《更生》旬刊，何以转变得如此迅速？十年前的誓言都背弃了吗？”“去年春天我已到了广西，还听说南京有人向湖南告密，说我是共产党员，告密者都是我的熟人，难道你也有份吗？”……

这一连串问题，欧阳敏讷并未表示反感，而是平静地作了回答。根据我的记忆，他有如下的表白：

——我知道你是共产党员。西安事变后，你逃到我的家乡，我的兄弟叔侄和罗祖恩也都觉察到了。谁告密，你当然清楚。但我没有参加。我还警告过他们：不可出卖朋友。而且你已到了广西，蒋、桂还在对抗，告又何用？中统能去广西抓你吗？中统已经知道你，告密岂不多余？

——我是复兴社员，前年冬天加入的，但不是军统。军统是职业特工，复兴社不全是。一个亲戚硬把我拖进去，黄埔军人也想利用我，因为我能写文章，有点小名气。但是我不承担什么义务，不受他们约束。我倒想利用他们。长沙《力报》社长雷锡龄是复兴社骨干，但是我当主笔并不听他的。严怪愚编副刊、当记者，也并不受雷支配。邵阳《力报》有张治中的投资，复兴社支配不了。我得到了翦伯赞和许多左翼人士的支持，寄钱给叶紫治病吃饭，赶走了既不能文又鬼鬼祟祟的罗宾荪。然而许多人说《力报》的背景是复兴社，这块招牌，当然要加以利用。

——姚蓬子一发宣言，就成了废物，对军统没有任何用处了。复兴社利用他来办《世界文化》，但他没能力办一个国际问题刊物，于是我被推上去。然而姚的声名已坏，我的文章又不合要求，所以，刊物只好停办。《世界文化》并没有起到红旗政策的作用，姚蓬子毫无诱饵价值，谁也不会上钩！

——我的思想还是过去的思想，没有变，不过想得更多、看得更广阔了。希望你相信：第一，我不会反苏反共，不会当奴才和吹鼓手。第二，我会遵守往日的誓言，救国救民，抗日到底，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第三，决不卖友求荣，不会告密，不会危害你，可以为你打掩护，帮助你。我记得“殊途同归”的题辞，但愿彼此长寿，能等到这一天。

——你也许问：为什么不参加共产党，走革命的路？我要说实话：我胆小，吃不得苦。我没有去延安和敌后的勇气。尤其不能像你那样，经常过着饥饿、流亡、坐班房的生活。我们相交十年，你已经三次被捕；你说过民国十七年就坐过牢，那就是四次了，我真不敢想像。你的经历，使我不能背弃友谊。我不想参加共产党，是以为不入党也可以革命。也许我连同路人的资格也得不到承认，但一定不做反革命。你务必相信。

——还有些意见，应当告诉你们，不只是你一个人。《新华日报》当然不错，但是，如果还能多交些朋友，多办些不挂《新华日报》招牌、少一些八股腔的“新华日报”，岂不更好！不是自恃其是，唯我独尊。胡适从前向日本侵略者献策：要想征服中国，先要征服中国人的心。这个策，国共双方都用得着！收揽人心，争取多数，听取各方意见，容纳各方贤士，才能兴旺发达。蒋先生只用奴才，不喜欢人才，但底下还是五方杂处，兼容并包，轻易不会把人吓跑。这值得注意。

欧阳敏讷终其一生，大致没有离开这次肺腑之言的轨迹。

(三)

长沙大火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取代张治中，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这个广东人居然把长沙的蔡锷路改为“伯陵路”（薛岳字伯陵）。湖南人民大愤，新闻界群起指责，邵阳

《力报》自不例外。1939年8月，薛岳的亲信狗腿用镪水将欧阳敏讷的左边脸颊、耳、眼烧伤致残，并多方压迫《力报》张稚琴被迫去广西另办桂林《力报》，仍请欧阳敏讷担任总主笔。薛岳魔掌又伸到桂林，控告他“勾结奸党”，“效忠延安”，因为他请邵荃麟担任主笔，葛琴、聂绀弩先后主编副刊，刊登党员及左翼作家的文章。欧阳曾不得不于1940年9月至次年1月去江西，担任李默庵的《开平日报》副社长，以保安全。但2月仍回桂林《力报》任总编辑。

1944年广西沦陷。次年5月，衡阳《力报》在贵阳复刊，雷锡龄邀欧阳敏讷任副社长。吴启彦、张毕来、傅白芦、方蒙、王坪、兰岗、蔡克诚、黄克夫、郑洛克等都进了编辑部，仍然是一个进步班子。

日本投降后，贵阳《力报》迁回衡阳。欧阳敏讷则到重庆创办《一般评论》杂志及《报报》（文摘周刊）。1946年8月，随张治中到兰州任《和平日报》副社长。内战已经开始，兰州报纸难办，半年后，毅然改任《新疆论丛》（季刊）主编；旋到南京西北文化协会编译馆任副馆长；总之，不为国民党作“戡乱”的宣传。1948年秋，经张治中、李默庵推荐，出任程潜的《国民日报》社长。但此后主要活动是协助程氏和推动李默庵、周上凡和平起义，为武汉的迅速攻克和长沙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

1948年9月，程潜将军即派省府新闻处长刘伯谦找欧阳敏讷密谈，要求他介绍地下党员朋友，沟通关系，以便谈判和平。1949年8月的湖南和平解放，程潜、陈明仁将军率部起义，在这之前与共产党、解放军的联系谈判，必须通过一些渠道，其中一条是江汉军区，而欧阳敏讷就是牵线搭桥人。欧阳委托康

德去武汉，找到江汉军区参议成铁侠的联络员欧阳敏，带来长沙和刘伯谦、邓介松见面，又同程潜谈话一次。程方编了一本密码，交给江汉军区，双方建立了电讯联系。江汉军区所提六项意见（保护地下党员与进步人士、保护企业机关学校和一切人民财产、维持交通与社会治安、控制部队完整，等等），程氏表示全部照办，并应欧阳敏之请，将1946年即因起义而被捕的李万恒释放，送往江汉军区。

辽沈战役结束之后，李达教授邀欧阳敏到湘雅医院病室密谈。李说：程潜多次派人同他协商，请他担任程的代表，前往石家庄、平山一带面呈毛主席，直接表达程的和平起义诚意，进行具体商谈。程潜认为江汉军区的成铁侠不能完全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其作用与可靠性都不大，只有请李达当代表，直接同毛主席谈，才能得到良好结果。但是李说：“我与程颂公私交不深，又不是党政军显要人物，如何能充当他的代表？中共中央会相信我吗？程颂公左右的军政要员会同意起义而不中途生变吗？而且我正在治病，交通又非常不便，一时也难以动身。”欧阳敏力言程潜确有和平起义诚意，请李在康复后再加考虑，膺此大任。李达表示：只要程颂公继续执行江汉军区的条件，他一定尽力而为，设法将程的意愿转报毛主席。程感到宽慰。

1949年初，中央公布战犯名单，程潜名列前茅，一时反感很大，悲观绝望，情绪被动。李达、欧阳敏商谈后，由欧阳向程进言慰解，指出战犯名单是一种政治性的威慑表示和分化战术，但是，只要和平起义，自然就不是战犯了，而且会受到信任、尊敬和优异待遇。李达还表示愿意担保。程潜因此情绪稳定下来，意志更加坚定。4月15日，李达应毛主席之召，离长取道香港前往北京。行前建议由欧阳敏作为程的代表，一道北上。程潜认为只要李达愿意携带信息、担任代表，同毛主席

面谈，就不必要欧阳同去。李达保证：一到北京同毛主席见面，首先就谈程的和平起义及起义后的优待礼遇问题。李达去香港的卧铺车票、护照、证明文件均由欧阳敏讷办妥，并护送上车。5月间，李达到达北京。毛主席、周恩来听了李的汇报之后，立将程潜将军的老相识李明灏从华北军政大学调出来，送往武汉，随后追上领导进军湖南的党政军负责同志黄克诚、肖劲光、王首道、金明等，在春华山前线组成谈判代表团。李明灏先行潜入长沙和程见面。于是谈判成功，长沙和平解放。李达与欧阳敏讷对此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还有几件罕为人知的大事。其一，当李达获知欧阳敏讷与李默庵有较深的友谊时，建议他动员李随程起义。欧阳完全赞同。淮海战役结束后，立即同李默庵谈话，指出蒋介石统治已开始崩溃，不可与之同归于尽，应随程潜一道起义。李接受劝告，即去向程潜表明心迹，坚决加入起义行列。此后数月，李控制部队，协助和掩护程的活动与安全，稳定局面，最后在长沙起义的宣言上签名；不久，又在香港与高级军政官员共同发表《脱离国民党政府的声明》。其二，沙市城防司令周上凡指挥八个师居于武汉上游，屏蔽湘西北门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江汉军区传讯给欧阳敏讷，要求他设法动员周上凡起义。欧阳委托湖南银行储蓄部经理吴嵩龄去沙市做说服工作（吴周原为朋友），周表示同意。吴即帮助他同江汉军区取得联系。解放军进攻武汉时，宋希濂三次紧急命令周上凡炸毁荆江大堤，淹没武汉，周拒不执行，保护了下游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使武汉迅速解放。周亦率部起义，敞开了进军湘西北的大门。其三，中央社会部派周竹安同志设地下电台于霞凝，由周的本家周启铎（被蒋介石撤职的将军）借名成立“自卫大队”负责保护。周启铎派周传第当大队长，但只有20来支破枪。欧阳敏讷说服李默庵赠送机枪8挺、步枪200余支，又要刘

伯谦向程潜之子程元（绥署警卫团长）要来新步枪110支。又囑吴嵩龄报请程潜批准，从省银行仓库中提取驳壳枪30支。使这个“自卫大队”械精弹足，具有抗击一团人以上的强大火力，保卫了这个独立的地下电台和欧阳敏讷、康德等一批民主人士。

（五）

1949年欧阳敏讷在长沙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对建立长沙市民盟分部、促进民盟团结，做了很多工作。解放后，曾任《民主报》（民盟创办）总主笔，并与谭丕模同志分任《新文化》月刊的正副主编，但均为时不长，即随报、刊停办而罢，从此脱离了新闻界。

建国以后，襄赞程、陈起义的有力人士，都得到了妥善安置。敏讷亦任参事，但以正在壮盛有为之年，不可从此善老以终，毅然入高文华同志幕中，任工业厅研究员。继又进农学院执教，担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挂副教授衔。这也正是一个知识分子必然的归趋。1955年忽被称为“胡风分子”，逮捕审查，关押两年。后以历史上是“复兴社一毅成员”作结，无罪释放。唐麟同志代表有关部门向他道歉，承认“错捕”。事实上，按照欧阳长期办报所表现的进步思想观点，以及他对抗战战争和人民解放事业所持的政治立场，所谓复兴社这一历史问题，应该说早已彻底否定。根据他在解放前一年对和平起义所作的贡献，无疑是人民的功臣。参加民盟，就在组织上也站到革命的行列中来了！不料时隔不久，他仍调动工作，受到黜陟。不过，他也只是沉默以对，从不争辩、申诉，不发怨言、牢骚。在长达二十多年的艰难岁月中，依然舍己为人，抚养别人的子女，帮助比他更困难的朋友、同事，做过之后，再也不提。而且从不改变初衷，常说“不管有多少错误和缺点，党总

是伟大的，革命事业总是辉煌的，社会主义道路总是不可逆转的。”平反以后，待遇改善，他感到宽感，但又以为“也不必喊万岁，做什么‘功劳归于某某某’的颂诗”。搁笔四十年，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最大悲哀，但在得失取舍之间，感然“有所不为”；在为人民事业作出贡献之际，恬然“为而不有”，煌以个人幸福的代价，于平凡中完成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又是值得欣慰的。殊途同归，魂兮安息吧！

女教育家书法家周昭怡传略

王 俞 *

官宦世家 书香门第

当代女教育家、书法家周昭怡，1912年出生在湘江之滨的古城——长沙的一个官宦、书香之家。她的祖父周家鼎是清朝秀才；大伯父周介祉、二伯父周介祺都考上了秀才，而且都是名列前茅。大伯父后来中举，以四品正堂官，出任广东四会县令；其父周介珣更为聪慧好学，年仅17岁即考上秀才。当清末湖南开设警官学堂和政法专科学堂的招生启示发布后，他便报名考入了警官第二期，和林支宇、姜济寰、王钱闾以秀才资格专修警务。后来，她父亲又转入法政专科学堂，攻政治经济学，毕业后，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经济学和书法教员，历时三年之久。后有感于清朝政府政治腐败、国事日衰，遂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同谭延闿一道追随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南军，1917年参加护国运动。1920年参加驱张（敬尧）之战，后任湖南省会警务处长。1921年卸任后，寓居上海、武汉、广州等地，鬻字维持生计，达四年之久。1925年北伐战争兴起，他立即参加，并担任第二军顾问。1931年鲁涤平任江西省政府主席，1937年贺耀组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时，他都膺任秘书长职务。特别是甘肃任期，中共中央驻甘肃代表谢觉哉同志在兰州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开展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期间，与周介

* 王俞系《长沙晚报》编辑，此文根据采访整理而成

陶接触频繁、过从甚密。谢老对国民党政府腐败，给予有力的抨击，使其受益很多，遂自动放弃仕途生涯，回到长沙后依旧靠鬻字维持生计。抗日期间，湖南省主席薛岳曾多次派方学芬到其家，请他出山出任省府委员兼长沙市长，他有感于政界的污浊和时局动荡不安，坚决推辞不任，后再延请出任湖南省参议长，亦婉言谢绝。

周介陶先生民国初年在一师教学时同毛泽东同志有过一段接触，而且在当时教育界也尚有影响，长沙教育界陈奎生、李云杭、文士员、黎升洲等，都出其门下。长沙和平解放时，万民欢腾，他满腔爱国热情拥护新中国的诞生，并于1950年初，以一师教员身份，上书毛主席致敬。并以颜真卿乞米帖的故事，向毛主席“乞米”，意在余年能再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毛泽东于同年3月19日致函当时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信云：“周介陶先生信一件寄上，请商颂公或首道酌予处理。我因不明周先生情况，未作答复。周信内说：希望得米，程颂公不给，又称须得毛委任方有效。似乎社会舆论不太好。究竟情形如何，是否应予补助，请先生酌情处理。顺致敬礼，毛泽东。”待湖南省政府正拟优先照顾之时，先生以患脑溢血症不幸谢世，时年65岁。

敦品力学 名列前茅

周昭怡出生在这样一个官宦、书家，耳濡目染，教益匪浅。她家是一个颇有名声而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又住在长沙市中心的深巷赐闲湖寓内，四、五岁就启蒙读书。周先生在回顾她的儿童时代时说：我读书很早，父亲在外任职，间常回家小住，母亲忙于家务。伯母龙氏是秀才的女儿，她是我的启蒙老师，四、五岁时就教我读《三字鉴》，即是用三字句编写的《史鉴》，诸如陈叔保、尉迟恭、唐代元戎，文字很简明，我

都能够背诵下来。伯母还就三字鉴内容给我讲很多历史故事，对我的思路开拓很有启发，随着年龄的增长，文化素养的提高，从中悟出很多的道理。

她启蒙学书是从“描红”、“蒙影”入手，一开始就对我国方块字，产生极大的兴趣，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象着了魔似的，一写起来就没完没了，有时忘记吃饭睡觉。

1920年秋天，她七岁，进入当时在湖南首创的周南女子学校，她在报名的时候，教务处的老师要她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原先她父亲答应让她念新学时，给她取了个学名，叫周昭仪，这个“儀”字笔划繁多，她一时写不出来，就灵机一动，自作主张，写上“周昭怡”三个字。别看她小小的年纪，这个“怡”字不仅同“仪”字谐音，还有它的极据，这就是在她家的书柜上，刻有“怡斋”二字，其父曾给她解释说：“怡”字是兄弟怡怡，和睦友爱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怡然自得、怡然自乐。她记住了，而且在易名上很快地用上了。

周南女校校址在长沙城北太安里，相传是唐代进士刘蜕的别墅，校园环境幽静，有碧波粼粼的池塘，画梁雕饰的亭阁，嫣红姹紫的花园，池塘内有荷花，池上有石桥，名“思源桥”，这些美景时常在她眼前一晃而过，唯独令她留连忘返的是操场西侧围墙上镶嵌的名人书刻，这不仅使她热爱书法的朦胧意识逐见明朗，也使她模糊的理想逐渐呈现清晰的轮廓——立志学书法。

1926年秋，她在周南附小毕业时，由于各课成绩名列第一，可以免试，直接升入周南女中，她自觉努力，勤奋好学，培养了洁身自好、奋进自强的情操，在小学、中学期间，一直是品学兼优，为同学所钦佩、为老师所器重，正当她上中学一年级的時候，大革命的洪流，民族解放、妇女解放的浪潮，席卷“三湘四水”，也冲击着校园的藩篱，朱剑凡校长带领学生

参加民主革命，周南女校一时成了革命的摇篮。马日事变后，周南被反动派封闭，校园洗劫一空。这年冬天，她回到家里，自学史鉴和攻楷书、隶书。次年，浪潮稍平，任凯南先生任大麓中学董事长，她和姐姐双双进了大麓中学，成绩屡获第一，1929年春，周南复校第二学期，仍回周南母校攻读，1930年秋，在周南旧制中学（四年）毕业。

校园新秀 “颜公”书徒

她从小喜欢文史，爱攻书法，而湖南当时只有唯一的一所综合大学——湖南大学。周南中学毕业之后，她就和同班同学刘环一同考入“湖大”理预科，这对她并不十分理想，理预科毕业后，又直升入“湖大”本科，并转入中国文学系，始和她志趣吻合。

她时常想到父亲的教言：要以学史为主，诗词只可涉猎，特别在学书法上，她牢记父亲的教导：“学书先学颜，学颜必学（钱）南园！”她父亲对谭延闿、谭泽闿兄弟的颜书评价很高，并经常向她强调说：学楷书先学颜，学了颜字之后，还要学钱南园的，才能更好地学习颜真卿的字，钱南园独得颜的神韵。

她在大学里读书，除了完成本科的学业之外，课余课外都能自觉地攻习书法，她把父亲的教言当作座右铭，牢记在心，付诸行动，坚持天天写字。在湖大读了6年书，在练习书法上，突破较大。当时，她父亲在南京任职，她时常把自己写的字，从古城长沙寄往南京，让其父点评，每逢寒、暑假父亲归家，她总是要拿出自己写的字，请父亲指点。在她同父亲书信往还中，也言必谈书法，她父亲在信中和讲话中，鼓励她“人生有一艺之所长，便不虚生”，意在劝勉她做书法的传人，将创新的书艺传于后世，不要妄自菲薄。她对父亲的教言是铭心刻骨

的。她习书法，以颜书为根底，广泛涉猎名碑、巨帖、三希堂法帖，并钻研魏碑，兼习历代师承颜鲁公而自成大家的有宋四家（苏、黄、朱、蔡）和清代翁刘钱何，如是她对书法的源流，有了系统的理解。这样更加景仰“精忠贯日月，书法冠唐贤”的一代名流、抗安史之乱的十七郡盟主颜真卿，并牢记“学颜书更学颜之品德”，她身体力行，在青年时期，从未有过懈怠，而是自我扬鞭奋蹄在自成一家的道路上奔驰。

侧身天地 锋芒初露

由于她在湖大是高才生，很受校领导器重。1936年她大学毕业后，校长黄士衡即介绍她去湖南省政府担任见习秘书工作，次年，晋升为科员。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爆发，省政府三次迁移，这期间她曾两度离职，一次在省立长沙女子中学教国文，但仍然同驻沅陵省府保持联系，因时局动乱，她又到了沅陵附近泸溪县的浦市镇，在省立高级农业学校教书。

1939年省政府迁到耒阳，她又到耒阳省府复职，当时省主席薛岳，借口个别女职员的作风问题，密令将各厅处女职员调训永不录用。当时省政府只有民、财、建、教四个厅及秘书处，女职员仅六十余人，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寥寥可数，女职员闻讯后，出于义愤，集会反对调训，并推举她拟稿写出呈文，上告国民党中央。她在呈文中，列举十大罪状：摧残女子职业，破坏妇女参政，压制妇女解放，压制民主权利，实行军阀统治，等等，控诉了薛岳，震慑了当时省府，迫于舆论，薛岳正拟收回命令之时，中央来耒阳调查，她又亲自前往告状诉说，这样，省主席恼羞成怒，正式下令调她，她毅然抗拒调令，负笈回了长沙。

省府机关在耒阳杜甫祠堂，主席薛岳重修杜甫墓，并决定由秘书李洞庭写文章，由于周昭怡在湖大写得一手好字，总务科就叫她写。但她对薛岳的专横和歧视妇女很反感，不肯接受任务，后经主任秘书巴壶天出面讲情，请她书写，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她勉为其难地写了重修杜工部墓的修碑碑文。

书写杜工部墓碑记，是她学习颜书的第一次实践。1940年在衡阳湘桂铁路局工作，省建设厅在南岳修了座忠烈祠和纪念七七阵亡志士碑，请她书写，她如期完成了任务，这两处的书刻写下之后，她的书名已传播在省内。这也是她建国前在湖南留下的墨宝，当时年仅三十岁。

省政府薛岳借个别女职工作风问题面剥夺妇女参政的权力，虽然在周昭怡等的反对和控诉下，在耒阳造成一定的影响，中央也派员前来调查，但是官官相护，最后她们是以失败而告终，她也愤而归家。但确使年轻的周昭怡认识到旧政权的腐败，军阀们的顽固和专横。

回到长沙之后，看破了官场腐朽，不愿意再去官场沉浮，闭门读书，深研书法，得到父亲进一步的指点，她跟随其父，楷法学颜真卿，兼习钱南园，进步非常快，由于她写得一手好字，友人又介绍她当了一段时间的文书。1941年应湖南省立工业专科学校之聘去南岳工专教课。

桃李园丁 民主校长

由于她所学习的是文学，终于于1941年转入文教战线，从此开始了教师生涯。这年2月，南岳创办了省立工、农、商三个专科学校，她应省立工专校长钟伯谦之聘，进入工专担任讲师，在南岳执教三年，教学之余，与书法结下了良缘，加上优美的自然环境，性情得到进一步陶冶。

1944年夏天，日寇进犯长沙之后，直逼金城江。她离开南

岳，到达零陵铤业处与父母会合后，随家迁徙于零陵、道县、汝城、桂东等地过着逃难的生活，次年春天，在桂东邂逅省立第七职业学校校长陈宗汉，应聘担任教务主任，其姐也担任会计主任，一家温饱，全仗着姊妹俩的薪俸，得以维持。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签字投降，她便和全家一道结束了数年的逃难生活，回到故乡长沙，住在河西自己的家中！

1946年春天，为解决战后的创伤，湖南善后救济分署，接受在抗战流亡中丧失父母的孤儿，创办了一所长沙育幼院完全小学，她被聘任为副院长，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46年，国民党政府搞大选，她因家庭和亲属关系，在省会有一定的声望，被选为长沙县参议员，除列席过二次会议之外，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

1947年冬，周南女中因校长李士元与该校创始人朱剑凡先生之子朱仲硕纷争，校友吴剑、吴珊、李静、李颖生等召开校友会，以李校长年迈力衰为由，倡议校友治校整顿周南。创办人朱师母写信给周昭怡，要她去其家商谈，表示支持校友会的意见，请她到周南去主持学校工作。十七年后，重返母校工作，这对周昭怡来说，诚然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她一回母校便被校友提名、校董事会推选为该校校长，朱李双方退出周南，纷争解除。老校友吴珊领着她去见周南董事长赵恒惕，湖南大学校长黄士衡也是周南女校董事之一，他是周昭怡踏入社会的引路人，对她的到来，自然是表示欢迎和支持。次日，赵恒惕派人接她至其家，当面同她谈话，交给她委任状一张，还有很多董事也是一样支持她的工作。接受办校的任务后，首先是安定教师队伍，提高教学质量，对原全部职工加聘留用，并登门拜访老教师，听取他们对改进教学的意见，其次，是整顿总务，着眼于改善学生生活、改善伙食、消灭臭虫、建立浴室，建剑凡堂，再次纪念变卖家产、创办周南的朱先生，兴建

大门、整饬校容、改善学习环境，学生的生活，由学生会等民主管理。

这时，由于周昭怡采取民主办校，遇事由学生会派人同她咨询协商，她和学生的感情十分融洽，学校面貌也焕然一新，学生达一千人之众，很快便成为一所著名的女子中学。

解放前夕，长沙的报纸上忽然登出了一条新闻，说湖南成立了一个“反共委员会”，里边竟有周昭怡和其他二位校长的名字。她看了报纸十分气愤，立即和另二位校长登报声明：

反共委员会我们未接通知，开会也没到会，不知如何产生，慎重声明否认。启事登出，长沙警备司令部派了武装警察，身佩驳壳枪，气势凶凶地把周校长押去“谈话”。周校长心无冷病、百无惧色，当政工处长吴博夫威吓说：你们登报否认反共委员会，白长官（指崇禧）知道十分震惊，说你们不反共就送到武汉解放区！她想：要真送解放区才好呢，但不知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她冷冷地回答说：我就是不反共，要送哪里就送吧！随你们的便！当时省主席程潜出来解围说：她们既不同意，就不要强加于人了……她们才解脱，各自回到学校去了！

当时，周南师生参加革命活动，十分活跃，校内有三条渠道：一是地下党员陶蒲生老师领导的李静、李淑纯三人小组；一是彭玉成等同学联系的支部；一是黄代明同学是参加学联的负责人。校长室外辟有“民主走廊”贴墙报，社团兴起，计有耕耘社、骆驼社、萌芽社、合力社、火炬社、曙光社等，对她们的行动，她都采取支持的态度。在地下党的指导下，周校长参加了长沙的迎解工作；参加唐生智等人，通电全国拥护湖南省主席程潜将军和平起义！同时，支持和赞助学校师生员工的革命活动，学生学习小组经常在她房内开会，她收到的革命刊物及文件都交给李静，配合宣传。长沙地下组织通知

护校保产，她及时召开了校务会讨论，并决定按照地下党通知分别负责整理校产。教导处将图书仪器全部清点造册，认真保管好，作好接管准备。她亲自领导清理财务账目，埋藏现金，同贺益恩、方继杰老师，杨芷贞、谢洪福工友深夜埋藏光洋数千。教工工资、学生膳食、行政费用，都以金元券兑换光洋，置于保险箱，她亲自守护（解放后，长沙军管会文化部接管部命令接管周南，她即全面移交）。

赤子丹心 疾风劲草

1949年8月5日，解放军进入长沙市，长沙和平解放，人民夹道欢迎，周南一千多名师生到小吴门口参加迎解的队伍，周昭怡也参加了。次日，她即组织工友学生，在校内池塘打鱼劳军，整日向解放军送水送鱼送肉。

一天下午，朱仲硕陪同长沙军管会主任肖劲光司令员到周南巡视，周校长热情接待。当晚朱仲硕来校对她说：军管会接管周南，请你和创办人朱魏湘茵（朱剑凡的夫人）组织新董事会。并立即交给她一张董事名单。次日军管会文化接管部长袁仲远和孙仲启处长，到周南召集长沙市各学校教职员开大会，宣布教育政策：维持原状逐步改进。对全市教师出了安民告示。一星期后，她奉长沙军管会文化接管部命令，接管周南，办理移交。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袁任远，通知她到省政府协商周南接管事宜，要她组织新董事会。党的省、市领导肖劲光、周小舟、董纯、石磊（曹瑛）、韩淑仪等同志进入周南，找她协商其他董事和保留原董事名单，并要她提名，给予她极大的信任，并明确9月上旬成立新的董事会、新周南校管会，刘寿祺副厅长也请她去厅里当面交待学校的经济体制暂不改变，并对她说：党的领导要进来，革命传统要进来，你周昭怡要留住。新的董事会组成了，并于1949年9月7日发出聘书，

即召开了会议，原周校长作了二年来校友民主治校任内的工作报告。党的领导曹瑛、董纯、韩淑仪都参加了，推选肖劲光为董事长，朱魏湘兰为副董事长，朱超为校长、周昭怡为副校长，陶蒲生任党支部书记兼教导主任，李颖生为副教导主任。在党的领导下，组成了行政教管会、学生联合组成的校管会。从此，周昭怡又挑起了新的教育、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学生的重担，她丹心耿耿，忠诚于教育事业，不遗余力！

1950年秋天，岳麓山枫叶又一度红了。省教育厅送她去武汉中原大学教育系深造，她服从组织的分配。一年多的学习后，她回到周南。不久，因为工作的需要，奉调艺方中学工作，仍然担任副校长，她在这所条件艰苦水平较差的女校，依然是兢兢业业工作。通过她和学校领导教师的共同努力，在短短的几年中，竟很快地改变了艺芳的面貌，使之在姐妹学校中渐渐崭露头角，党和政府给了这位勤勤恳恳的教育工作者以应有的荣誉。1955年她被选为湖南省政协委员，次年又选送她去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学习（艺芳改为第三女中，相继又改为十四中，她被任命为校长）。1957年4月29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教育行政学院全体学员——全国中学校长。她在北京赶上了“反右”，1958年长沙相继开展“反右”运动，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周昭怡却一心扑在教育工作上，与全校师生认真研究组织教学。因而使十四中在1959、1960年的高考中，分别获得90%和95%以上的录取率。在非重点学校中夺魁！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学校正处在风口浪尖，党支部书记×××把她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要她靠边站，还划为“四类”，一切过左的恶劣行动，都象冰雹袭来，打在她的头上，大字报围攻，剃阴阳头，带高帽子，软禁坐“牛棚”，游塘游街，抄家斗争批判，下放劳动，但她一切都承担下来，慑于群众运动，逆来顺受。但她丹心一颗自信自己为教育事业辛勤了十八年，勤勤恳恳地

为社会主义教育出力，从没有懈怠，所以她一身正气、无所畏惧，浩然独立，熬过了冬天，但饱受精神上的摧残和人身的侮辱，最后折磨成疾，患胃穿孔，病后体衰，于1976年请求市委批准退休。

书苑女杰 为霞满天

周昭怡同志退休之后，担任了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对书法活动更加专注了。她作为省政协常委、省妇联常委、民进湖南省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和省书协主席，活动更加频繁，且随着各条战线的日新月异，古老的书法艺术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她在欣喜之余，又象幼年、年轻时代习字一样，天天临池蘸笔，奋笔疾书，她遒劲自若、苍劲秀韵的颜体楷书、行书、汉隶，深受人们的喜爱。近几年来她的墨迹处处可见：桃花源公园的碑亭，“武陵春雪”，岳麓书院记，屈子祠的“光争日月”、南岳的“极星门”等擘窠大字。天心阁、岳阳楼、王船山祠的木刻楹联，黄河碑林“剑门”题字等刻石，还有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岳麓书院记”、“石钟山记”和湖南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周昭怡楷书帖”等。此外，上海书法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书法》1986年第二期——妇女作品专辑介绍了《周昭怡书法》，发表了她的近照和书写的《杜甫五律诗二首》以及二幅条幅，并在同一刊物中以《教育英才图济世，书研颜法欲传人》为题，介绍了女书法家周昭怡。

周昭怡在谈其精研书法、继承和发扬祖国书法艺术传统时说，文学与书法统一，有益于钻研，她再次肯定自己的书法创作，师承父亲，渊源家学，并“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她告戒后学，这并未老生常谈，若能真正做到这八个字，就能受益无穷，攻书必真。她还强调“择碑要择我所爱”。她自幼习颜帖，极崇拜欣赏颜字的大气磅礴，如庙堂金刚，更称佩这位唐代名臣

品德学问。后人称颂他“精忠贯日月”书法冠唐贤”。宋代大书法家苏东坡说：“颜公变法出新意。”在书法艺术上，颜鲁公的创新精神也堪称千古楷模。她运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诉后学：书法是一门艺术，不是一种技艺，字外功夫可以使书法的格调更高一筹。她所指“书法还要字外功”，是指书法和文学、书法和品德的关系，书法和美学修养的关系，处理好它们的关系，理解其内涵和外延，有自己的审美观，才有可能下笔如神，尽情挥洒！

由于她对颜书的源流理解较深，所以在颜书上就有高深的造诣，“净虑才有翰墨香”是她对自己从事书法半个多世纪实践的概括和总结，真是“书苑女杰，为霞满天”！

她的书法在我国乃至在日本都有一定的影响。1986年9月，她随中国书法家代表团访问了日本。日本书道联盟理事长饭岛先生请她留念，她挥笔即就“椿寿阳骄叶更妍”的条幅相赠，这书法讲究形式美，使形式和内容获得了统一，为日人所称颂，回国后，又写上了《翰墨缘深》等三则纪事，在《湖南日报》发表。

她是中国书法家协会湖南分会主席，也是我国唯一的书法家协会女主席，在京参加全国书法家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她书写的雄健秀婉的颜体行、楷书法，均得到与会书法名家的赞赏，他们说：“别人写颜字多是花腔，周老是正宗，功底深厚，令人钦佩！”

她用自己半个多世纪的苦心磨炼，以一手令人折服的颜字，有力地驳斥了历来认为女子不宜学习颜体的错误观点。她洁身自好、自立于中华民族之林，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教育事业和书法艺术，赢得了桃李满天下，也赢得了书法界的无比尊敬。北京一书法家还特为她写了“格超梅以上，品在竹之间”的条幅，把她比作凌霜傲雪、愈经苦寒香愈浓的

寒梅和生命长青、虚怀若谷的翠竹，她是当之无愧的！

她在自己《七十自况》的诗中，也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恰如其分的总结，诗云：

岁月峥嵘七十春，耕耘笔砚鬓如银。

自渐冰玉才清淡，喜树艺兰品德纯。

教育英才图济世，书研颜法欲传人。

中华正是腾飞日，许国长怀赤子心。

情交戏艺 缘结须生

——我的艺术生涯五十年

刘春泉* 口述

我叫刘春泉，祖籍湖南湘潭。四岁学艺，六岁登台，人称“六岁红”，而今六十岁矣，犹不忘情于舞台，致力于湘剧唱腔改革。人或有称之“六十红”者，闻之则且喜且悲焉。早岁流浪于江西、湖南各地，尝尽艰辛。解放后，活跃于湘剧舞台，戏路渐宽，尤以唱功戏见长，盛得赞誉，并多次为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彭总、贺总、陈总等献艺，焕然有如新生。不料盛年又遭坎坷，备受煎熬。幸冰消雪尽，枯木逢春，欣欣然有不服老之慨。我以女儿之身，在台上演了半个世纪的须眉，其间生际遭逢，唯略作一述。

一、生为流浪女 他乡作故乡

1931年4日，我父亲搭班的那个戏班子来到江西张家坊，大伙借住在一座破庙里。那时候的卖艺人四海为家，三五日就换一个点。就在戏班准备转点的头天下午，怀着我的母亲却要临盆分娩了。但在庙里生孩子是要亵渎神灵的，所以地方的头人便让出一个养鸭的木棚。我刚一落地，就放开喉咙哭开了，嗓音清脆洪亮，哭得那么无拘无束，那么精气十足，似乎丝毫也不理会身外的世界是如何地险恶黑暗，正临的生活又是如何地辛酸悲凉，而只要证明，作为艺人的后代，这是一副不同寻

* 刘春泉一级演员，曾任湖南省湘剧院副院长，现任省政协常委。

常的足以自豪的噪音。没完没了的哭声惊动了全村的人，一时之间，鞭炮齐鸣，欢声一片。一大群鸭子也凑上了热闹，“嘎嘎嘎”叫得特别起劲，好象在给我配戏似的——我就这样来到了人间，一生下来就把“喊嗓子”当成一本正经的事来做了。

诗经云：“乃生男子，载寝之床，就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自古以来，特别是儒学的发展，中国的女性便处于受歧视受屈辱的地位。可我，却偏偏以一个女子的身份来到一个穷艺人的家中。“难道这死丫头天生是个唱戏的胚吗？”父亲在我的哭腔笼罩下疑惑不已，望着我又是怜爱又是发愁。

父亲刘菊芬是当时的湘剧名旦，三岁时父母俱亡，邻居一位老奶奶垂怜而抚养之。七岁时老奶奶又去世了，父亲只好给地主家看牛、砍柴、挑水，吃糠咽菜，挨打受冻。有一次无意中又闯破了女主人的隐私，只好逃出魔爪，流落湘潭城中，为一对卖甜酒的周姓夫妻收为义子。可父亲天生吃四方的命，他经常偷偷地去看江西来的湘剧班子的酒出，越看越入迷，被祖师爷甘玉生看中了，收为弟子。因父亲生得十分俊秀灵气，所以便学文武花旦，擅长蹻、唱、做，十六岁即崭露头角，在长沙有“小彭凤娇”之称，成为台柱子演员。我从小跟着父亲流浪于江西各地，江西戏了我的第二故乡。

二、迫于生活严父无奈授艺 不谙世事幼女痴心学戏

我小的时候，人人都夸我是“聪明一双眼，富贵一对眉”，此后定然是大福大贵。可我却好象是专奔演戏投胎来的，不论生、旦、净、丑，我都觉得好玩，打心底喜欢，一岁多的时候，就在台下模仿演员的动作，又唱又跳。大家见我那童稚可爱的样子，这个教我唱几句，那个又教我舞几下，这样耳濡目染，我那幼小的心哭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下，不知不觉中已深深

地埋下了艺术的种子了。父母也只当我是孩子心性，闹着玩罢了，所以并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他们内心里，却是极不愿意让自己的独女去学戏的。旧时有所谓“三教九流”，九流又分上、中、下三等，下九流是“一流高台二流吹，三流马戏四流推，五流池子六搓背，七修八配九娼妓。”“高台”就是指唱戏的，而尤其是那些在民间流浪串演的，就更是“下里巴人”，低人一等了。他们披星戴月，餐风露宿，浪迹天涯，备尝艰辛和屈辱，虽说以卖艺为生，实与乞丐无异。艺人如此，爹娘又怎能忍心让自己的儿辈再去走这“没出息”的老路呢？却不知我早已被戏勾去魂儿了，不论哪个演员演戏、做戏、排戏、练功、练唱，我都起劲地比划模仿。

戏班子每到一处都要演喜庆戏，如“十三福”、“跳财神”等，我两岁多一点就头戴虎头盔上台演财神爷的坐骑“小老虎”。后来，《马芳围城》、《杨和摘印》、《反五关》等戏，也都有了我的角色：套一件带“兵”字的红背心，手执小红绸令旗，跟着大人们跑龙套，打威喝，彩钱都分给大家，我只要得点好吃的就欢天喜地，给做神仙也不干了。

戏班子在江西经常遭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刁难，稍不如意，他们就找麻烦，甚至打人、抓人，也经常遇上打土豪、分田地的红军，红军分给我们吃的用的，还和我们同吃同睡同行，结果地方上把我们当成是红军一伙的，再也不敢接我们演戏了。江西分宜说艺人是“开锣富，停锣穷，绶罗包穷骨，富贵门前客。”有戏演大家还勉强不致挨饿，没戏演就只好散伙了。这样，我随父亲回到湖南，到长沙湘春园搭班。

我四岁就能上台演戏并蒙父亲授艺，的确也是巧缘凑合。有次《雪梅教子》的海报已经贴出去了，但原来演娃娃生的那个女孩已有十多岁了，正在学小生戏，不愿再干旧行当，而改戏就会影响营业。排戏的李师叔急得噪眼子冒烟，我走上前去

说：“只要有好吃的，我就愿演。”李师叔也是病急乱投医，便叫我示唱了一段，却是有板有眼有声有色，不由得眼前一亮，也不顾我父亲阻拦，把全剧演员都请来和我排戏，结果大家都叫好，李师叔便给我取艺名叫“四岁红小春芝”。当时同台演出的有大娘周福昆、二娘王玉兰、公公朱仲儒、婆婆易同瑞，都是湘剧名角。戏班里有的爷爷叔伯们穷得抽不起好烟，我以前总在剧场里捡好的烟头给他们抽。我知道丢在地上的烟头邋邋，又知道“小哈达”、“强盗”牌是当时的名烟，所以使到观众的嘴里去抢。有的观众正抽得过瘾，却冷不丁被人一把扯了烟去，刚要发作，待看清面前一个小男孩正拿一对大眼睛一眨也不眨地观察自己的反映，显得既顽皮又可爱，恼意不觉就消了，一下子转嗔作喜，有不少人每晚还特意为我留着很长的烟头。当我第一次登台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我顽皮玩儿到台上去了，纷纷举起烟头哄我下来，当我开口一唱，他们才恍然大悟，继而一个劲地鼓掌叫好。这样，我一连演了三个娃娃戏。姑母得知了这事，进城来把我爹骂了一顿，硬把我带回了乡下。后因我爹不肯演旦，薪水少了一半，生活困难，只得携家带口，重返江西。

艺人的生活本来就苦；意返江西不久，我爹渐渐倒了嗓子，又偏偏爱赌钱。母亲生下我后，重病一场，生活竟不能自理。有一次，我们母女俩还差点给抵了赌债。为了养家糊口，又经不住同事的苦劝和我的一再恳求，父亲含泪答应我学戏。但却有言在先：一年后学不好，就不准再提学戏的话。我从此开始跟爹练功叫噪，真正走入艺术生涯，年仅四岁半。

我爹长相俊美，所以他就学演旦行。我的长相不如爹，更主要的是嗓音高昂宏亮，没有小噪子，性格也多有似男孩处，自小又作男孩打扮，所以便学生行了。

爹教我学戏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他内心深处一百个不愿

意把还不谙世事的女儿再往卖艺的火坑里推，可迫于生活重压，加上自己对艺术视同生命般的钟爱，又很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儿超过自己。无论出于哪一种心情，他都是打字当头。心想，如果我受不了打，就会放弃学戏的念头；另一方面，他又期望打出一个出人头地的女艺人来。一般人学艺都是从只唱不做的文戏开始，而爹为了想我一冲飞天、一鸣惊人，所以唱做兼教。我也怕头个戏演砸了台，爹就不让学戏了，便拼命用功，整天象个小神经，脚不停，手不歇，又是唱，又是跳。从此，我过早地失去了天真烂漫的童年，把理应用来游玩、撒娇、上学的时光，全部花在学戏、练功、演出和养家糊口上。五岁那年，也就是我开始学第一个须生戏《卢俊义上梁山》时，我们的戏班子借住在江西一座破旧的包公庙里。腊月严寒，大雪飘飞。一天，母亲一觉醒来，发现睡在身边的女儿不见了。天还没亮，母亲壮着胆走进包公殿，跟一个开早火的大师傅撞个满怀。他吓得结结巴巴地告诉说：“菩萨驾前的红孩儿显灵了，正在香案上婆婆起舞，施法显灵呢，我一连几天都看见，一点不假。”母亲硬着头皮进殿一看，见是我为了一个荷包结（即京剧中的云手、磨手）练不好而在那里急得又是打自己的嘴巴又是跺脚，边哭边缘。一忽儿从大殿两边又涌上来一伙人，喊着“活捉红孩儿啊”，团团把我围住。母亲望着我衣衫单薄，手脚冻得发紫，跟泪不禁夺眶而出，冲上来，紧紧地抱住我，母女哭成一团。这件事直到解放后，熟人见了我还会笑我：“荷包结打好了吗？”

三、走村串巷百般苦 登台卖艺六岁红

一个人的命运，似乎往往是由一些偶然因素促成的，我演的第一个须生戏叫《卢俊义上梁山》，那年还不到六岁。没想到卢俊义上了梁山，我从此也就离不得戏台了，真是无巧不成

书。那年除夕之夜，班主从长沙请来了几位台柱子女演员到尚醴市，可地方上几个头面人物偏要点我去助兴。班主把我从酣睡中叫醒，我听说要演戏，心想好吃的东西又有了，立即就来了精神。一切都准备好了，却唯独没有合适的靴子，突然想起大伙住的庙里的“南大仙”，有人送了一双新靴子给他。班主和爹叫我跪下给大仙磕头，说明来意，同意就打三个胜卦，不同意就打三个阴卦，结果连打三个胜卦。穿了神仙的靴子，大概也便得了神助，演出很成功，台上台下掌声、叫好声、鞭炮声不断，“六岁红”的艺名也从此叫开了。我爹又喜又愁：“刘家又出了一个女戏子了，这都是命中注定啊！”我倒是一直纳闷，是不是真有天意或者神助呢？

旧时看戏喜欢同时接两个班子来对演，这叫“擂台戏”。台子的一边预备鞭炮、彩钱，另一边则堆置烂草鞋、烂泥和石头子。我一出台，总是弄得对方换烂鞋污泥，吃石头子，甚至台板子都被抽掉，我则被骂成是“化孙子”、“短命鬼”、“戏妖”、“戏精”，不一而足。彼此都是穷艺人，但为了一口饭吃，不得不你争我斗，互相仇视了。所谓“戏子戏子”，谁能逃脱被戏弄被侮辱的命运呢？

成名之后，父亲的督导更严了，演得好，退场打一板，这是要我记住下次要在原处让人叫好。如果哪场少了一个“好”字，不等卸装，扫脚就是几下重棍，还不准哭，回房后再上板凳打屁股，讲情的人越多，爹下手也越是狠。那时候的人就是信这么一句话：“不打黄金教不成，板子底下出能人。”这种残酷的父爱和缺少母爱，铸成了我性格倔强的一面，这对我的一生，的确影响至深。

四、醴甜苦辣尝尽苦中苦 生旦净丑艺出百家师

我们父女都是反演，爹演花旦，我演须生，所以要想稳棍

当当弄一碗饭吃，要想在艺术上有所造诣，就得不断地向别的名家学戏。我先后向李凤池、罗福银、瞿南生、黄菊奎等名家学过艺。那时候学戏就得花钱，名家教戏几十元一剧，小有名气的十元以下不等，无名的先教戏后送礼，此外，“三节两生”还得送礼，一点也马虎不得，否则就要被骂作“四眼狗”、

“无义鸟”，一词话，道艺不传无义子。旧时授徒的保守思想特别严重，师傅唯恐徒弟超过了自己，夺了自己的饭碗，总要留一两手。“戏班”的“班”字拆开就是二个“王”字共把“刀”，一山难容二虎，艺人们吃的都是“刀枪”饭，之间的明争暗斗、互相提防是少不了的。有一位名家的死戏、醉戏堪称二绝，父亲为我托人再三求他教戏，并表示愿意养老奉终，得到的回话却是：“六爷子已是红得不得了，再把绝技传给她，自己还吃不吃饭呐？要学就先买一副楠木棺材摆在我面前！”结果他老人家还是把他的绝技带进坟墓去了。

我以三十块光洋向黄菊奎老师学“禅台报”，来回跑了三十天，经常挨打受骂，还要帮他捶背揉脚，端水递茶，最后戏还是没学全。然两，“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社会上极重师道尊严，即使师传有不公正的地方，忍声吞气也是徒弟的本份。后来，我与黄先生在长沙长期同台演出，因他家口重，又倒了嗓子，工资还不及我的一半，所以即使我百般周全，他也觉得难堪，师徒间闹了不少别扭。1942年的一次演出《辕门斩子》，广告牌上写的我主演杨六郎，可黄老师早就把服装穿好了，我找不到服装，父亲便小声嘱咐我干脆化八贤王的装，一边留心向黄老师学习。可观众发现换了人，便不依不饶，闹起事来。事后黄班主发了黄老师的火，我们父女又摆下酒菜，当面向他赔不是，可总没有解开他心头的疙瘩。

在我的业师当中，李凤池、罗福银、瞿南生却不失为一代良师。李凤池先生教我老戏“南阳关”，见我演出得了不少喝

彩，他比谁都高兴。有人笑他“好蠢”，他索性连学徒钱也不要我的，我想学什么，他就教什么，罗福银老师则完全把我当亲生女儿看待，教我“描容上京”和“纪信替主”，她的丈夫还给我排“庄王擂鼓”的身段。有一次演出我唱错了几句台词，当她责备我的时候，我还学她近视的样子扮鬼脸，结果挨了爹的打后又送去给罗老师打。罗老师硬着心肠打了我两板，却又抱着我哭了一场。正是这种真挚的爱，使我更迅速地成长起来。

瞿南生老师擅长须生唱工，他也是近视，唱腔没有父亲的好，教的也没有那么难学，所以我的小孩心性就露了出来。瞿老师教的第一个戏是“捉放曹”，往往他唱得口干舌燥，我却拿铜钱踢“三光”玩，弄得他很伤心。我父亲跟一些前辈名流如言桂云、刘世庄、蒋炳仙、尤汉章等同事多年，唱派的造诣很深。后来瞿老师就传教台词和“搭架子”，父亲教我唱腔，很快又学会了一剧“五申会”。

旧时戏班有一条班规叫做“饱、好、勤”（跟现在的德才、资差不多），三字不全，就拿不到头等薪资。我爹要求我做到“爹是英雄儿好汉”，要能当角色，上得“品级台”。所谓品级台，就是要和名老艺人过得品，有几门特长才行。在父亲的严格督导之下，加上自己心性要强，勤奋好学，悟性也好，终于有了一定的功底。但我至今仍深深地怀念所有我的业师们，如果没有他们的心血，是很难想象我还能有什么造就的。

五、湘赣往复少安宁 舞台上下多是非

1. 第二次回湖南

1938年春天，我们一家重返湖南，同时受聘于醴陵的张铜官和南胡子两个戏班，白场在淞江剧场，晚场在湘江剧场。南

胡子是一个帮会的头目，流氓成性，不仅在演员身上榨油，还霸占了班里出色的几个女演员做小老婆。我们为了免遭厄运，设法逃出了南胡子的魔窟。1939年到1940年间，在江西安源、萍乡、袁州、万寨、高坑、西村等地巡回演出，得了不少锦旗，袁州一位叫孙振波的观众在彩旗上写着：“神童妙艺六岁红惠存。”观众的热情使我深受鼓舞，演出更认真了，练功练嗓也更加勤奋。

2. 湘潭擂台戏

1941年，我们一家第三次返回故乡，经师叔谭云培先生介绍进了许坤云的戏班。初来乍到，同行们都表现出不信服的样子。第一台戏是高腔“斩三妖”，我扮白须老生姜子牙，立即引起轰动。接下来是“卢俊义上梁山”，和“打鼓骂曹”，三天的戏票被一抢而空。从此湘潭市新舞台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火红，使得隔壁南京剧院门可罗雀。他们的班主黄元才连忙从长沙搬来不少老名角与我唱对台戏，结果仍不见大的起色。观众看我的戏是骂着进场，又骂着退场，什么“戏妖”、“庙小妖风大”、“盲桂云的鬼魂”等等，好象他们来看我演戏都是因为我的“鬼气”害的。吴少芝先生是当时有名的须生戏演员，他看了我的演出后，谦虚地向我道贺，表示对后起之辈的赞许，还答应把他的看家本事传几手给我。

3. 名动长沙

“六岁红”的名气很快传到长沙。长沙新舞台的经理胡文同特地邀请我们到长沙作短期演出，还把我主演的人物绘成2米高大的巨幅美术画，连同我本人拍着游行做广告。有的名角在湘潭折了威风，一直不服气，故意挑剔，想给我点颜色看。头一天演出“庄王擂鼓”，临开场时，长沙的老名角徐初云先生突然声称不肯给我配戏了，情急之下只好让刘仲奎老人替演。我记住父亲一句话：“千争万争不如到台上一争”，所以

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演好。徐初云先生躲在台下偷看了我的第一场演出后，急忙跑到后台叫着化妆，第二场就是徐老扮演杜月焦了。演出结束后，他一个劲地骂我“杂种”、“人妖”、“戏精”，又说要买石灰槟榔给我吃，逗得众人哄堂大笑，徐老就是这样一位极有趣的人。长沙观众送我的一面锦旗上写着：“年少艺高希再造，飘飘人间小月瑶。”我自知在湘潭和长沙的演出并不是说艺术上如何出色，超过了所有的名角，而是我同时还占了年纪小、又是男女反演的优势。我深深地感激热心观众对我的赞赏和鼓励，心里总想着如何才对得起那么多的观众，这使我长大以后更深切地体会到，艺术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人民。没有人民群众这深厚的土壤，也就没有我个人的艺术殿堂。

4. 劫后余生

苦难的旧中国很少给人以起码的安定生活。我们一家历尽漂泊之苦，刚在长沙喘一口气，1941年冬，日本鬼子又先后对长沙、湘潭进行了丧绝人性的疯狂轰炸。城池破碎，血肉横飞，惨象令人目不忍睹。我们一家经历了这而次灾难，差点阴阳分隔、骨肉分离。在长沙，当我不顾一切冒着敌机的轰炸，穿过浓烟烈火扑到父亲怀里时，仿佛是再生重逢，欲哭无泪。战争的阴云一直笼罩长沙，而国民党驻军对我们艺人却随意寻衅戏弄，黄元才又趁机报复，蓄意整治我们父女。我们一家担惊受怕，忍气吞声，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我们班里的老名角欧元霞老师在逃往独山的途中病饿面死，名丑胡甫林惨死在鬼子的刺刀之下。还有不少老艺人妻离子散，有的走投无路，卧轨自杀。我们一家逃得性命，就已经是不幸中之万幸了。

5. 还了女儿本相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9月，我还原了女儿本相。在这以前，我在台下也一直是女扮男装，西式头，对襟布褂。就为了

这一身男装，还和伪警们闹了一场“笑话”。旧社会，艺人地位低下，女演员遭遇更惨。我成名后圆脸大眼，扮相出众，成为一些不法之徒、兵痞和伪警们的追逐对象。一天深夜，四个伪警借察夜之名，突然闯进我家。我在一天的疲乏演出之后，就身着男装和衣倒在床上搂着妈妈的脖子入睡了。伪警们一见此状，竟将我短发的母亲当作“六岁红”，而将我当成一个男子，以为捞到了什么，一边吆喝着，一边将我们母女拖了起来。我不由得满腔怒火，左右开弓，把他们手提的四个纸灯笼扯得粉碎。我的性格就这样，后来演黄伯贤、杨六郎、李太白这类浩然正气、不畏强暴的人物时，便觉得很对胃口，演得也顺气。

没想到卸下了一身男装之后，麻烦更多。那些兵痞流氓在台下瞪着一双双邪恶的眼睛，他们哪里是来看戏！无论我在台上台下，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总以各种借口来制造麻烦，有些家伙甚至寻衅到家里来了，弄得我们如坐针毡。每逢演出，父母必须得有人跟着才行。一个警备司令的少爷对我们软硬兼施，百般纠缠。俗话说，惹不起，躲得起。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长沙是呆不下去了，我们偷偷地溜到乡下去搞流动演出，避一段时间又回长沙，反反复复，躲躲藏藏，没有一日安宁。

6. 与田汉先生的接触

解放前夕令人难忘的是我与田汉、安姚夫妇的接触。1947年，田汉夫妇来长沙楚南剧院看了我演出的《姚期绑子》，在茶话会上，田老评价我的嗓子好得很，扮相也佳，全身都有戏，唱派可与京剧名家媲美。但缺点是嗓子好却不留后劲，平均用力，一冲到底，年老后精力不济，嗓子就难得唱过来了。田老的指点使我得益匪浅，以后我就更加注意既练嗓又练气。后来行家评价我说：“刘春泉以唱功戏见长，尤其会唱弹腔。其嗓音刚劲明亮，丹田气足，胸腔共鸣和脑袋共鸣运用灵活，行腔曲折奔放、挥洒自如，细腻处如涓涓流水，奔放时似大江

急流。唱腔清新悦耳，不落俗套，有‘曲到尽处忽成调，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妙。”其中或许不乏溢美之辞，但若说我有进步，确实离不开田汉先生的一番关怀。

**六、旧艺人得见天日 为艺术为真理衣带渐宽 万死不悔
新社会虽遭波折 对别人对自己坦诚作人 此生无亏**

1.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解放后，我在洞庭湘剧院、市楚南湘剧团、国营省湘剧团都呆过，但一直莫名其妙地受到排挤。1955年，江青说男女反演都是“怪胎”，小生、须生戏就没有我的份了，我不得不改演旦行，工资也压成五等。但我从小唱的就是须生，为了这一行，纵然吃再多的苦，我也不后悔，所有旦行我要演好，生行也不能丢，而且还要不断提高。我从小学戏就学得比较全面，这种逆境，反而更加拓宽了我的戏路。不仅平时爱哼京剧、越剧、汉剧、黄梅戏，而且演过红生（斩黄袍）、老旦（三关排宴）、小丑（花子拾金）、旦角（时装戏）、小生（拜月记）等等。

1956年，我随市湘剧团到武汉、郑州、保定、石家庄、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济南、南昌等大中城市巡回演出达半年之久，得有机会临时预演了《拜月记》中的小生蒋世隆。田汉先生为此还写了评论文章，从我的家世、经历到戏艺特色，都作了详细介绍，着实捧了一下。没想到，这篇文章促成了我的艺术生涯的又一次转机，田汉先生奖掖后生的精神和对我的知遇之恩，令人终生难忘。

2. 怀仁堂献艺

田汉先生的评论发表后不几天，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调我们去怀仁堂给中央首长们演出。我一个旧社会低贱的“女戏子”，不仅翻身当了国家的文艺工作者，而且还能够到怀仁堂

去给中央首长们献艺，这是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事情，那心情就别说有多激动了。我心想，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也能来看我演戏，为我说声好，那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演自己的生行了。我在后台偷偷一看，原来真有毛主席端坐在剧场里！轮到我演出时，我一冲出场，就对直见了毛主席，心禁不住“扑通扑通”一阵急促的跳动，好不容易才镇定下来，差点把台词都忘了。

“演《六郎斩子》杨延昭的，演得很好嘛，是男孩吗？”毛主席这句话几天后传了出去，我一听，刹时象放下了压在心头的千斤石头，泪水也象开了闸似的夺眶而出，说不清是因为喜悦，还是为了曾受的委屈。乌云遮不住太阳，诽谤也最终折不断艺术的翅膀。我相信，只要凭本事吃饭，总有一天会获得自己的艺术天地的。

3. “啊，老朋友，又见面了！”

由于我坚信“台上见功夫”的信条，演旦行又成了另一些人的前路“障碍”，加上父亲去世后我更加孤立无助，受的委屈是很多的，“六岁红”的名气在外，往往莫名其妙地又成了被攻击的“靶子”。1958年“一打双反”运动，不知怎的竟套到我的头上，幸而不久省委给我平了反，我大哭了一场，接着，我荣幸地参加了1958年在武汉为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的演出。毛主席第二次看了《六郎斩子》，随即点名要看我的《卢俊义上梁山》。同年底，毛主席又来长沙视察，在省委小礼堂举办舞会，我为他老人家清唱了一段《胡迪骂阎》高腔。毛主席听后鼓掌欢笑，鼓即把我拉到他跟前坐下，问我：“你是一贯演湘剧吗？六中全会时《六郎斩子》和《卢俊义》就是你演的吧？”听到我说是的，他又说：“你的戏演得真好，下次来长沙，可还得演戏给我看噢？”说着，主席站了起来，请我跳舞。我第一次发现毛主席原来是这样一位宽厚和藹的长者，原来那种紧张和不安消失得无影无踪，只觉得心中洋溢着

无限的幸福。

“啊，老朋友，我们又见面了！”主席每年都要回湖南二、三次，一见到我就风趣地称我做“老朋友”，哪怕我在老远演出，也要派车接我回来。我总是第一个和毛主席跳舞，接着是左大玢。我们在一起说笑，无拘无束。那是1960年的一天，我陪毛主席跳完一曲舞坐下来休息。主席笑着对坐在身边的左大玢说：“你们青年人不但要向刘老师学习，尊敬她，也要关心关心她的个人问题，帮她找个对象嘛。”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1959年湖南曲艺大汇演，我团的《生死牌》、《玉麒麟》、《追鱼记》、《天门阵》等六台大戏参加演出，四个由我主演，全获得一等奖。其中，《生死牌》拍成了电影，并参加了为国庆十年的献礼演出。我还写了《我是怎样演黄伯贤的》，载于当年10月的《湖南戏剧》。1985年，光明日报出版社编辑的《谈艺录》一书，又收录了我的《演黄伯贤的体会》一文。可以说，黄伯贤是我塑造的最成功的舞台形象之一。演出结束后，李维汉在政协礼堂宴请我团领导和《生死牌》主要演员。贺龙元帅又在北京饭店为我们设酒宴，田汉、欧阳翰笙、周扬等湘籍文化名人也参加了宴会。接着毛主席请我团18位同志到中南海做客，特意要我带胡琴去多唱几曲。朱老总、周总理、刘主席、李富春副总理等中央首长也来了。毛主席风趣地对我说：“梅先生唱旦角，你父亲也唱旦角，旦角又教出了生角，这很好嘛！你要多向老一辈演员学习，还要传教好年幼的一代。”临了，主席提出要我送他两个《生死牌》剧照和几张平时的便照，第二天，我就请人送去了。

记得1961年，陶铸同志陪周总理在广州看湘剧，看第一出戏《打鼓骂曹》时，鼓掌六次；第二出戏《生死牌》，鼓掌十多次。从1956年起，我曾二十多次荣见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

长。王勃的《滕王阁序》有言：“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有那么多热心的观众，更有毛主席、周总理这样的伟人欣赏我的表演，肯定我的成绩，我这一生，纵然再有千百次的不幸，却也不会感到遗憾了。

4. 上海有了湘剧迷了！

周信芳先生和董芷玲、袁雪芬、赵晓兰等名流一起看了我的《生死牌》后，高兴地说：“过去上海有越剧迷，现在又有了湘剧迷了！”

周信芳先生是当时全国一流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唱的是京剧的功须生，可说跟我是一个路数，毛主席就曾说我“有马连良、周信芳之妙韵，言菊朋不及也”。1956年在北京演出，周先生来到后台，大声问道：“是哪个男孩演六郎呀？”走过来一手就把我头上的网罩一抹，却不料“刷”的一下，眼前帘子般挂出一头长长的卷发来，不禁呆了半晌，继而相对大笑。第二次到上海，周先生请我团前辈徐绍清、杨福鹏等人吃饭，我也在坐。1959年到上海，算是第三次见面了。周先生显得十分高兴，他答应破例收我为徒，把他的看家戏《徐策跑城》、《追韩信》传给我。可惜领导要我必须回长沙接受任务，学戏未成，成了终生的憾事！

5. 在文革中

1959年，在毛主席的关怀下，我终于摆脱了不公正的待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当上了湘剧二团团长和省政协常委。能够一心一意地从事艺术，这是我一生的追求，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然而，1966年，残酷摧残艺术的史无前例的一场大灾难降临了。我被迫挂牌游街，被打得九死一生，以致双腿后来得了骨纤维增殖，天阴下雨则痛，几近残废。之后又被下放到江永农村劳动改造。文革当中，著名湘剧艺术家徐绍清不堪忍受折磨，被迫自杀了，杨福鹏也被迫害致死。我

下放期间曾被叫去打隧道，站在齐腰的水中劳动达半年之久，我几度想一死了之，但自杀就会被说成是“反革命自绝于人民。”我由一个社会最低层的人成为国家的文艺工作者，又成为一名党员干部，我深深地感激新生活给我的慷慨赐予，对党怀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本质的爱，如果背上“反革命”的罪名，那真是叫我死不瞑目了。所以我拼命地干活，心想不能自杀，就累死在隧道里，免得受那么多的活罪。我的一生中，大概这是唯一软弱的一次，如今想来，又是辛酸又是惭愧。中国有许多老话，诸如：“石出于水，流必湍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等等，这些话都有它一定的道理，文革中许多人的遭遇都是例证。我出伶较早，成名也早，从解放前一直到文革后，所遭受的刺激、排挤、损害、侮辱，是可想而知的。幸亏我从小就在踢、打、滚、爬中成长，在飘泊流徙中长大，一切苦楚我都能承受，但唯独不能让我离开舞台和练功场。不让练功，我就偷着练，不让演戏，我就主动去帮助公社和大队的文艺宣传队排演样板戏，过过“戏瘾”。但在舞台上，我几乎被人们彻底淡忘了，可毛主席还记得我的名字，问刘春泉哪里去了，提出要看我的戏。1975年和1976年，我两次为毛主席拍摄内部录像共十多个剧目，这使我在精神濒临绝境的时候看到了春天的希望，坚定了生活的信心。1972年，我被强迫退党，但我月月把党费积存起来，等待那么一天。可主席不等我重返舞台就溘然长逝了。当权者竟不准我去参加悼念，但毕竟众怒难犯，最后把我安排在最后一排。回忆往事，念及自己的遭遇，悲恸欲绝，一下子就昏迷过去，结果在医院打了几个小时的吊针才苏醒过来。主席他是否听到了我的悲声了呢？

6. 观众称我“六十红”

1977年，我终于能够重返舞台，但只能演配角。虽然工资

长期压着不给提，虽然直到1980年才给我恢复党籍，虽然“文革”中留下一身病痛，但这些根本算不了什么。我已经年近百岁了，我得珍惜这又一次艺术春天的到来，珍惜夕阳正红的时光，只要能够演出，能够搞唱腔改革，能够多为党培养几个好学生，让艺术之树长青，则心满意足了。

1978年上演《林冲》，原来扮林冲的那个演员嗓子坏得不行了，临演出时，领导要我顶演林冲，我其时大病未愈，又来了例假，但又不好当面对男同志说，又想想机会难得，便咬一咬牙上场了。登台一亮相，观众欢声雷动，掌声如潮。演出当中，台下一直象开了锅一样议论纷纷：

“看不出‘六岁红’还这么年轻，跟当年几乎没什么两样！”

“莫说六岁红还这么行，就是差点，我也捧场！”

“还说什么‘六岁红’，以后该是‘六十红’啦！”……

观众就是裁判，就是上帝，没有比被理解更幸福的了。下得台来，泪水冲眶而出，我不知这是第几回流下如此滚烫的感激的泪水。

同年6月份，江苏昆剧团来长沙公演，观看了我主演的《打鼓骂曹》后，便邀请我团去江苏交流演出。那是8月份，我右腿的伤发作了，经检查是得了骨纤维异常增生，我带病登台，演出十分成功，每次谢幕，观众非要我取下挂须、纱帽不肯出场。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宴请全体演员，并特意向我敬酒致谢，还和我们一起拍照留念。随即我们又往无锡、常州、苏州等地演出。每到一处演出的情景，依稀如昨。回首当年，感慨万端。

七、要生存要发展冀湘端老树吐花

不泥古不守旧求唱腔阳端翻新

学无止境，艺海无涯。我懂得成端只能说明过去，只有在

艺术的道路上不懈追求，不断攀登，才能永葆自己的艺术活力，推动艺术不断发展。1982年我主演了《李白戏权贵》，这是一台唱做并重的大戏。我注意从前辈艺人的舞台形象中提炼精华、取其特点，将老生的唱工与靠把的做派结合起来，从人物出发，从生活出发，该唱则唱，该做则做，做到举手投足，徐疾得当；亮眼舒眉，入骨传神；换形移步，动静相宜。不仅要渲染出李白醉态的真，更要注意醉态的美；不仅要表现他狂放不羁的性格、“戏万乘如僚友，视俦列为草芥”的精神，还要表现他才气横溢、风流倜傥、潇洒豪放的气质。而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要求唱腔必须富于变化，能表现各种不同的人物及其精神风貌和情感、行动的跌宕起伏。但湘剧旧的唱腔平坦、重复、变化的步子不大，缺乏表现力，限制了演员的创造和合理发挥。所以在设计唱腔时，我着意兼收并蓄，广采博征，吸收生旦净丑各行的优点，还在汉剧和评弹中吸取营养。如第四场“将进酒”这一大段唱腔，我以四平调为基础，吸收长沙弹词的一些特点，然后化以花腔。本是上下乐句反复进行的单乐段形式，经改革后，上下乐句均有了变化，听来如行云流水，酣畅淋漓，比较好地唱出了李白自信、自负、乐观、豪放、清高、孤傲、愤怒、蔑视等种种错综复杂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感情，诗情、画意和哲理也有了比较充分的表现。

我的唱腔底子打得比较扎实，从小耳濡目染，从师多、练得多、演得多、看得多、听得多，所以设计唱腔时也能颇得神助，设计的花腔不仅变化丰富而且自然，能很谐调地配合人物的动作和语言，表现不同的思想情感。如在《李白戏权贵》中，根据不同特色的人物设计了不同风格的唱腔。唐明皇已从一个较有作为的皇帝堕落成不思进取、声色犬马的昏君，这时又不得不以万乘之尊下求李白进诗，所以便唱得悠悠的，左右摇摆，拖泥带水；杨国忠不学无术，所以唱得总是不伦不类，轻浮浅薄；

而高力士则理所当然是怪声怪气，杨贵妃则娇嫩做作。李白则应唱得干净利落、气派潇洒，慷慨激昂、威武刚健等兼而有之，而为表现其桀骜不驯、蔑视权贵的精神，又要设计出他醉酒时阴阳怪气、诙谐、跳跃的唱腔。

对于我的老生唱腔，同行中争议颇多。有人认为“花腔”太多，甚至嘲笑为“香港歌曲”。我还是不改初衷，谨遵师训：千争万争不如台上一争。《李白》演出后，在全国引起关注，这足以证明我的努力是有收获的。我的唱腔改革从《六郎斩子》开始，继《李白》后，又进行了《陆逊拜相》的唱腔革新。1982年到北京汇报演出，又到全国各地巡演，都获得很高的赞誉。《湘剧新苑》、《长沙晚报》、《戏剧电影报》、《主人翁》等报刊杂志也都对我和我的演出作了很高的评价。

1986年，我随团赴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地方戏剧展”演出。9月24日抵港，25、26日在北角新光戏院先后演出了《拜月记》和《生死牌》，受到香港群众，特别是湖南老乡的热烈欢迎。《生死牌》在香港演出的成功，使我想起内地观众称我“年轻的老艺人”的话，顿时觉得自己好象真的年轻了几岁似的。

八、惜取夕阳无限好 何尝惆怅近黄昏

1987、1988年，我以年近花甲之龄到省内城乡演出，有的观众说：“还叫什么‘六岁红’，该叫‘六十红’了！”有的说：“这叫‘枫叶红于二月花’，正是夕阳红！”……是的，即算是“红”吧，也毕竟六十岁了，是秋天的枫叶，是傍晚的夕阳了。观众的溢美之词虽然龄了我无比鼓舞，但老来的孤独却不可避免地时时袭上心头。回想我的一生，二岁半就登上舞台，又过早地接过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很少得到家庭的温暖幸福，却备尝生活的艰辛和屈辱。舞放后，人生的大喜大悲依然

一个接一个如浪而至，我牺牲家庭幸福，三十五岁才结婚，然而患难当中短短十年相亲相爱的日子转瞬即逝，老伴黄湖在郁郁不得志中被肝癌夺去了生命，终年不到五十岁。我无儿无女，但在生活的艰难中，我把许多苦命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儿女，不惜脱下身上的衣服、取下手上的手表，不遗余力去支持那些孩子，毫无保留地赋出我的母爱。是的，我的富有不在于我的钱财、我的名气和地位，而在于我赋出的爱，尤其在于我为艺术而赋出的青春和劳动。我的最高奖赏是观众的掌声，我的骄傲则是对苦难、对挫折和屈辱的最终胜利。命生之年，我希望能多教几个好学生，并且好好地总结整理出自己的艺术心得，我想，也许这是我留给后人的最好的遗产。我始终感激着时代、感激党，是党把我培养成国家一级演员，又曾担任湘剧院副院长、省政协委员，受惠实多。献身社会，服务于人民，这实在应该是我至死不渝的使命。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将以此自勉。

（陈福元整理）

长沙影珠山下三怪人

朱茂怡*

由长沙市北门，循长岳古道，过水渡河，远远就看见西面一座横亘在长沙、汨罗两县之间的大山，这就是著名的影珠山。

影珠山位于长沙县东北部，呈南北走向，长约7公里，周长约30公里；有大小峰峦70余座，主峰海拔509.4米。

1941年日寇犯湘，败退时我军阻击于影珠山丘壑之间，敌方伤亡惨重。影珠山下，曾建有我军烈士陵园，刻对联有云：“倭寇未曾还片甲，英雄据此障长沙。”

影珠山土壤肥沃，阡陌连绵，居民耕读之风，久而弥盛，钟灵毓秀，辈出人材。风气开放之早，为湘省之冠。奇山怪水之间，它孕育不少有志之士，如辛亥首义之黄鏊、英伦蹈海之杨笃生、教育家杨昌济，最早留日的女学生许黄萱佑创办隐储女校，彭海颀创办开物农校，比比皆是。笔者至亲好友聚居其地者亦甚多，先辈为述近代富传奇性称为“怪人看”，有如下三人：

一、李承干

曾在全国政协负责文史工作，原《大公报》名记者徐盈，曾在40年代写文章说：“中国有几个21兵工厂？兵工界有几个李承干呢？”

一位熟悉60年来中国工业史的人也感叹道：“谁能象李承

* 朱茂怡现任长沙县政协委员。

干那样，终生不娶老婆，永远是穿着一套蓝布工作服，和工人们一起作息呢？”

长沙工商界一位老先生说：“李承干到老不娶，为官一清如水，一片赤诚爱祖国，不畏权贵，敢于坚持正确意见，的确是一位“怪”而可敬的人。”

李承干（1888——1959），字直卿，湖南长沙人，出生于长沙县今开慧乡影珠山下郭家山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他曾留学日本，先后在大阪预备学校、关西中学、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岡山第六高等学校就读。1914年入东京帝大习电机，后又在英、德诸国留学。“湖南蛮子”的夹生脾气，是举国闻名的。要认识和理解李承干这个人，只要从他的名和字中的“干”字和“直”字去琢磨，就可以想见其生平了。“干”——忘我劳动，干劲冲天；“直”——直道而行，坚持原则，他就象古书上说的“强项令”一样。

如果说李承干的古怪脾气，是从他娘肚子里带来的，也不尽然。

他出生在清朝洋务运动后期。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从陶澍、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一脉相传，早已深入人心。后来维新高潮汹涌于湖南思想文化界，李承干正当少壮之时，耳濡目染，形成了他发愤自强、刚毅不屈的气质。

李承干是我国第一批公费留日学生，抱着工业救国的志愿，研究科学。回国以后，在军阀混战中过日子，眼见大批军火购自外洋，滚滚金银流入外国人口袋，心里十分难过。北伐胜利后，给多少人带来了希望啊！李承干也没有例外。民国17年，国民政府成立兵工署，第一任署长是陈仪，也是早期留日的，李承干和他有些渊源，陈仪也有意罗致李承干。一次，李应邀相见，他便抓住机会，向陈提出两项振兴兵工的建议：一是兵工厂不能办成养老院，要有生产，有工作，要设法降低产

品的价格，要和外国人竞争；二是不要用不懂工业的职业军人来当兵工厂长，让外行人来干涉内行人做事。陈仪是政学系头头，一个手腕圆滑的官僚，以为李承干只是书生迂腐之论，便一笑置之。

30年代，抗战军兴。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兼长财政，风尘仆仆地每天忙于举债、借债。这时的钱，多半用在购买军火上。那时，李承干已经升任金陵兵工厂厂长了。他去问新到差的署长俞大维，俞也是留学德国的。李承干单刀直入地问道：

“我们的军火为什么非买外国货不可？”

“因为外国货比我们自己造的便宜。”

这是个言之成理的事实，无法再进言，你猜李承干咋说。

“你新订的这批外国子弹要多少钱一粒？”

“外国货每粒只花七分钱，我们汉阳造的要九分以上。”铁的事实又堵住了进言者之口。不料李承干倏地站起来，冲着俞署长吼道：“署长，我来承造！我只要六分钱一粒！”

“你——”俞署长摇摇头，压低嗓门说：“老李，你不要开玩笑！”

“什么开玩笑！我敢在你跟前开玩笑吗？我立保证书，办不到你依军法从事！”

俞署长是很有名气的兵工专家，他知道“便宜不是货”这条商界规律，他耐着性子说：

“那么，你试试看……”

金陵兵工厂于是便开始以“六分一粒”的单价承造步枪子弹。由于李承干对一批骨干领导得法，待工人们如同家人，大家统一了思想，拧成一股绳，胜利愉快地完成了定货任务，并续签了生产合同。金陵兵工厂赚了钱，得以在汤山建立起新式武器和弹道等研究机构。李承干勇气十足，要追上时代，要为中国人扬眉吐气。

南京沦陷之后，李带领员工数千人很快就在重庆嘉陵江北恢复成立了21兵工厂，一面盖厂房，一面便开始生产。他的口号是“开工第一，出货第一。”他的属下都愉快地接受这个因应抗战急需的现实号召，万众一心，争取新的胜利。

李承干好象是个很急躁的人。他批评某些人的作风：

“我不赞成一定要等山洞挖好，机器进洞装好再开工的办法。我们的抗战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关头。敌人不会等我们从从容容造出要他们的命的东西，难道我是操切从事吗？我还主张我们事先要有重建的准备。敌人把我们的厂炸了，我们再盖新的，只要我们的人不死完，我们总会有办法来复工。”

民国28至30年这三年中，重庆几乎每天要放警报。兵工厂被炸了，马上重建重修，最久的一次修复工程，也没有超过一个月。没有李承干一股蛮劲实干苦干的精神，是不能出现这种奇迹的。

李承干每次在他的工厂被炸后，总是以身作则，奋不顾身地上前救火，一边要念念有词地说：“炸中我们，我们有能力修复。炸了我们，少炸别人。”他还要急匆匆去巡视防空洞，看看洞里的职工家属有无损伤，大家无不为之感动。

有个时期，上级要他把厂子疏散到某地的大山洞中去，避免轰炸受损。他没有听从，为国家节省了一百多万元的费用。他自己却得了一个不客气的评语：“该员不知建设。”为这件事，后来有人问过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这官员否认有这回事，并说：“我们每年为李厂长请奖还来不及，哪里会批评他呀！”

在昆仑关战役前，李承干奉命为36军验枪，检验毕，李承干叹口气说：这7000多支枪中，依照严格标准，能用的只有7支。李不主张调这个部队上前方，说这无异叫他们去送死。事后，有人怪李承干不该这样说。李说，我要为几千条士兵的生

命负责。

笔者曾听到与李承干有乡谊的21兵工厂工程师黄时康说过：“李承干当兵工厂长，已是少将军衔，工资级别也高，但他经常囊无一文。他每月的收入，除了经常照顾同乡同学，都用在举办工厂福利事业上。他经常过问油盐柴米琐屑，或为工人家属找谋生门路。”

抗战刚胜利，国民政府要紧缩开支，兵工厂经费减少了，他还不那么着急，说是工人要裁减五分之一，他大起反感，开门见山对兵工署派来的人说：“我这里没有闲人，每个人都有工作，一个不多，也一个不少。减人这事我办不到，就是蒋委员长来，我也无法遵办。除非叫我滚蛋，那我 可以不管。”

“我肩上承担了全国兵工生产总额的一半。我这个厂请不要与一般工厂同样看待。”

李承干生就这么个犟脾气，他心口如一，说到做到。不合国民党那些贪污无能的官吏的口味。1948年他辞职到南京，转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任永利南京厂副厂长，不久改任公司协理。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撤退时，传说俞大维要李承干同去台湾，许以高官厚禄，李坚决不去。解放后，李承干参加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会议，1951年参加民主建国会，任中央常委。1952年在重工业部和中央财委工作，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第一、二届代表大会代表和执委。周恩来总理深敬其人，1955年任为全国度量衡局局长，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

《发展我国计量学技术规划》，被列入《国家12年科学发展规划》，为我国计量事业奠定了基础。

1959年，李承干在北京病逝，《人民日报》刊发了讣告。

二、杨宣诚

1943年春，笔者出差重庆，事毕，留在经济部战时生产局工作。偶然见到一位老乡，扯起来，还是我的亲戚长辈，经常过往闲谈，听他讲起一桩故事：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薛岳，前不久来渝述职，对一些湘籍老牌军政人员，分别有所馈赠，杨十三长子也得了一笔。当时杨正缺钱过年，但他毅然完璧归赵。他对人说：“我杨十三一辈子就是不要这种钻狗洞的钱。”我说：“外官向京官送礼，原是封建时代遗下来的老传统，名目繁多：过年节称“节敬”，夏天“冰敬”，冬天称“炭敬”，小小京官尤其是穷翰林、御史、谏官，俸给皆薄，无不眼巴巴望此以资挹注。这些钱无非搜刮民财，当然是不干净的。但是这位长沙老前辈杨先生在年关拮据之时能加以拒绝，事出今日，大可以风。老乡颇韪我言。

杨十三长子何许人也？原是长沙东乡影珠山下另一名“怪人”。他名宣诚（1889——1962），字朴园，身材魁伟，蓄人丹胡子，高约二米，故有“长子”之称，我曾见其照片。他老家在清泰乡板仓杨公庙附近张家大屋（今开慧乡）。先世都以耕读为本，家风朴实。我和我的侄儿隆誉（又名杨赓）是中学同学，葆吾是多年心性之交，虽睽别多年，但过去听他们说他们叔父的生平不少。

杨宣诚早年留日，后又留学英颇，习海军，是湖南唯一的一位海军中将。但他一生没有在海军服务过。他对日本的政情民俗深有研究。抗战期间，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王芃生（醴陵人）并以“日本通”著称，深得中枢倚异。又经常与《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合作，赓写《星期论文》，讨论战局发展诸问题，其分析与预见，非常精辟，深为社会注目。

早在民国十一至十三年，正当赵恒惕在湖南搞联省自治

时，杨宣诚出任交涉司长。日本租我旅顺、大连逾期不还，湖南人民曾举行6万人的游行大示威，向日本领事馆提出警告书，实行经济绝交，日本帝国主义者狗急跳墙，日舰伏见号水兵在小西门登陆，枪杀示威群众，造成伤亡，连国民小学的学生黄汉卿也遭惨杀，激起群众强烈愤怒。这就是1923年举世闻名的“六一惨案”。这个交涉是杨宣诚办的。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杨与日方反复折冲，持态严峻。由于杨为人正派，长沙人对他也还未见有何非议。

我还听见一位老人谈过杨宣诚在北京谒见外交总长顾维钧的故事：1924年，杨宣诚奉派去北京外交部办理公事。这位老留学生不谙中国官场积习，第一天雇马车去，门役请他循序挂号登记，听候传见。第二天又说总长今天不见客。第三天他拿出湖南省长公署的紧急公文，才勉强进了楼下的会客室，久坐仍无动静，见几上放有雪茄，便取一支燃着消遣，为侍者瞥见，粗声粗气地对杨说：“这是小的们掏钱买来招待国宾的……”杨不能堪，摔烟负气而出。归途恰遇留日同学某君，告以经过，某君笑杨书生气太重，说：“今日之事，非钱莫办！”次日某君为雇汽车陪往，入门即出钞票十元赏门役，耳后即闻“谢杨大人赏”之声，入会客室，侍者为燃火敬雪茄，杨又出十元赏之，遂得引导登楼见顾。杨回到长沙后，愤愤不平，常说：“这种背时官真不是人做的。”不久即挂冠而去。

1936年，杨一度出任驻日武官。抗战初起，任军委会外交特派员，组织班底，研究国际问题，中枢设立大本营，杨任第一部情报组处长，兼第五部对敌宣传组长，还担任过军委会参谋本部第二厅中将厅长，后又调任过外事局长和侍从室某职。还曾应苏联政府请，由中国政府派为中苏合作的特种情报所长。中、英、美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时，杨随蒋介石出席。行前蒋特意为杨制一套海军中将礼服。因其英语流利，对答如

流，风头颇健。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第二厅一所特别监视电台，忽然测到一个新出现的电波，经过破译，才发现是日本太平洋海空联系电波讯。临近珍珠港事件前夕，这种电波又出现了。根据这一情况，结合当时世界整个战局，杨宣诚判断，日本将在太平洋地区有所动作。他当即向蒋介石报告，并建议向盟军通报。外国驻渝军事代表向杨探询情报来源，杨答：“此系中国情报秘密，碍难奉告。”罗斯福得知中国转来的情报，立即召开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但可惜他们对此没有加以重视。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罗斯福想起此事，深为懊恼，当向蒋介石请求中国派一位海军将领、精通英、日文字的军事情报专家，作他的私人顾问。这不啻指名要调杨宣诚，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蒋却派了商震将军率团赴美。杨却说：“我不该出生在湖南嘛！”

日本攻下香港后，在研究新加坡的前途时，有人认为英国经营新加坡军港20年，应是金汤之固。杨宣诚独谓其必蹈欧洲战场上法国马其诺防线覆辙。后日军果以陆军从马来西亚攻陷新加坡。有个时期，重庆冒出一种日本将北进之说，甚嚣尘上，杨宣诚高瞻远瞩，断言日军必南进与英美决战。闻者大哗，甚至斥杨无国际常识发怪议论。事实再度证明了他的预见。此时国际军界，对杨之洞悉战争形势及其精辟分析，莫不深表敬佩。

1944年，杨时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次年日本投降，杨宣诚随我国代表团团长徐永昌，出席在美舰米苏里号举行的受降仪式。

杨宣诚以出色的情报工作，曾赢得国民政府授予云魔勋章和宝鼎勋章，美、英、法、苏等盟国政府也均授予勋章。1947年美国政府在台湾为杨受勋，其授勋文件称：

“这是为了中国海军中将杨宣诚，在中国以军事情报首领

身份做出的优越功勋，而授予司令级军团功勋勋章。在美国海军代表团1943年5月5日到1945年9月30日在华期间，在对敌作战中，杨将军曾予以大力协助，而极大地增强了同盟国作战能力。杨将军是留学日本，从事海军与军事战略研究的。并且因为他在日本多年，与日本的密切接触的结果，他完全了解与掌握日本人的心理。由于这个背景，他能多次准确地预测日本的远东战略。在他收集情报工作中，杨将军在情报战斗中直接指挥他的部属，并且多次亲临敌后战斗。他在工作中的突出功绩，是与盟国武装部队的最高传统精神完全一致。”

杨宣诚还不无牢骚地对人说过：“出国受降前，老头子（指蒋介石）亲口答应放我大连市长，谁知回国以后，事情变了卦，大连被沈怡抢走了。昨天又说要我去北平市长熊斌那里去当秘书长。我搞了半辈子，只落得个当‘姨太太’的下场，真有些想不通！”有人曾恭维杨宣诚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虽过于溢美，不过许多认识杨宣诚的人都异口同声说：“杨宣诚在旧社会浮沉宦海之中，不失为一个比较好的正派人。”只是他的性情也够得上称为古怪了。他为人正派，当大官，唯才是用，乡下没有买过一亩田，城里没有超过一间屋，身边没有讨过姨太太。在长沙当交涉司长，在南京、重庆工作，都是租几间旧民房做公馆，他当主馆，体恤下僚，性情踞傲，往往跟人抬杠，坚持真理不放松；对外国人，板着面孔说话，穿便服不让进他的公事房。只是由于他居官清廉，工作出色，有才干，有魄力，不论中外人士，都不得不让他几分。但都讨厌其怪脾气。

杨宣诚晚年蛰居台北，隐而不仕，当局面遂多次，均以老病恳辞。1962年3月病逝，终年73岁。

三、郭 之 奇

有人说过：“人不可不读书，不读书则不明事理，不能经世致用；但不可食古不化，食古不化，便会成为书獃子。对出洋留学的高级知识分子而言，则应该学有专长，备为国用。如果不求其解，事事浅尝，杂而无当，终究也是派不上什么用场的废物。”

这段议论，虽然不无理由，若是针对笔者下面写的这个人物而言，却十分恰当。

长沙县东乡影珠山下有个郭之奇，人呼为“郭九憨子”，就是个食古不化、学涉中西、不精不通，能学不能用的“怪人”。

郭之奇（1888—1980），原名郭家伟，出生于影珠山下一处叫巷子山、也叫凤子山（今开盖乡）的旧知识分子家庭。

郭之奇的哥哥是个饱学秀才，他弟弟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郭家与板仓相距不远，郭之奇幼年从杨怀中（昌济）读过书。12岁入胡子靖办的经正学堂，学习成绩优异。清光绪三十年，由学堂保送公费留日，在宏文、正则两校学习日语、英语。1906年由黄兴介绍参加同盟会。据郭自己说，当年孙中山与黄兴在日本初此相会，他也在座相陪。郭后来又入日本东京商船学校轮机科，未毕业，去英国，入英格兰泥北淀（译音）大学习政治和哲学，嗣在德国柏林大学为旁听生。综其一生为学，可称“杂家”。

苏联十月革命后，郭之奇取道莫斯科回国，候车期间，游红场，听过列宁演说。可能他是中国留学生中有幸见到过列宁的极少数人之一。

郭之奇回国后，曾在同乡亲戚又是好友章士钊所办《甲寅》杂志社工作过一个时期，写过不少文章，大多未被章士钊

采用，因而有人曾看见他书架中有一厚册手稿，方格直书，题名《甲寅删余录》。他离开《甲寅》后，终日以埋头读书为乐，不事生计，生活潦倒，赖友朋周济度日。

解放后，由章士钊、杨树达等推介为湖南省文史馆馆员。有人见他填履历表，职业一栏，他填“学生”二字，那时他已60多岁，人怪而问，郭哈哈大笑说：“20年代，我也担任过公职，当过长沙市政筹备处处长，只干三个月，算不了什么资历！”这大概就是他这个老革命同盟会员的唯一政绩！据老长沙人回忆，郭当处长时，曾在水风井修建一处新式公厕。而且他也提议禁娼，取消“花捐”、“肥料捐”，整顿粪码头。不过都为警察当局和“粪霸”所反对，不得实行，郭亦不坚持，盖“花捐”、“肥料捐”两项，均为当时市财政重要收入，当然难望行通。

郭之奇确是怪人，他有妻有子，但他别租学宫街小室，自炊自食，独立生活。小室除一床一桌，供他睡觉读书，一锅一瓢，便他吃饭之外，其余空间，都为洋装书和线装书所充斥。大有颜回箪食瓢饮之乐。他习惯上午读外文书，下午读中国书，一律高声朗诵，旁若无人。俄文版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他都读得津津有味。他说：“恩格斯是读了《孟子》，才能写出《自然辩证法》的。”不知其怪论有何根据。

郭少时的好友宋某，原拟将堂妹许配给他，宋妹不允，说郭太怪，难以共同生活。建国后，我见过这位郭老先生，是个高个子，其貌不扬，左额有一隆起物，形如角，大约是所谓赘疣，常穿长袍，挟夹书本，手拄木杖，蹒跚街头。听他的亲戚黄时羹老人说：“因郭是老同盟会员，30年代初，当局曾安排他到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当修纂委员，这本是个拿乾薪不须做事的闲职。因为要他每月去签几次到，便可得到500 银元一

月的优俸，他却说：‘要签到才拿钱，我不食这种嗟来之食！’拂袖而去。”

文化大革命初期，郭之奇被揪出来，说他在旧社会没有做过一天事，是个名副其实的寄生虫。1969年初秋，打砸抢抄之风甚炽，省参事室、文史馆成员之家，几无幸免。红卫兵进入郭家，郭之奇正在摇头晃脑，一个劲地哼之、乎、者、也、A、B、C、D，毫不理睬这些不速之客。红卫兵说：“我们来破‘四旧’，你这屋子内的书，包括你这个人，统统皆要破！”郭之奇猛站起身，大声抗议：“我留学几个国家，研究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亲耳听过列宁演说，怎么还算旧？”

红卫兵见他那副面红耳赤、口沫横飞的尊容，都笑不可仰。其中一个红卫兵，不由分说，从架上拖出一册线装本夹的《全唐诗》，掉头就朝外走。郭之奇一见，这还了得，鞋子都来不及提上就追，大喊道：“不行！你们不能拿我的书，书是我的命呀！”拿书的在前跑，郭之奇在后面追，穿街过巷，大喊大叫，紧追不放，惹得行人都驻足而望。那红卫兵跑一阵，抽一本书抛在地上，一本一本地抛，也不知追了几条街，穿了几条巷，郭连哭带叫，边追边拾书，拾起一本还拍上几拍灰尘，朝怀里一夹，又朝前追，一直追到水风井，红卫兵已无影无踪了，郭之奇顿足大哭，只好拖着拾取的残书回家，行人拍手大笑。有认识他的街邻说：真好写一篇“郭九憨子追书记”。

1980年郭之奇活到93岁才去世。

包 凯 传 略

熊 志 翔*

包凯，原名包罗，号戈平，湖南凤凰人。1891年9月16日（清光绪17年8月14日），生于永定县（今大庸市）一小官吏家庭。祖父占梅，时为永定营都司，其父存洲随侍营中。1902年占梅辞官率全家返籍务农。

包凯自幼入私塾。1904年受同乡田德庵鼓动，游学于长沙岳麓山高等学堂。课余，田常来宣扬革命，包因此萌生反清爱国愿望。1906年，爱国志士陈天华、姚宏业之灵柩运抵长沙，公葬于岳麓山，包是公葬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事后又是少数剪辮的激进者之一，因而为校方开除。包转考陆军学校，竟因无辮被摒。秋，入醴陵磁业学堂，又因带头闹学潮被校方除名。1910年考入湖南陆军小学，自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辛亥革命爆发后，包凯参加了长沙起义。随后进南京入伍生队，续转武昌第二军官学校，1912年冬，经熊希龄保荐，湖南都督谭延闿资送其赴日留学。翌年春入东京同文书院军训班。时孙中山赴日考察，包前往欢迎并聆听其讲演，开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宋教仁遇刺后，包愤然回国参加二次革命，至途中闻败讯始折回。1914年包凯毕业回国，任热河陆军第二团连长、营副。包无心事主，不久便辞职回籍。1917年与熊希龄之外甥女田兰珍结婚。

在凤凰，包凯供职于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部。包鉴于田部暮

* 熊志翔系广东佛山大学政史系讲师。

气沉沉，极力鼓动田用新式办法整饬军队，但田不置可否。护法战争爆发后，包为湘西护法军中校副官长，随军攻占常德。鉴于北军不入湘，桂军谭浩明又南撤，省府空虚，包又向田再献晋省夺权之策，再次遭田拒绝。包怅然若失，颇思离去。不久，北军十六混成旅冯玉祥出击常德，田乃退兵沅陵成立湘西军政处自保。其间，包父病故，月余，其妻产一女，不幸母女俱亡，包闻讯大病几至不起。1919年春，复与沅陵许有荃（湘蕨）女士结婚。

1920年，谭延闿重新控制湖南，电令田应诏取消湘西军政处，并召田入省府。田被迫将兵权交与陈渠珍令至僻地自保，遂率包凯等入长沙设湘西镇守使行署。是年恰逢保定军校招收各届陆军中小学学生，包乐而就读，至1923年毕业。此后，包历任保靖县、龙山县县长及湘西善后督办署参谋长兼第四团团长的职务，1926年初任湘军第四师少校参议，唐生智驱走赵恒惕倾向革命后，改任省政府少校参谋，6月，湘军第一师贺耀组反唐，另组“护湘军”，包又被该军派为驻贺龙部代表。

北伐军入湘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包凯亦投入北伐之列，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教导师政治部主任，并经该师师长周斓介绍加入国民党。时唐生智令黔军司令袁祖铭移驻鄂西，交还湘西防地，袁置之不理。1927年1月底，周斓在常德诱杀袁祖铭，袁残部李燊逃往湘鄂川边，请求收编。包凯被委为武汉政府军事特派员，于6月赴宜都将李部改编为第十六军。7月，国共分家，宁汉开衅，武汉政府恐李燊不稳，复令包前往监视。不料李暗受蒋介石第四十三军番号，将包软禁达四月之久，宁汉沪合流后始获释。

1928年春，包凯赴南京任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总部上校参谋，随军第二次北伐。旋师南京后，第三军团缩编为第十师，包任副官处长。军阀战争迭起，包亦卷入其中。1929年3月，

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重新启用唐生智携巨款北上策反，赶走白崇禧，唐就任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包凯在其所辖五十一师任政训处长，屯兵洛阳、郑州。10月，冯玉祥举兵反蒋，包部扼黑石关洛水阻击，苦战经旬，将冯部击退。12月，唐生智忽又与石友三联合拥汪反蒋，次年1月兵败下野，包凯则化装俘虏遁回南京。

自陈渠珍统治湘西后，遍设私卡，舆论界沸沸扬扬。1932年，南京政府派包凯回湘西调查陈渠珍私设关卡案，包却以“查无实据”谎报，了结此案。后陈力荐他为沅陵特税处长。

1934年5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进入高潮，包凯乘势向南昌行营上了一份《剿共意见书》，书中污蔑共产党破坏国家统一，建议蒋介石仿屯兵制度，从南城、宜黄、赣州、崇仁等地封锁包围瑞金、宁都，逐步消灭红军。蒋极为赏识，任包为行营上校谘议。包亲往前线视察封锁苏区情况，竭力为蒋出谋划策。红军主力撤出苏区后，包还参与了“清剿”。

1936年9月，经同学龚浩援引，包凯进入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二厅系国民党情报机关，计分六个情报处，一个厅办公室，一个战史编辑委员会，包在厅办公室任中校参谋，负责将所搜集的情报编纂成《国际汇刊》，该刊共发行20余期。抗战爆发后，参谋本部第二厅改为大本营第一部情报组，次年1月复改为军委会军令部第二厅，包凯均任办公室主任参谋。武汉失守后包抵重庆升为上校。

1941年3月，包凯出任军令部战讯发布组少将组长兼军委会军事发言人，很快就以通晓英文、熟悉业务而博得上司赏识和外国记者好感。每逢周四，他与党务发言人王世杰、政府发言人蒋廷辅、外交发言人吴国桢一道出席中外记者招待会，发布战况，解释对日作战形势，预测战争动向，对鼓舞人民抗战

起了积极作用。但此间他很少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事迹。尤其是1943年夏，当中国共产党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并向军委会提出扩编八路军，增加防地以利抗日的正当要求时，包凯在参谋总长何应钦授意下，与中共发言人周恩来公开论战，反诬中共为“兄弟阋于墙，使亲者痛而仇者快，殊为不值”。企图将国民党发动内战责任推诿给共产党。为此，包凯获第四等荣麾勋章。

1943年10月，包凯任军令部副部长兼中央设计局专员，参与拟定军事施政纲领及审核各军事工作计划和法案，同时还兼任重庆卫戍司令部谍报干训班教官等职。1944年，何应钦推荐他为某边区参谋长，遭陆大系反对，军令部介绍其任某师管区司令，又被黄埔系阻挠，前途随之暗淡。是年，其妻湘蕪病逝，遗二子二女。

1946年，军令部撤销，包凯随中央设计局第三批迁返南京，旋入中央军官训练团。是时，其女婿滕公义将晋升少将，包按捺不住便要求晋升中将，白崇禧虽同意，但军政部长陈诚未批。包心灰意冷索性要求退役。1947年7月，乃参加了中央军官训练团五百名将官在南京中山陵的“集体哭陵”活动，以泄心中怨愤。是年夏，包与武昌刘芳女士结婚。

1948年5月，中央设计局被裁撤，包遂告失业。是时，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展开全面进攻，国民党统治岌岌可危，包深感忧惧。在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的再三敦请下，包受命为国防部简二阶额外专员、政工局参谋室主任，负责战况解说与战局分析，为国民党反共宣传提供参考资料，并协助指导对外军事发言。年底，国防部请包凯复任军事发言人，包曰：“现在尚有何言可发？对败者不能强说为胜，退者不能诳言为进，事实俱在将奈之何？”固辞不就。

1949年初，国防部迁广州。包凯见大势已去，乃谋退路。

3月2日湘西事变爆发，包以为家乡“人心尚有可为”，遂请假回到长沙。他与杨安民、沈荃、侯烈、滕公义等湘西籍人士商议，决定扶持陈渠珍固守湘西，包乃倡“湘西大团结”之说，要各派“化除畛域成见，制止互相残杀”，“以增强实力”。实则想以后取陈而代之。

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渡过长江，国民党拟转迁重庆。包凯以为“共军广州即能来，重庆又何不能往？”遂弃职回到长沙。然湘西已由宋希濂控制，包又策动宋集中全力阻止解放军解放湘西。6月包凯返沅陵，和修九华、许亚农等一起创办《湘西晚报》，包为发行人，继续进行反共宣传。不久赴乾城（今乾州）参加湘西行署主任陈渠珍召开的“善后会议”，被委为“反共救国委员会”委员。9月包凯携家眷回凤凰，旋乘陈子天一车去贵阳投谷正伦部，詎到铜仁，天一乘修车之机，悄然弃包独往。包无奈，且闻解放军军纪严明，兵至辰溪，只好返回凤凰。

1949年11月7日，在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下，凤凰和平解放。包亦参与了自动起义，并被推为县治安委员会副主任，在迎接解放军过境和维持治安等方面出力不少。县人民政府成立，包改任接管委员会副主任。

1951年12月，包凯以反革命罪被捕，5年后刑满就业。

包凯秉性耿直、心细，生活却不拘小节。平生喜欢研究艺术，如刻印、绘画、书法、诗词无不精通，对地理如世界地理、兵要地理亦有相当研究。刑满就业后，曾著有《烟尘回忆录》、《民国军阀的生活》、《云梯梦》（京剧）等，还曾以毛泽东名义寄书蒋介石，盼望海峡两岸尽早统一。1975年1月14日，包凯病死于吉首，年84岁。

邹永成事略

焦 传 爱 *

邹永成，字器之，湖南新化人。器之先生早在孙中山先生组织同盟会前，即已同黄兴、谭人凤等革命志士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9月，先伯父焦达峰在长沙举义时，器之先生授命去宝庆（今邵阳）和新化二地共图起义之事。伯父在长沙惨遭杀害后，辛亥革命夭折。器之先生后来在长沙，经常与二伯父焦达人来往甚密（二伯父后来派任烈士祠董事，焦达峰、陈作新、杨任三烈士的铜像陈放在内）。

1936年，他居住南京虹庙时，曾与父亲焦达梯经常接触，因为器之先生夫人邹钱氏，与家母系小同乡，故而她俩也经常来往小叙家常。

1948年政局发生变化，他们即从南京搬迁至长沙，来时曾和我家居住在一起（当时我们居住在小吴门外军路侧，二伯父私宅“止庐”内，即现在清水塘，该住宅现今为长沙一中宿舍）。他们迁来长沙时，由邹夫人携带女儿慧文、侄女筱蕙一同到达。在“止庐”居住不久即搬到红墙巷，曾记得家父要我去他家送信给邹伯伯，后来他家又搬至南门外一所公寓内，即现今旭鸣里（该公寓现已改造为长沙市十七中学宿舍）。

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前，他曾与仇亦老（仇鳌）黄一欧等知名人士共商政局。长沙解放后，器之先生小女邹慧文安排在

*（传爱系焦达峰侄辈，长沙市南民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

辰溪县银行任职，女婿倪行山系湖南省军区大尉军官随后晋升少校军衔，婚后一同调任株洲武装部，侄女筱惠回南京自谋照相业。1956年器之先生身患重病，病危之时我母亲陪同邹夫人日夜守候在他身边。在他身患重病期间，一欧先生曾经常前往看望，在他病故后并参加了追悼会，程潜主席也送了花圈。

参加湖南和平起义活动忆略

欧阳敏讷*

程颂公义举

1948年7月，应程潜将军之邀，我回到湖南，8月，到程潜将军主持的湖南省政府的机关报《国民日报》社担任社长。

9月间省政府新闻处长刘伯谦（程潜的亲信）几次找我，说程颂公准备起义，要我找共产党联系。我当时说，离开湖南九年了，抗日战争前和抗日战争初期认识的许多共产党员朋友，没有人来找我联系，不知道有谁在长沙。刘再三说：“我们知道你是有办法的。”

一天，《长沙晚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康德告诉我，现在江汉军区城市工作部享受师级待遇的参议成铁侠，在5月间，曾派了一个叫欧阳魁的人来长沙找过我，当时因我不在长沙，这个人去了武昌。这件事启发了我，当刘伯谦又来找我时，我就说可通过江汉军区这条线与李先念取得联系。刘听后很高兴地说，能同李先念打通关系最好。当即带我去见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邓闻讯后很高兴，马上给我开了一张支票做路费，要我当天就去武昌，把成铁侠的联络员欧阳魁找来。我立即与康德商量，康认为我从没与欧阳魁碰过面，径直去找他不妥，康便自告奋勇愿去武昌。当天晚上他便搭火车去了武昌。第三天

* 欧阳敏讷曾任桂林《力报》总主笔兼总编辑、江西《开平日报》总编辑、湖南《国民日报》社社长，建国后在湖南省社科院工作，已故。

康德便偕同欧阳魁来到了长沙。第二天刘与欧阳洽谈时，我也在旁作陪。为确保洽谈的安全，我爱人谭瑞芝带着八岁的女儿芝蕾在门外放哨。欧阳魁用书面提出六点建议，大意是：保护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安全，保护工厂、商店、学校不受破坏，保护铁路、公路畅通，维持社会秩序，机关工作照常进行等。刘伯谦表示坚决做到，希望欧阳魁立即返回江汉军区报告。还约定由刘伯谦拟好密电码，并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以便必要时用电报联系。半天后，刘伯谦送来一份密电码。我把它转交给欧阳魁时，欧阳对我说，带密电码在身上怕不安全，请我另找可靠的人专程送往武昌。还说成铁侠再三嘱咐他，看到欧阳敏纳时，一定要策动国民党沙市城防司令兼江防司令周上凡起义，周指挥的八个师，是挡住江汉军区通往湖南的障碍。我答应一定想办法，两天内回复。

我立即与康德再三商量，便去省银行储蓄部找吴嵩龄。吴与我私交尚笃，他担任储蓄部经理，是我向总经理李维城推荐的。而吴嵩龄与周上凡既是同乡（常宁人），又与周上凡、成铁侠是把兄弟。因此吴是送密电码和策动周上凡起义的最合适人选。我找到吴后，便把程潜准备起义，欧阳魁与刘伯谦的洽谈，欧阳魁要求派人送密电码去成铁侠处和策动周上凡起义的详细情况说了一遍，并请他送密电码和策动周上凡起义，为和平解放湖南作出贡献。吴考虑片刻后，便答应了。我立即介绍他与欧阳魁认识后，吴便以经理出差的名义，携带密电码与欧阳魁分道前往江汉军区。吴嵩龄见到成铁侠后，成便派他去沙市，吴说动了周上凡，周与成双方还派了联络员。

几天后，过去曾在欧阳魁领导下进行地下活动的湖南省警察局文书龙博文，陪同李万恒的爱人找我，说在1946年，成铁侠由中共华东局派遣，带一个小组来湖南进行地下活动，曾经策动当时在衡阳盐务局税警队任队长的李万恒拖部队上山，

由于泄密而被捕关押在长沙湖南陆军监狱，要求我营救。我立即答应了她，并嘱她向程潜将军写篇呈文，请求释放她丈夫。龙伯文很快把呈文送来，我便给程潜送去，并说明了具体情况。程潜将军立即亲笔批示：“即予释放。”第二天，李万恒夫妇来向我道谢。不久，李万恒去了成铁侠处，成即派李前往沙市，周上凡委任李万恒担任了城防司令部警卫连连长。

人民解放军进攻武汉时，周上凡的上司湘鄂川黔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连续三次密电周上凡炸毁荆江大堤，周上凡拒不执行，保护了湖北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人民立了功。武汉解放后，周立即率部举行了起义，投入到人民的怀抱。

欧阳魁与刘伯谦在我家里洽谈后，只有几天，担任湖南大学副教授的肖敏頌来找我，我俩是1938年由中共地下党员、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介绍认识的老朋友，互相寒暄了几句后，谈了谈形势，他要我为革命做点工作，我点头表示同意。并把成铁侠派欧阳魁来长沙后的情况简略地告诉了他，意欲请他转告中共地下湖南省工委，程潜将军准备起义，以便多方进行策反工作。后来，中共湖南省工委成立的军事策反小组组长余志宏（民盟地下党员、湖南大学副教授），从台湾找来程星龄，并通过湖南农学院教授黄××（记不起名字）要求其岳父万叔章（程潜担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时，万是秘书长），同时对程潜进行工作。

1949年初，《新华社》宣布了战犯名单，其中有程潜。程潜将军免不了情绪有点波动。这时参加起义准备工作的长沙警备司令肖作霖，跑到上海请主办进步刊物《时与文》的程潜儿子程博洪回长沙，作父亲的工作。春节前几天，地下新闻党支部在《国民日报社》举行座谈会，邀请程博洪谈谈做父亲工作的情况，程博洪说，同父亲谈了好几次，父亲很感动，有一次还流了泪，已下定了起义的决心。春节过后，程博洪回上

海，携带他父亲给毛主席的亲笔信，秘密的交给了国民党和平代表团顾问章士钊，赴北平时，面呈毛泽东主席。

1949年2月间，欧阳魁来长沙，由我、刘伯谦和中共地下党员、地下民盟省委负责人肖敏颂陪同，在一天晚上一点钟左右，到省政府程潜的住所秘密会见了程潜将军，欧阳魁向程潜将军谈了回江汉军区后的情况，着重介绍了军区领导对程潜将军准备起义的义举很重视，并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地下民盟省委负责人肖敏颂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对程潜将军的壮举作了高度的评价。程潜将军说，他虽然被宣布为“战犯”，但没有丝毫顾虑，决心追随共产党，一切听从人民的“裁判”。他说话时，态度诚恳，语气坚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 达 倒 戈

李达教授的助教陈干中（解放后改名为陈力新）和我是小同乡，1948年11月间，他对我说，鹤鸣先生（李达别号）住在湘雅医院，要找我谈谈。我闻讯，高兴极了，立即和陈干中前往医院。李达教授住的是单人病房，陈干中给我倒了一杯茶，便关上门出去了。李达教授要我坐在床边椅子上，压低声音说，有两件事要找你谈谈。第一，早几天，程星龄曾两次找我，要我当程潜的代表去石家庄见毛主席。我怎么能当程潜的代表呢？有些话不好对他说，想请你转告程潜。我有三点意见：

（1）要维护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安全；（2）要保住工厂、学校、商店和交通不受破坏；（3）要维持社会秩序和机关工作的照常进行。只要程潜做到了这三点，如果我去石家庄见到了毛主席，一定替他讲话。第二，听说成铁侠已派人来长沙，并通过你，与刘伯谦面谈了，回到江汉军区后详细报告了程潜准备起义的消息是吗？我听罢鹤鸣先生的话后，估计到他是受中共湖南省工委的委托来打听这件事的。因此，便详细的

向他老人家汇报了欧阳魁受成铁侠派遣来长沙的全部情况。接着把话题又转回到要我向程潜转话，并要我当天晚上做到。我向李老解释说，有一个大特务杨继荣是长沙绥靖公署中将高参，经常守在程潜身边，为了避免引起敌特的注意，我已有一个多月未去见程潜了。接着我又说，刘伯谦是程潜的亲信，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天天在程潜的身边，托刘今晚转告如何？李老考虑了一下说，也可以，不过一定要把三点意见讲清楚。我怕老人家太累了，正欲起身告辞，李老又叫我坐下，说：“早几天，李默庵派秘书两次找我，要我到常德向军官讲话（程潜是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李默庵是副主任兼十七绥靖区司令官，驻常德），我怎么能抛头露面去常德呢？”接着李老自言自语地连连说道：“这里面有意思、有意思。”又问我：“认识李默庵吗？”我急忙回答：“认识。”并向李老介绍我与李默庵的关系。1939年，我到国共合作创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讲师，讲授国际形势。当时李默庵是教育长（副教育长是叶剑英同志），因此认识。1940年春，我到桂林《力报》担任总主笔时，薛岳（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告我的状，要封掉那个报纸。为了维护报纸的生存和自己的安全，我就到李默庵在江西办的《开平日报》当过五、六个月副社长兼总编辑，这次到《国民日报》社任社长，是李默庵向程潜推荐的。李老听完我的介绍后，立即说，有这个关系，正好做李默庵的工作，同程潜将军一道起义。又嘱咐我，特务太多，要小心谨慎，但不能害怕，害怕就做不了革命工作。我告辞出门，才看到陈干中为我与李老的安全一直坐在房门外的凳子上，注意四周的动态，我感激地与陈握手言别。当天傍晚，我找到刘伯谦，把李达教授所说的话，扼要地告诉了他，托他晚上转告程潜将军，我还请他转告时说明，李达先生胃病复发，住在湘雅医院，身体不好，不能充当代表，希望

程潜将军谅解。并且再三嘱咐他，李达先生的三点意见请程潜将军务必做到，李达教授去石家庄，一定向毛主席转告程潜将军准备起义的意愿，这些要刘伯谦一定要讲清楚。刘答应晚上一定去省政府程潜住所，当面向程潜报告。

我记住李达教授要我做李默庵工作这一嘱咐，几天后，就去会见李默庵将军。当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东北全境宣布解放，淮海战役正在激烈地展开，国民党真是“兵败如山倒”，到处人心惶惶，我与李将军谈了当前的形势，交换了看法，一致认为国民党已经很难支撑这个局面。经过这次谈话，我认为，李默庵将军已经有了走向光明的倾向。回来后，又通过康德介绍有进步倾向的简泽初担任李默庵的机要室主任，以便继续做李的工作。

这时候，我突然患了副伤寒，来势很猛，整日昏昏沉沉，住进天主堂医院后，多亏医生精心治疗，一个月后出了院。1949年1月，我又会见了李默庵将军，当时淮海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战役正在激烈地进行，天津宣告解放。一谈形势，我便说国民党灭亡已“指日可待”，李将军点头表示同意，我觉得时机成熟，可以“摊牌”了，就详细地告诉他，程颂公已经与江汉军区和中共湖南省工委取得了联系，决定举行起义，希望默庵将军能深明大义跟程颂公一起行动。他显得很兴奋，表示就去向颂公表态。又说，希望同江汉军区来的地下工作人员见见面。过几天的一个半夜，我陪同欧阳彪和肖敏颂，到李默庵将军公馆的小会议室里见面。李默庵对我们说，已向程颂公表了态，决定随同颂公举行起义。8月4日，长沙宣告和平起义，程潜将军领衔发表了通电，李默庵将军也署了名。但李默庵已去了香港，而李所辖的部队包括他弟弟李宗霄团长都参加了程潜将军的起义。这时在香港的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发表脱离国民党政府的声明中李默庵也署了名。后来李携带家眷去了

美国。在北京举行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纪念会，国务院以起义高级将领名义邀请李默庵将军回国参加。

鹤鸣公赴港

1949年3月，陈干中再次来邀我去湖南大学会见李达教授，说有要事商量。到李达教授住所坐定后，我向李达教授汇报了李默庵将军决定跟随程潜起义的情况。鹤鸣先生听了后，连连点头说：“好，好！”非常高兴。接着告诉我：半月以前，收到三联书店总经理徐伯昕的电报，说：“董事长有事相商，盼即来港。”猜想董事长必是毛主席，所以叫干中赴香港到三联书店找徐伯昕问个明白，果然是毛主席。打算过一晌绕道香港赴北京。接着李达教授要我办三件事：找一辆小汽车接他过河；代买三张有卧铺的火车票，并在火车站附近订好旅馆的床位；准备一张《国民日报》社的特派员证件。我都一一答应照办了。

4月15日傍晚，天下着雨，由余志宏派的地下交通员李梅彬陪同李达教授乘坐吉普车到了我家。谈话时，他叮嘱我：“如果长沙果不住，就去香港，到一个地方打听我。”随即在一张纸上写了地址，地址后面写的是：“问邵先生。”我看了一下后，他便拿去点燃烧了。我问“邵先生是邵荃麟吗？”他答：“是。”接着问我：“你们认识？”我说：“我们曾经在桂林《力报》同过事。”（我担任该报总主笔兼总编辑，邵担任主笔，当时他奉中共南方局之命，领导桂林文化界。解放前夕，又奉南方局之命，去香港负责接待民主党派领导和著名进步人士，送往解放区。）李达教授知道我与邵有那么一段关系后，说：“那好，你到香港找他就是。”话毕，我把三张有卧铺的火车票和《国民日报》社特派员的证件交给他（姓名是假的）。

晚上十点钟左右，雨越下越大，李达教授坐了《国民日报》社的黄包车，我派了一个可靠的人陪送李老到火车站附近定好的旅馆休息，以便半夜由李梅彬和陈干中护送。李达教授临走时，叫我不要送行。后来余志宏连夜冒雨到旅馆看望了李达教授，代表中共湖南省工委为李达教授送行。

黎明前流亡

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我正沉湎于欣喜之中。但第二天晚上，刘伯谦神色紧张地来到我家，告诉我：

“大特务杨继荣开了一张黑名单给程颂公，头一名是李达，说是共党。你和康德说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颂公叫我通知你们，白崇禧就要来长沙，他怕不能保护你们的安全，要你们赶快离开。”我说：“李达教授早几天去了香港。”刘说：“很好。但你和康德今晚就得离开长沙。”我考虑了一阵后，先打算遵照李达教授临行前的嘱咐去香港，但又怕坐火车、汽车和轮船不安全，只好去教育西街周启铎家，找周商量后，托他找简涤初去约康德。天亮前，简涤初（望城县霞凝港人）雇用了一条小船，趁着黎明前的茫茫雾色，乘舟沿着湘江而上，到霞凝港北部村子里找地下武装处暂且住下。周启铎原是国民党部队师长，成铁侠是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他奉命驻守九江江防，被蒋介石撤了职，因而对国民党不满。欧阳魁再来长沙时，成铁侠授命欧阳魁找周启铎搞地下武装，欧阳魁找了周传第和左元春担负这个任务，在霞凝港北部村子里搞起了地下武装，名义叫自卫大队。周传第担任大队长，左元春担任副大队长。枪枝由我通过简涤初找李默庵拨给机枪八挺、步枪二百多支；由刘伯谦找程潜的儿子长沙绥靖公署警卫团长程元拨给新步枪一百一十支；再由吴嵩龄找程潜批示从省银行搞到驳壳枪三十支；周传第他们还收集到散在民间的枪一、二十支。我在

这个部队住了十几天后收到家里由吴嵩龄转来从香港写来的信，报告李达教授平安抵达香港，并且用暗示的语气说李达教授到了香港后，在港文化界举行了欢迎李达教授的座谈会。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心里十分高兴。

6月初，吴嵩龄来告诉我，陈明仁参加了程潜的起义，控制了长沙的局势。白崇禧的部队向衡阳方向撤退，黄杰、刘嘉树也带着一些部队向邵阳方向撤去。早一晌白崇禧曾逼颂公前往邵阳，但颂公避开黄杰又回到了长沙。吴嵩龄最后告诉我，这几天来，国民党大小特务头子有的投诚、有的自首、也有的逃跑了。长沙城内目前比较安定，你可以放心回城了。简涤初也来到乡里告诉我，说可以回城了。这样，我和康德便回到长沙城内，结束了这黎明前的流亡生活。

我参加合作小组与和平起义前后

苏 琢 如 *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把发展合作事业列为建国六大中心工作之一。我因过去曾在修业高农攻读合作专业，又在抗战期间担任过湖南省政府建设厅合作指导员，因此对此项工作产生浓厚兴趣，乃于1949年2月由新化来到长沙，在当时主管全省合作事业的湖南省政府社会处，担任科员并兼股长。社会处长刘修如、副处长丁鹏寰，都与我有师生关系，自认专业对口、业务熟悉、人缘也好，可以大有作为。我先受聘为《新合作月刊社》社务委员、副经理，后又兼任省政府员工消费合作社理事会秘书。该社经理狄昂人，系社会处技正，副经理汤铭又是新合作月刊的经理。社址在今中山路银宫电影院隔壁湖南省教育服务部。

经过一年的时间，我感觉到国民政府当时所发动的内战不得人心，从政人员大多贪污腐化，尤以滥发纸币，物价飞涨，据当时省财政厅的统计，长沙市50种主要商品的零售物价指数，1947年12月，比1937年6月上涨了99124倍，投机商囤积居奇，到处乱购物资，市场极度紊乱，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合作社内，有人假合作之名行利己之实。在“国大”，“立委”的竞选中，国民党、三青团为了争权夺利，流血斗殴，还有人冒充合作者，争取合作界人士的支持和选票。我看不惯这些丑恶的现象，先后写了《谨防合作扒手》、《利人与利己》等短

* 苏琢如系湖南省商业厅离休干部、《湖南省志·贸易志》编辑。

评，在《新合作月刊》发表，加以揭露和抨击。对当时合作界所流行的口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提出了我的新见解，要先“我为人人，而后人人为我。”对冒充合作者竞选的“陶丁”，我用同音字投了“逃丁”一票，发泄我内心不满的情绪。

进入1948年，这种抨击时弊的言论，日益增多，《新合作月刊》的主要成员，几乎都发表了文章，现藏于省图书馆不完全的《新合作月刊》有卷可查的，计有我（笔名眉山）的《农贷不可紧缩》一文（见第三卷第一期，1948年1月31日出版）指责国民政府紧缩农业贷款，移作所谓“戡乱经费”，“造成生产萎缩，物价上涨，民不聊生，戡乱实其造乱。”总编辑周源峻的《反封建与中国合作事业试论》一文（同上）指出：

“不管国民党的合作政策如何？将来中国必然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副社长王治华（笔名文甫）的《用变来应付危局》一文（见第三卷第十期，1948年10月30日出版）抨击国民党“以不变应万变”的谬论，要求“用变来应付危局，从右到左来一个九十度的大转弯”。1948年为纪念国际合作节，王治华还写了《新阶段新任务》一文，以代论的形式在《湖南日报》发表，提出合作者应加强学习与工农群众结合，组织新型的合作社。

1948年7月，我因筹组湖南省合作社联合社，省政府员工消费合作社理事会秘书一职，由王治华接任。在此以前，有张蕴良到社担任社务课长，张又名学琅，与我同是新化大同镇人，他早年留学苏联，30年代曾与王首道一起，两次担任中共湖南省委领导成员，后因大革命失败被捕，与党脱离组织关系（建国后，他曾任省政协委员，先在省商业厅工作，后转省合作事业管理局任生产科长，现已病故）。

1949年初，张蕴良与前来长沙策反的中共地下党员刘润世

（福建人）取得了工作联系，负责工运。4月底，张在合作员工中，以《新合作月刊》的成员为主体，建立了一个地下合作小组，从事党的城市政策宣传及反破坏反拆迁活动。参加的人员有我和王治华、周源歧、汤铭，以及张昌言、邹可嘉6人，王治华被指定为小组长。开始学习时，6人都到会，但后来从事实际工作时，只有前面4人，在短短的3个月里，我们做了以下6项主要工作。

（一）定期学习毛主席著作，武装头脑。

长沙市湘春路彭家井住宅公用合作社（含合作新村）是王治华、周源歧、汤铭3个在省社会处工作的合作人员，于1946至1947年组织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城无家可归的劳苦棚户，共同创建的全省第一个住宅公用合作社。那时，他们3人也没有住房，同样认股集资作为社员居住在此。我稍后认股入社，在此居住了33年。我们与所有社员感情融洽，群众关系良好。小组确定每周星期三下午，在此秘密集会学习毛主席著作，首先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其次是《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座谈讨论武装头脑。张蕴良每次必到领导学习，有时还通报程潜、陈明仁有关起义活动情况。有一次，他还带了一位姓袁的同志与会，共同讨论了当时社会流传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问题，讨论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暂时不会爆发，各自安心工作。后来，王治华还组织该社理事会成员陈福全、彭公卿等人秘密学习，使他们也懂得革命的道理。

（二）翻印革命书籍，供地下人员学习。

张蕴良组织的地下人员颇多，学习资料只有一份油印本，深感周转困难，要求合作小组解决这个难题。位于长沙市南阳街的湖南省书报编印生产合作社，是由原三湘印务馆改组而成，由小组成员汤铭担任经理，《新合作月刊》的印刷，前后均在此办理。于是小组决定在该社秘密翻印我们学习过的毛主

席著作，交由张蕴良转发他所领导的地下人员学习，因为没有及时收回工本费，以致该社资金周转困难，小组决定我深夜送去《新合作月刊》存纸6令，支援这一工作。我在暗淡的煤油灯光下，看到冒着生命危险，满身是汗印书的老宋，不禁肃然起敬。长沙和平解放后，王治华、汤铭随即组织彭家井住宅公用合作社社员胡锦涛、阳桂林、彭湘赞3人肩挑革命书籍，跟随解放军向南挺进，供应前线精神食粮，传播革命思想，沿途群众争相购买，先睹为快。有一次，胡锦涛等人与解放军失去联系，被白崇禧部队包围，幸经当地群众指点，躲藏于地窖之中，始免于难。

（三）开展护社保产斗争，保全人民财产。

1949年5月，湖南省政府决定省社会处裁并省民政厅，仍设合作科，我任视察兼股长。7月，省政府迁移邵阳，民政厅决定4个股长同去，其余遣散。科长任明高对我说：“邵阳隔新化很近，同去可以照顾家庭。”我拒绝了他的要求，并串联其他人员也不要同去，留在长沙参加起义。其时，省政府秘书长杨绩荪下令省政府员工消费合作社随迁邵阳，省政府公务人员中有一部份社员掀起了一股解散合作社瓜分财产的破坏风。小组采取了两面作战的方针，一面由王治华（笔名康一丁）写了一篇《论省政府员工消费合作社的解散问题》在《中央日报》发表，反对解散瓜分；一方面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在合作系统中开展护社保产斗争。我由民政厅宿舍搬到省政府员工消费合作社三楼，与小组人员一道，发动群众成立护社保产小组，由新任经理周晋瑜出面，组织留社人员封存存货资金，日夜轮流守护仓库米厂，防止破坏。对杨绩荪的一再催办，则采取避不见面，软拖硬抗的办法，终于获得了胜利，保全了人民财产。同时，我还到湖南省合作社联合社，布置护社保产工作，招呼留守人员王汉涛、苏文杰两人，清点财产造具清册，

加强保卫工作。

（四）起草和平宣言，开展和平签名运动。

省政府迁移邵阳后，省内和平运动高涨，程潜、陈明仁起义之事，也接近成熟阶段。为了加强和平解放的政治气氛，张蕴良要我起草《湖南合作界人士和平宣言》。我在宣言中写道：“八年抗战，国家元气大伤，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特别是湖南省会长沙，由于焦土抗战，文夕大火，人民房屋财产化为灰尽，风餐露宿死里逃生，饱受战争痛苦。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安居乐业，不料内战又起，至今打了三年，物价高涨，民不聊生。我们呼吁和平反对战争。过去国共两党合作，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今后尤望加强合作共同完成建国大业。”宣言由小组讨论通过油印散发，在省会合作界人士中广泛展开和平签名运动，签名者极为踊跃，湖南合作界的头面实力人物丁鵬翥，也在宣言上签了名。周源歧则利用他在省农会兼任干事，又与该会理事长周鼎古有浏阳同乡之谊，策动周鼎古参加了和平起义签名（周鼎古于50年代去世，1980年其子周壮任申请落实了政策，发给起义证书）。周源歧并将自己保管的省农会的文书档案，在解放后完整地移交民政厅接收。

（五）公开报导苏联及解放区的合作事业情况，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新合作月刊》系经政府审查登记的合法刊物，挂名社长刘修如，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周源歧利用这一优势，在1949年6月号刊登了社务委员湛劼刚根据苏联大使馆供稿所写的《苏联及解放区合作事业发展的情况》一文，向读者启示中国的合作事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蓬勃发展的希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有真正的可能。文章发表后，合作界人士耳目为之一新，反应良好。

（六）组织长沙市各级合作社团联谊会，迎接支前。

长沙和平解放前夕，小组发动省政府员工消费合作社、省合作联合社、省书报编印生产合作社、长沙市彭家井住宅公用合作社、市民消费合作社、新合作月刊、湖南合作月刊、湖南合作事业协会等合作社团，组成长沙市各级合作社团联谊会，商讨解放后的迎解支前事宜。其时，地下党为了发动省政府公务员参加和平解放运动，曾有湖南省级公务人员联谊会的半公开组织，王治华代表省政府员工消费合作社，被选为该会理事之一，会址就设在省政府员工消费合作社内。8月5日上午，当解放军尚未进城时，张蕴良通知王治华代表省会合作界，与省市各界代表，一同前往东屯渡，迎接解放军首长，下午部队入城时，合作社团联谊会与公务人员联谊会的人员，和市民一道，在中山路两旁列队，夹道欢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后长沙市人民在协操坪举行盛大的迎解支前大会时，我们组织了一支合作社团的队伍，由省合作金库出动的彩车作为前导，高举毛主席像牌，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参加了大会。

当8月4日程潜、陈明仁（兼省政府主席）将军率部通电起义时，原省政府留长人员，一致表示拥护，参加了起义行列。不久，原湖南省政府改称湖南临时省政府，仍由陈明仁兼任主席，袁任远任副主席。我串联了原合作科留长人员谷文钦、吴泽宽、胡士标、李頌廉、汪法庠、张申辅、王伦五等人，到原民政厅报到工作，因原合作科长任明高去邵阳，科中无人负责，高敬之厅长要我们推选一人，暂时负责，我被推选为暂时负责人，在民政厅学习了几天，清理了合作档案，转新成立的工商厅工作。

这时，刘润世已出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科长（1982年离休后回福建），他看过我写的《地下合作小组工作报告》后，嘱小组成员各写《自传》一份，并填了《地下骨干人员登记

表》存查，然后分别介绍到有关单位工作或学习。省委统战部给工商厅朱效成厅长的介绍信说我在解放前，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请组织按“进步青年看待”。朱厅长认为我是从地下来的，宣布我为代理合作科长。我向朱厅长汇报了省级合作社团的情况，随即着手准备接收事宜。8月31日，我代表工商厅和军代表高新发首先接管了省政府员工消费合作社，该社规模大、社员多，有新建三层楼房，省政府投有特种资金3亿元。张蕴良、王治华、周晋瑜等人作为移交人而被接收，随后修订社章令其继续开业，作为典型试验。王治华在接收一月后，去湖南临时省政府干部学校学习，结业后回工商厅工作。周源歧、汤铭两人由统战部函介去革大学习。周源歧在结业后，先分配在长沙市合作总社工作，后调至省供销合作社工作，因有地下工作证明，先入团后参加了党（现已离休）。汤铭在结业分配工作时，因家庭人口多，供给制不能维持其家庭生活，申请回家务农。其经营的省书报编印生产合作社，交由革大接收，改为印刷所。此后由工商厅接收的单位，还有省合作社联合社、国货陈列馆（今中山路百货大楼所在地）、湘江民船运输合作社和裕湘纱厂（今长沙纺纱厂）等。《新合作月刊》原系王治华等私人所创办，解放后原拟由张蕴良担任社长继续出刊，后考虑到经费筹措不易，决定停刊。该刊所有湘春路房产光洋160元契据，由我移交长沙市房地产局接收，图书资料和办公用品交省商业厅接收。

9月，原建设厅的商业工作人员转来工商厅，朱厅长乃将合作人员与商业人员合并改组为商业科，由新来的肖青野任代理科长。这时正值省委统战部函介长沙市福隆针织厂经理龙维舟（浏阳人）来厅，说龙在解放前思想进步，掩护党的地下工作有功，请工商厅设法扶助，渡过目前暂时困难。朱厅长认为我与统战部有联系，将此案交由我办理。我为该厂牵线搭桥，

由国营商业提供原料收回成品，并由人民银行贷款，解决营运资金问题，为时不久就摆脱了困境。

1950年3月，省工商厅撤销，所有商业科人员，转移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接管部贸易处工作。4月15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商业厅成立，由贸易处徐明任厅长，又将商业科分为商政、合作两科，我仍在合作科工作，负责编辑《合作参考资料》，并参与开办省商业厅第一期合作训练班（学员127人），同时与湖大合作系来厅实习的同学刘维之、刘亿中等人，在湘江沿岸码头，组织码头工人消费合作社。王治华则分配在计划科，负责商品流转计划工作（现已离休）。10月，合作科移交正在筹设的专管机构（后称湖南省合作事业管理局），我因熟悉亚伟速记，留在商业厅办公室工作，从此与湖南的合作工作脱节。

杨光耀湘西起义记

汤 健 民 *

建国前，汤菊中、汤子声、汤健民三人，在地下党省工委领导下，从事军事策反工作，先后策反了好几个国民党将领起义，其中策反湘西杨光耀起义，对于我大军解放湘西，进军西南起了重要的作用。

杨光耀，别名浚南，湖南古丈人，土家族，家境贫寒。其父早故，母子相依为命，开小店营生，小学毕业后，无钱继续上学，由于舅父是从事教育的，舅父见其聪明好学，乃支持杨读完中学。

1931年杨光耀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其时该校已在南京，毕业后分派到武汉大专学校任军事教官。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义愤，湘西苗王龙云飞为首，古丈桑景吾（杨光耀的同母异父兄长）、永顺王里恒等，相率抗日救亡，此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一贯秉承蒋介石之“攘外必先安内”的意旨，对龙云飞、王里恒、桑景吾等公然称为叛乱分子，通缉追捕。他们遂逃至武汉，并与杨光耀共商抗日救亡，他们政治背景各不相同，但抗日救亡的义举却是完全一致的，因之，杨光耀即辞去军训教官的职务，而一心协助龙云飞、王里恒、桑景吾等奔赴湘鄂边区，组织抗日武装；以凤凰总兵营（苗区）为基地，成立人民抗日义勇军，设总指挥部，龙云飞任总指挥，杨光耀任副总指挥。首先分路出兵声讨何键，一举攻下乾城，永

* 汤健民当时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统战工作。

绥、大庸等县，将百年来的“屯田制”彻底推翻，湘西各县无不拥护，如靖县的黄保辉，乾城的梁光湘，永顺的王里恒等所领导的地方自卫队，纷纷响应，声势浩大，威震全国，统治湖南长达七年之久的何键，终于垮台。

1936年张治中主湘，任命陈渠珍为湘西行署主任，安抚各路义军，恢复地方秩序。长沙大火后，薛岳主湘，所有边区义军，悉编为新六军，下辖暂五暂六两个师，薛岳兼军长，龙云飞任暂六师师长，杨光耀任副师长兼第一旅少将旅长。1936年杨改调为七十三军暂五师第二旅旅长，先后担负湖北公安、松滋江防。1943年杨光耀率部参加长沙第三次会战，支援李玉堂领导的第十军，身先士卒，作战英勇，在白马巷、经武门、杜家山一线巷战两日两夜，全部击溃了日军的猛烈进攻。杨光耀虽然立了功，但由于他率领的这支部队，不属于国民党蒋介石嫡系而被漏遣，抱着满腔的激愤，杨光耀退役了。

杨光耀被排挤离部后，抱着沉重的忧国忧民、报国无门的心情，只得回到他当时的爱人汤佩文的继父娘家——湘潭县韶山如意亭杨家庄。杨光耀的继岳父杨子寿是一位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其时，斯人已不在，但在杨光耀解甲归来，作为烈士遗孀杨母宋莹，却仍保存烈士遗风，她不止一次地向其抗日不成，报国不遂的女婿，讲述她已故丈夫杨子寿是怎样为人民不怕牺牲的壮烈事迹，也不止一次地讲述她丈夫在世时多次讲过的一些名言，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百姓从之，寡助之至亲友叛之。”杨光耀则以这些名言作为庭训，他不断反思，国民党内部的嫡系并吞非嫡系，大鱼吃小鱼的黑暗社会，何去何从，实应深思。

三十年代初，杨光耀在南京黄埔军校读书时，就与当时在南京作党的互济工作的汤弼中以同乡情谊，交往甚笃。杨光耀被国民党嫡系排挤下野来到杨家庄寄居岳家，这就使得两

位老友经常聚首谈心，汤弼中对于杨光耀内心的愤慨与矛盾是很清楚的。此时，担任韶山所在地清溪乡乡长的潘佑安，是一个顽固反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家伙，人民恨之入骨，若不把他赶走，对韶山地下党威胁颇大，汤弼中、周太宣、庞柱中等地下党员及进步青年，虽多次发动学生和群众驱潘，均不能解决问题。汤弼中想让杨光耀出来取而代之。经过地下党研究，认为这是良策，乃由汤弼中前往杨家庄找杨光耀联络，邀请他出任清溪乡乡长。此时湘潭县的县长是杨光耀担任旅长时的参谋长，只要杨光耀愿意出任乡长，赶走潘佑安是有把握的。但是杨光耀原为少将旅长，是否愿意屈从一个小小的乡长之职，这就需要地下党作大量的工作了，汤弼中既是杨光耀的老朋友，又是杨的爱人汤佩文的家族长辈，而汤佩文的继父杨子寿及继祖父杨舜琴，均于1924、1925年与汤弼中同志一起参加毛泽东领导的韶山雪耻会的战友，情牵瓜葛，进言容易，欲破曹营，汤弼中便成了必然的“蒋干”。因此，组织上决定派他去完成这一任务、经过汤弼中的多次出访，晓之以桑梓人民造福的意义，终于促使杨光耀屈就清溪乡乡长的职务，韶山人民在地下党领导下顺利地赶走了反共反人民的潘佑安。

杨光耀上任清溪乡乡长以后，支持人民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掩护韶山地区地下党的活动。1943年冬，国民党省党部密令湘潭县长文益善带领枪兵到韶山捉拿共产党员，杨光耀得此消息立即告诉汤弼中，并商量对策，经过研究，杨光耀未等国民党行动，立即先行亲赴湘潭县城，找到其旧部属正在担任湘潭县县长的文益善说：“你不必来韶山，清溪乡有我在，决不会有共产党的活动，今后地方治安，我当负责。”使韶山人民避免了一场灾难。

抗战胜利后，杨光耀辞去湘潭清溪乡乡长一职，再到湘西

重新组织武装，在其兄桑景吾（当时桑是湖南省第八行政区专员）的大力支持下，武装力量很快发展起来了。不久，他的部队与陈渠珍的部队联合组成一支庞大的湘西地方武装力量，后来国民党当局，欲将杨光耀部编入宋希濂管辖，宋希濂也想依靠湘西的地方武装，长期盘踞湘西，而斯时，辽沈、天津、淮海三大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我人民解放大军已云集长江北岸，即将南下解放全中国。在此关键时刻，何去何从，摆在杨光耀面前的道路是：弃暗投明，倒向人民，还是投靠国民党，自取灭亡，杨光耀站在三叉路口，彷徨犹豫。

1948年农历十二月三十日下午，汤弼中，在中共潭湘宁远边区中心县工委书记官达平同志岳家韶山如意亭烈马山作客，正在吃晚饭，地下老党员彭卓夫来找汤弼中报告：“杨光耀回杨家庄岳家过年来了。”汤弼中、彭卓夫两位老党员立即研究如何争取杨光耀在湘西起义的问题，他们两人认为争取杨光耀起义，对于我党解放湘西极为重要，湘西百年匪犯，从来未平息过，如果我们不去争取杨光耀，他必然会被国民党拉过去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湘西土匪如若勾结杨光耀三位一体，对我大军解放湘西，解放西南极为不利。如果把杨光耀争取过来了，我们还可利用杨光耀的影响，争取湘西各游杂部队、地方武装和大部分土匪起义，因此争取杨光耀在湘西起义实在至关重要，争取杨光耀能否成功，汤弼中、彭卓夫等同志认为有很大的把握，理由是：一、我解放大军，已临近湘西北，即将飞渡长江解放全中国，大好形势对策反杨光耀起义是很好的条件；二、杨光耀在抗日时期，担任韶山清溪乡乡长时，与我党有过较好的合作；三、汤弼中与杨光耀三十年代在南京时，就以湘籍同乡之谊，交往甚密，对杨灌输了爱国民主进步思想，两人的感情也是较好的，加之他的继岳父杨子寿烈士为国为民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对他很有影响，只要汤弼中去工作，杨

光耀是会听从的，因此，汤弼中立即辞别彭家直奔如意亭杨家庄找杨光耀来了。

汤弼中来到杨家庄，会到了杨光耀，两位老友，久别重逢，好不高兴，互询别后情况后，汤弼中抓住主题，向杨光耀展开了一系列的宣传攻势，推心置腹，促膝谈心，赞扬了他抗日救亡的战功和爱国爱民的事迹，历数了国民党嫡系排挤打击他的罪恶勾当，并就当时杨光耀内受湘西匪犯和各派地方武装力量的争夺，外受国民党率部进驻湘西拉他下水的压力，使杨光耀的内心矛盾重重，不知如何是好，表示同情关心，然后转到内战形势，阐明国内战场，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共双方激烈较量，解放军大胜，国民党惨败，国民党主力基本上被歼灭击溃了，剩下国民党非嫡系部队，无论如何抵档不了我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形势，然后晓以大义，指明出路，劝以国家民族前途和人民利益及本人家庭幸福为重，授以毛主席告国民党将士书，杨光耀这把锁终于被汤弼中打开了，杨表示愿回沅陵举旗起义。鸡鸣报晓，汤杨两人通宵达旦，聚谈结束，临别时，相约到长沙晋见省工委书记唐先生（即周里同志）。

1949年农历正月初二日，杨光耀应汤老之约，来到长沙市戩子桥至善小学，找到了湖南地下党省工委的联络员汤子声同志，汤老向其妹汤子声说明来意，汤子声立即向湖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周里同志报告，同意接见杨光耀。正月初三日的上午，杨光耀准时来到至善小学汤子声的房子里会见了周里书记，老党员汤弼中向周里书记介绍了杨光耀在青壮年时期就是一个爱国抗日有功的将领，被国民党嫡系排挤解甲归田，1943年屈任韶山清溪乡乡长时，掩护了我地下党，抵制了国民党要派兵到韶山捉拿我地下党员的秘令，现在与湘西行署主任陈渠珍在其兄第八行政区专员桑景吾支持下，组织了一支

庞大的湘西地方武装，但国民党意欲拉其部队编入宋希濂部管辖，妄图盘踞湘西长期与我党作对，现在杨光耀将军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决不与宋希濂合并，决心跟着共产党，在湘西举起义旗，特来向省委汇报他的起义打算和请示有关起义的工作。杨光耀向周里书记汇报了他的身世，奋起抵日而受到的挫折，在韶山与共产党的合作，此次回来探亲，与汤弼中深夜谈心，指明出路，决心在湘西利用他的优势，举旗起义。周里书记听完汇报后，对杨光耀拟在湘西联合陈渠珍、桑景吾起义的决心，表示欢迎，非常赞赏，并赠送了毛主席所著《论联合政府》、《中国往何处去》等著作，并相约再见一次，杨光耀抓紧时间，读完了毛主席的几本著作，思想认识大为提高，起义决心倍增。第二次周里书记接见杨光耀时，杨更感亲切，更加无拘无束亲近无间，因此，周里书记所作起义指示，杨均牢牢记住，然后，杨光耀怀抱着党和人民寄予的期望和信任，迅速返回湘西。

1949年2月，陈渠珍任命杨光耀为湘西行署参军长，杨光耀如虎添翼，他利用这一职权指挥乾城、古丈、保靖、凤凰等县的地方武装部队，正式举起了义旗。

杨光耀起义后，湘西各界大为震惊，称之为土八路。由于军威大振，有直逼长沙之势，西当时正在长沙省会担任省长的程潜，在我地下党的策动联系下，酝酿更大的义举。因此，杨光耀只需在湘西待命，不必打来长沙，湖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周里匆匆赶到长沙北区熙宁街他原来的秘密住址楼上，指示省工委交通员汤健民，立即要召见其父汤弼中。汤健民立即启程，步行百里，赶到宁乡县紫林宗一中学，该校校长汤弼中在1945年担任校长时，即与由周政同志领来的省工委书记周里同志建立了党的领导关系，周里同志还在这里建立了由省工委直接领导的中共紫林宗一中学特别支部。现在汤弼中接

到省工委的召唤，斯时，他虽已年至半百，党的组织观念，为党奉献的赤诚之心，使他立即行动，不辞劳苦，连夜赶赴长沙，周里面示他，赶紧前去湘西，嘱托杨光耀率部在湘西就地待命，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群众建立鱼水亲情，广泛发动群众，准备迎接解放。汤弼中不顾湘西土匪和国民党散兵游杂，打家劫舍，鱼肉人民，剑影刀光的险恶局势，他毅然邀请杨光耀的妻子汤佩文为向导，赶到了湖南第八行政区首府沅陵，住在专员桑景吾家，因桑是杨光耀同母异父的兄长，所以住在桑家安全可靠，汤弼中利用这个安全寓所，在桑景吾的支持下，向杨光耀传达了湖南地下党省工委指示精神，杨光耀根据省工委的指示，决定在湘西开展武装斗争，防止国民党利用湘西地利条件，盘踞湘西与我大军作对。国民党想要将湘西地方武装编入宋希濂部，这是证明。为了保存这支起义武装力量和打破国民党的阴谋，决定摧毁国民党军火生产基地，切断宋希濂的军火来源，打击宋希濂妄想并吞湘西地方武装的嚣张气焰。于是，湘西行署主任陈渠珍指示部属汪援华，第三营营长张玉林控制辰溪，杨光耀率领乾城田经武，梁光湘，保靖黄宝辉等部约五千余人，星夜驰援，直捣辰溪兵工厂，旗开得胜，顺利地解决了辰溪兵工厂，是役共夺得步枪三万五千余支，机枪五百余，弹药无数，这就是辰溪有名的“三五”事件。汤弼中完成任务回到长沙，向周里书记汇报了湘西起义军夺取辰溪兵工厂的战果，得到了周里书记的赞扬。此次汤老受命湘西之行，为和平解放湘西打下了基础，杨光耀的率部起义，为我大军进军大西南铺平了道路。

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后，湖南军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兵团决定由曹里怀军长率部进军湘西，周里受肖劲光司令员委托，找汤弼中派人，为四十七军先遣部队带路，汤弼中再次推荐杨光耀的夫人汤佩文及汤老策反起义的原国民党

十九路军连长李文深为大军带路，肖司令员在韭菜园亲切接见，曹里怀军长作了具体的指示，湖南军区统战部给了派令。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先遣部队，由汤佩文、李文深带路，一枪未发进入沅陵，然后，汤佩文跟着小贩赶场模样，去到乾城，向杨光耀传达了肖司令员及曹里怀军长的指示，杨光耀立即转报陈渠珍，并说服了湘西行署秘书长陈景尧、司令官戴季韬等人，陈渠珍接受了我党我军指示，并派杨光耀为代表，赶赴沅陵向曹里怀军长、政委周赤萍、统战部长颜凌申等表示湘西地方起义武装，接受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领导的诚意。旋即，曹军长派统战部长颜凌申前往乾城欢迎陈渠珍等归来，从而，乾城、古丈、凤凰等湘西六县和平解放。同时，邓小平、刘伯承率领的第二野战军顺利地通过湘西入川，为解放大西南，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湘西的解放是必然的，但如此顺利的解放，则是人心所向，而最重要的是我人民解放大军的威力，我地下党及其党员（包括湘西地下党及其领导的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奋斗，正确执行党的指示，发挥了党的统一战线的威力而获得的。而杨光耀能够接受我党的教育，在湖南地下党领导下，联络湘西行署及八行政区各有关人员，联络湘西各地方武装，弃暗投明，举旗起义，为反蒋迎解，作出了贡献。

湘西解放后，杨光耀受到我党我军的信任，派他协助曹里怀军长开展清匪反霸工作，湘西百年匪犯，被我人民解放军剿灭，杨光耀也是做了有益工作的，后来他客居香港，党的三中全会后，他多次回家探望亲友，愿为家乡的经济建设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胡风璋“投降”的前前后后

黄由亮 • 何大鹏 •

“马日事变”以后，靠反共起家的湘南土匪头子胡风璋先后担任过国民党革命军第一游击旅中将司令官、汝城县挨户团副主任、湖南省保安第十八团上校团长、汝桂宁遂上校“剿匪”指挥、湖南省第三区保安副司令等职，横行湘粤赣边，屠杀工农，血债累累。后因夺县长何钦的权被程潜关押。

1947年秋冬之交，郭名善等领导的湘粤赣人民起义在桂东沙田爆发，国民党当局多次“清剿”、“会剿”均遭失败。于是放出了反共起家的胡风璋，委派其为湘粤赣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1949年4月，胡风璋在广东乐昌县与薛岳密商了“剿匪”计划后，又于5月上旬，再次窜到广东活动。在拜把兄弟黎元勋的支持、策划下，纠集了土匪武装30余人，由黎的女婿沈剑萍护送，于6月23日回到汝城老巢石泉村。

胡风璋回到老巢后，立即招兵买马，成立了百余人枪的“自卫队”，封沈剑萍为队长，朱瑞贤为副官兼手枪队长。同时将全家搬进上古寨。寨子四周陡峭，易守难攻，寨内各炮楼架设机枪，设置岗哨，寨门有一个班的人守护。寨门用大石垒成，是通入寨内的唯一通道，又狭又矮，一扇门有五寸多厚，外层用铁板严封，门内用一把长圆形的雷公锁锁住，胡风璋作了这些布置后，自以为万无一失。

当时正值汝城解放的前夕（6月25日解放），在中共湘南

- 黄由亮现任郴州地区政协联络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 何大鹏曾任汝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地委、汝城县工委的策动下，汝城县警察中队、自卫总队800多人枪相继起义。驻守汝城的湖南保安第十一团在县长何康民和团长李可才的率领下，逃至下湾村，与胡风璋相勾结。由胡风璋的大儿子胡韶率领敢死队，向县城方向的商村阵地反扑，扬言要血洗汝城，但被我军击退。胡并不死心，退缩到上古寨后，继续负隅顽抗。

我湘南支队在6月25日解放汝城后，迅速调集所辖三个大队、警卫队和汝城县大队一、二中队共1800多人枪，配备16挺机枪，占领东西南北四面制高点，将石泉村层层包围。一面用武力攻击，一面开展政治攻势。为了瓦解敌人，湘南支队司令兼政委刘亚球、副司令李林通过在胡部任副官的内线朱瑞贤送信给胡风璋，令其投降，胡以“各守岗位，互不侵犯”回信拒绝。7月10日晚，李可才部慑于我军威力，在郴州之湖南保安团一个加强营的增援下进行突围。为了集中兵力歼击胡风璋部，遂放开缺口，于外围伏击敌保安第十一团，毙敌30余人，缴获步枪30多支。保安团残部则由援敌接应向郴州逃窜。

我军在敌保安团溃逃后缩小包围圈继续围困胡风璋部，并再次写信劝胡投降。但胡风璋仍顽固拒绝，并说：“共产党的话难听，不要理他们，”还说：“游击队没有炮，几根烂枪，没有翅膀飞上来，怕他个鸟！？”根据敌人的这一侥幸心理，湘支领导从北江二支队请调来了叶昌团的一个营和两门六〇炮。7月11日上午，该营从盘古羊高地向上古寨连开两炮，命中寨上指挥中心八角楼，寨内顿时一片慌乱。胡风璋受到意外的打击，心急如焚，生怕继续开炮，炸平山寨，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迫接受谈判，并派人送下一挺机枪，假示诚意。

湘南支队领导经研究决定，派朱汉樵到上古寨见胡。朱向他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布告，并指出：“你对人民是有罪的，你只有向人民投降认罪才有出路。”胡虽表示认罪，但当

要他交出武器时，却又百般抵赖。最后只交出枪50支、子弹30箱、手枪两支，以作敷衍。随即我军派出叶昌团一部进入寨内“受降”，留下县中队和北江二支队各一个班，搜检清理枪支等物，共缴获长枪220支，短枪20支，骡马14匹，背白布190匹，还有金、银、钱等一大批。第二天，胡一家搬下寨米，由叶昌部驻下湾村进行监视。胡风璋并非真心投降。从广东买回的180支中心式新枪，一直隐瞒未交，还暗地指使胡爱民、陈必先等人到广东九峰向薛纯武（国民党乐昌县县长）求援，派出心腹沈剑萍部配合何康民反攻汝城。同时指使其义子胡昭亮用买回的新枪组建“中国解放人民救国军”的反共武装，与我为敌。由于胡风璋父子不肯交出全部武器，湘南支队司令部遂于7月17日派人将胡押送县城监禁。

在县城监禁期间，胡风璋又暗中指使其义子胡昭亮用金钱收买看守人员，准备越狱逃跑。阴谋败露后，胡风璋又指使胡昭亮通过薛纯武写信给其叔父薛岳，联络桂系部队欧阳康团从广东城口进攻汝城，胡昭亮、何康民等人从九峰返回配合攻城，企图劫走胡风璋。这些阴谋诡计均被及时识破，其同谋欧阳发和联络员朱国福被逮捕，胡风璋被秘密转移到濠头山区老革命根据地。

鉴于胡风璋“投降”后暗中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以及回汝城后唆使其爪牙杀害我军政人员胡代明和居民多人的事实，湘南支队司令部决定将其处决。1949年8月15日，胡风璋在桂东沙田军茨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湖南省银行始末

陈 纪* 口述

省银行成立前的湖南金融概况

民国初年，全国流通的是印有孙中山图像的银元。由于军阀混战，国民党中央政府机构未达统一，不可能建立起稳定的完整的全国性的经济管理体制和金融政策。帝国主义的入侵，更造成中国银元一度外流，银元、钱票、铜元比值变化无常，市场紊乱。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正值全国经济紊乱之际，张敬尧主湘，他以挽救湖南经济窘境为名，废除以前银行的纸币，代以裕湘银行的钞票，在市场上大肆发行。民国十四年以前，票币铜元极度膨胀，为湖南金融的混乱时期。民国十五年至民国十八年为转变时期，继前期混乱之后，一切金融还未恢复常态。民国十八年以后，进入了平顺时期，政局既日安定。湖南省银行适时成立。

成立初期的省银行（1928—1935）

1928年5月，鲁涤平继任湖南省主席，经省务会议议决成立湖南省银行，资本总额定为二百万元，并通过银行筹备处章程，委任赵恒、张开琰等五人为筹备委员，以赵恒为筹备处长，张开琰为副处长。1929年1月，湖南省银行在长沙藩正街成立。3月间，何键任湖南省主席，仍由赵继任行长。发行的

*陈纪当时任省银行会计课课长。

钞票，票面上加印有“此钞票由湖南省银行发行兑现”字样，面值为一元、五元、十元不等。1931年4月起，增发一角、二角、五角以及角以下的分券等辅币券，及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不等的铜元券。这种辅币券的大量发行，增强了地方银行的力量，造成币制的贬值，然而，政府鞭长莫及，一时管理不了。1931年，辅币发行额为41万元；1932年，辅币券发行额为151万元。1933年，何键下令禁止滥发市票后，省银行开始发行银元券，这年发行总额为327万元（其中银元券213万元，辅币券114万元），1935年，发行总额为667万元。同年11月，蒋介石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发行权集中在中央银行，省银行的银元券被迫停止发行，只允许发行辅币券，主要使用由国民政府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省银行的辅币是由香港印刷发行的，票面是一角、二角、一分、二分不等。与此同时，下面各地还流行工商市票，市票的发行，五花八门，各式各样，有雕刻版、石印版、横版、直版，票面一元、二元、五元不等。辅币、市票的发行，有利亦有弊。利可方便交易，自由流通性很大，弊即促使一些不法分子从中捣乱牟利。

省银行成立后，便成为湖南的金融中心机构，在调剂经济和市场方面，均有很大贡献，一切渐呈好象。如利息之稳定，由接近三分的最高峰降至接近一分，最后常控制在一分左右；汇兑之稳定，先是汇票常因投机赌估汇水面失正轨，民国十八年以后，虽因贸易消长或限制现金出口，而时有涨落，然投机操纵之事，则逐渐减少；票币信用之稳定，湖南省银行于民国二十年发行票币，基金充实，发行数量，一视社会需要为升缩，使得需供相适，而兑现方法又不限制数额及时间，于是票币信用日益巩固，票币活动流通之利也日渐显著。至此时，湖南金融渐趋正轨，再也不似前期的扰攘不安之状。

抗战时期省银行的悲惨遭遇

1937年，抗战爆发。

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禁止银元流通，明文规定，只准使用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其他银行以及私下发行的纸币、辅币一律作废。法币票面印有孙中山图像，面值一角、二角、一元、二元不等，省银行发行的辅币也被迫停止，只流通法币。1937年，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省银行由财政厅长尹任先兼任行长（后由彭湖继任）。1938年，修改行章，资本总额改为500万元。1938年，“长沙大火”烧得长沙城一片狼藉，惨不忍睹。省银行不得不转移办事处，于是，临时迁到了沅陵，在沅陵设管理处，开始之省银行颠沛流离遭遇的第一站。但沅陵太偏僻，阻隔了与外面的联系。1939年，薛岳继任省主席，由其亲信丘国维任省银行行长。

抗战时期，由于轰炸厉害，尤其是1938年“长沙大火”后，国民党省政府怕长沙失守，实行政治中心大转移。1940年3月，省银行也随省政府及九战区司令总部同时迁到耒阳县城，驻在城关神农殿内，并以玉皇殿作为职工宿舍。

在耒阳期间，省银行对经营管理及业务管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省银行系统机构不断扩大，省总行职员增达300余人，银行业务也出现畸形发展趋势，收入不断增加，总行每年纯收入也不断上升，省银行对抗战时期调剂地方金融，繁荣社会经济，抑制商品价格等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有“财神会”、“王百万”出现。

省银行在耒阳，一直呆到1944年6月的耒阳失守，此后便撤至桂阳。在日本鬼子节节逼进的情况下，省银行也被迫到处流亡，一直到桂东县的沙田圩。1945年9月，抗战取得了最后

的胜利。9月份，省银行才又迁回长沙藩正街，结束了它到处流浪的一段生涯。

“护行、保产”

1946年以后，局势日渐明显，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步步逼进，武汉告急。白崇禧率部退至湖南，企图负隅顽抗，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勒令省会各机关迁往邵阳、湘西等地。国民党军兵在湖南大肆破坏，造成一片混乱。湖南人民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反破坏”、“反迁移”，护厂、护校、保产的斗争。那个时候，地下组织已经成立，各方进步人士纷纷与地下组织接头联系。省银行稽核课长钱去非，会计课长陈纪以及营业课长张友尚也与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参与了“中共华中区第七总部”（简称3130，是湖北省的一个较大的地下组织）的工作，主要是在省内进行工作。同时，陈纪等还参加了“民联”，即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为护行、保产做了大量工作。组织人员暗中相互串联，做好护行保产的工作，并利用总行自有电台，电令各地行处，务必坚守岗位，妥善保管好库存现金、帐表档案以及枪枝弹药等等。1949年8月5日长沙宣布和平解放。由“军管会”金融处负责办理接收手续。钱去非、陈纪等都参与了移交工作。陈纪先生是负责帐务方面的工作，早在移交之前，他便清点好了帐务方面的一切，造册汇总之后，便找“军管会”进行移交，遂将帐表、财产、库存、人事档案一并移交给了“军管会”。1949年8月接收后，前由省银行发行的银元辅币券，仍由该行登记限期收兑，有3万多元没收回，在移交过程中，全都如数移交。整个移交过程都比较顺利，移交手续也比较完整。至此，湖南省银行全部财产如数归还给了人民。

8月5日晚10点多，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在长沙市民

的夹道欢迎下，威风抖擞地、浩浩荡荡地从小吴门进入城内。陈纪以及钱去非等参加了湖南省银行的欢迎行列。整个长沙城彻夜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

省银行接收完毕，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举办了第一期干部训练班，全体工作人员都参加了学习，由副行长廖生东主持学习。学习期满，才重新分配工作。解放后，总行设在中央，下面设有分行，象长沙便为分行，县里再设有支行，负责信贷、储蓄。此后，由于银行业务的扩大，银行机构也越分越细，除人民银行外，还有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学习期满后，全体行员重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真正地当家作主，开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走上一条康庄大道。

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体制

省银行成立后，在不断的工作中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体制。

1、基层机构的不断充实。抗战前夕，省银行仅仅在衡阳、常德、湘潭、益阳、邵阳、津市等几个较大一点的城市设有基层机构，分工也不象现在这般细，比较笼统，业务范围很小。

省银行是一个金建机构，它发行币制，统治地方资金，控制着整个湖南的经济命脉，在各地设分行。迁往来阳后，在那边指挥全省各分行，建开长沙，目的是不让日本鬼子对它进行被害。省银行这一迁移，保存了其原有的机构。当时职员约120余人，内分设文书、业务、会计、公库、发行等五课。当时，按照省银行的组织章程，还设有理、监事会，规定省总行应在理、监事会的领导下工作。1941年，湖南抗战局务相对稳定，省银行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基层机构体制进行了一番更改，取消了分理处的设置，改为分行、支行、办事处三级，

仍直属总行管理和领导。同时，大力发展和普设基层行处，除在省内相继完成金融网络的设置外，为了抗战的需要，对个别外省的大、中、小城市设置支行，如重庆、贵阳、柳州、韶关、吉安等地均设有支行。象江西吉安支行，便是省银行在抗战时期设置的省外支行，其主要作用是配合抗战，抗战胜利后便撤销了。吉安是通往上海，连接海外的一条重要路线，是一个枢纽地带，日本鬼子一直没有占领这个地区，在那设支行，再好不过，主要经营汇兑，扩大了业务，扩大了交流。

2、业务管理上，环环扣紧，分工负责，比较明确。总行统管全行，分支行处负责资金运用，保证完整无缺，分行定期或不定期向总行上报。省银行就有每年一度的全省性银行行务会议。总行也下去视察，进行不定期的查帐，制度完善后，成立有专门的稽核课，集思广益，听取群众对开展业务的意见，定期召开业务会议，搜集分析经济情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沟通信息，组织成网，有利于业务的开展，有利于监督作用。

内部制约上，也是各管各行，分开管理，相互监督。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制订、补充、完善管理制度和会计规程。

分行的机构设置也比较精简。经理、副经理、营业部、会计、出纳等，都视业务多寡而繁简。会计，负责审核存、放款以及业务支出等手续和执行各种制度规定。分行的整个业务都由经理来掌握，那个时候，主要经营放、汇、存款。存款极少，管理也比较笼统，一个人办成两三个人共同办理，这主要由业务的大小而定。十多、二十个人，每天的营业，工作分工，仓库等等，事无细巨，全都由经理一把抓。工作繁忙，责任奇重，幸亏所用人员大都经过训练，业务水平较高，有一定的工作能力。

3、信贷业务。省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促进了总行信贷业务的发展。扶植较大的工厂企业，象裕湘纱厂，当

时便在省银行开立了户头，与省银行有一定的业务往来。其次，采取往来透支方式便利工商客户。这是一种信用放贷形式，在工商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条件下，除巨额贷款采用抵押借款的方式外，对信誉较好的工商企业给予一定时期内的信用透支额度，在额度内随时凭支票支用，随时归还，除订立透支契约，无其他手续。这一方式有存欠利息相抵的好处，颇受客户欢迎。最后，省银行广泛开展押汇、押款、汇兑业务。在各地设分行、支行、办事处，省外也设有支行。汇款分工商汇款和个人汇款，解放前，主要是经营工商汇款，个人汇款很少。汇款除一定的汇费收入外，实际上它是另一种吸收存款的方式，是一种不需要支付利息的资金来源，可以充短期运用。汇票有两种，一是信汇，一是票汇，送汇上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大大方便了客户。

押款，即有抵押的放款。省银行配有专门的仓库，库存抵押物件如棉花、麻等等，抵押放款，主要是凭信誉做，开始之时，货物抵押放款很少，以后才慢慢地多了起来。押款这一措施，大大便利了客户，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了不少作用。

1938、1939年才始有储蓄，开始吸收一点个人存款，但很少，一般来说，个人有钱也不存银行，他们情愿用来做生意。省银行对那些信誉好的客户，给予放款方面的优先，这一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客户，扩大了省银行的信贷业务。

日益完善的人事制度

省银行成立初期，地方银行人事方面全由总行统治。如经理、会计、出纳的任用及调动，均由总行决定，分工较为笼统，没有专门的人事机构。

人事采用考核制度。以前，一方面讲资历，一方面讲能

力,全由行长负责考核。随着省银行业务的不断扩大以及总行的不断发展,要求人事制度日渐完备。在耒阳时,设有秘书科,虽不是专门的负责人事工作的科室,但较之前期,已经有了很好的改善,以后,才慢慢设有人事处、人事课,专门负责人事方面的一切事务。

职员来源也是采取考核录用制度。省总行先后在长沙、耒阳办了两期短期训练班,其主要是具有高中文化水平以上的青年,考核录用。1942年,为了应急,又在耒阳连续招收了两批练习生,边干边学,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培养了一大批的专业人才。

省银行自成立到1949年的接收,历经二十几年,在调剂地方金融,繁荣社会经济,促进湖南经济发展等多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邓小英 整理)

军统特务破译密码的人和事

陈 达 *

军统特务主要的业务是搜集情报。在搜集情报方面，它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有所谓：“求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说法。而破译敌方的电报密码，是军统获得敌方重要情报一项经常性的极其机密的工作。

军统头目戴笠一向重视破译敌方密码工作，早在1937年10月间，他就叫译电科长姚敦文在西安破译了延安共产党发出的无线电密码一份，内容属于军事性质的，戴笠欣喜之至，马上转报蒋介石，并奖给姚敦文法币五百元。

随后，戴笠又在重庆、金华、桂林、西安、赣州等地设立了无线电侦察台，专门搜集日本侵略者及中共的无线电电报，并成立了密码破译工作组。除指定姚敦文组织译电人员六、七人从事破译工作外，还重金聘请了两个美国密码专家任指导工作。

破译密码工作，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往往每日收集了敌方密码数十份，但总是在这些密码中反复钻研，不可能一下就能破译出来。戴笠认为这项工作极其重要，不惜投下大量人力财力。由他签请蒋介石批准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特种技术研究室”，专门从事敌方密码破译工作，以军统局第四处（电讯处）处长魏大铭兼任该室中将主任。实际负责的则为军统局译

*陈达当时任军统南昌站副站长，现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电组组长姜毅英（女）。在该室任破译工作的特务，多为译电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共有三十余人。

姜毅英，浙江江山人，原名姜鹤根，父亲是个木工。姜本人杭州第一高中毕业后考入杭州警察学校，1933年毕业。毕业后，戴笠委她为译电员，工作勤奋，译电业务娴熟，旋升为军统局厦门电台主任报务员，兼任监察台密码破译工作，加发双倍工资。姜毅英在破译工作中，从日本军部无线电报内侦知于1941年12月7日日军将对美国珍珠港的海军发动突然袭击的重要情报，交给戴笠亲自处理。

据熟知此事的军统局译电员王绍谦（江山人，戴笠的私人译电员）说：抗战初期，美国并未向日本宣战，相反，美国还出卖大量钢铁给日本。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满。当时日本驻美国大使白鸟敏夫向美国使用了表面讨好，实则相机重创美国的外交阴谋。所有白鸟敏夫赴美就任大使后的活动情况及白鸟向日本政府发出的无线电电码，都被姜毅英破译出来，送给了戴笠转呈了蒋介石。蒋介石即将白鸟敏夫代表日本政府对美国的阴谋电告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罗对此抱将信将疑态度。蒋介石再电罗斯福，恳请美国不要出售钢铁等给日本，并要求美国对日宣战。但罗斯福未予置理。蒋介石最后用威胁口吻三电罗斯福，说如果美国出卖中国，中国只好自己出卖自己了。意思是说中国只有向日本投降了。那么，整个世界局势对美国不利。正在此时，姜毅英获得了日军将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的绝密电码，由戴笠转呈了蒋介石。蒋如获至宝，即批示：“速通知美国政府。”戴笠当即迅电军统局美国站站长肖勃，命肖勃立即转告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郭德权，郭接到此项重要情报后，马上转致了美国五角大楼海军司令部。

美国政府包括美国海军司令部过去对中国的抗日情报工作，不予重视，认为中国作战能力差，情报工作也差。对中国提供

的日本侵略者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付之一笑。并说什么：哪有这种事。很可能是中国故意挑拨美日两国关系的伎俩。丝毫没有采取预防措施。

结果，日本空军、海军联合秘密行动，于1941年12月7日凌晨在珍珠港突然袭击了美国的海军舰艇，使美国遭受了从未有过的重大损失。

珍珠港事件之后，蒋介石对戴笠能获得日军情报，事先转知了美国，感到十分满意，称戴笠的情报工作做得好；戴笠对姜毅英能破获日方绝密电码，事先得知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认为功劳很大，大大提高了中国情报工作的信誉，因而立即给姜毅英由原来中校级破格提升为少将译电组织长。姜毅英便成为军统局唯一的女少将人员。

接着，美国海军司令部主动找戴笠，商量成立“中美情报合作所”，由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准将梅乐斯为副主任。从此大批的美国特务人员及特务器材等，源源不断运入中国，落入军统特务之手。所以，中美合作所之所以成立，中美特务之所以合作抗日等等，源于军统向美方提供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而这一情报之获得，又出自军统女特务姜毅英之密码破译。这一中美特务合作的契机与内幕，至今鲜为世人所知晓。

又据参加密码破译工作的特务员祖欣（江西新建人）对我谈：“破译密码是一项从暗中摸索密码规律、极其复杂细密的工作。由各地侦察台（专门抄收敌方、包括日本侵略者和中共等的无线电报）收抄来的密电码，首先要从呼号中弄清是哪方面、哪个单位的电台电报，再由密码研译人员针对发报台的性质、估计可能有的内容，先从虚构、假设入手，在一份电报中找出相同的电码，把它假定为某一个常用字，然后仍用假定的意义来摸索试探、验证，逐步得出一份完整的电报全文，又日积

月累地逐步构成完整可供使用的密码本。研译密码的方法与程序，没受过专门训练，不具有专门知识的特务，是不可能弄清楚的。一份密码电报，要破译出来，往往要费很长时间和很多人力。但如果破译出来了，以后便可按图索骥了。破译电码工作之所以重要，因为密电码一般都关系到极端重要的军事、政治、外交等机密内容，对于窥测敌方内情是十分重要和非常有效的。

为军统打开了中美特务合作之门的女特务姜毅英，她的丈夫叶文照，江山人，亦系军统局第四处电台报务负责人之一。姜升少将后，架子也大了，夫妻感情开始淡化，最后离了婚。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姜毅英由上海逃往台湾。毛人凤死后，军统局为蒋经国吞并了，姜离开了情报工作，由人介绍充任台北国立雨声小学校长。现已退休，仍居台北市。

另据姜毅英对江山籍军统特务周坚谈：“在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密码后，姜毅英照样继续破译日军的密电码（因为日军并未发觉），得知如下情况：日本的重要谍报员吉川少尉，在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后，奉派侦察偷袭战果，吉川来到阿兰高地，系化装中国驻美使馆外交人员，伪称了解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况以便向全世界提出控诉为幌子，在一家日本人开的海滨餐厅（是日本间谍在十年前开设的联络点）——春湖阁，与该阁的坐探人员联系，得知美国停泊在珍珠港的舰艇，和停在舰上的飞机，除出航未返的三艘航空母舰幸免外，其余舰艇一百二十余艘及海、空军官兵三千余人、飞机一百八十八架全被日军飞机炸毁。吉川并从春湖阁的日本坐探人员得知，当日军偷袭珍珠港时，美军官兵正在兵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饮酒狂欢。

军统局的密码破译人员之一李开峰，化名余玠，在抗日战争中，偷偷地投靠汪精卫的特务组织——汪记特工总部。头子

是丁默村。李开峰由于向汪伪组织出卖了军统破译工作的机密，得以升充汪伪特工总部的电讯处处长。专门从事破译密码的任务。后来李开峰由上海迁到杭州汪精卫的政治保卫局密码研究室——粮道山，领导汪伪特务二十余人专门搞密码破译工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军统局的密码破译献给汪精卫，获得汪之厚赏。戴笠得此情报后，密令在上海敌后工作的上海行动总队长毛森将李开峰暗杀于上海。1943年除夕，李开峰从杭州赴上海，偕一洋汉奸给早已投降日军之原上海区长陈荣澍拜年。毛森获知这一情况后，即密遣陈荣澍的警卫员刘金德（江西吉水人，是毛森的老部下，陈荣澍降日军时一道附逆），晓以利害及民族大义，说只要立功可以不咎既往，不再追究附逆罪行。刘金德听了毛森的话，趁李开峰等狂欢之际，混在一起歌舞。及至翌晨正月初一早七时，刘金德假献殷勤，说我开车去送李先生回公寓休息，车至上海岗民路长乐路口时，刘偷偷地拔出手枪，向李开峰连射两枪，弹中头部，当即倒毙在车上。刘金德飞快停车，跑步向毛森报告杀李开峰的任务已完成。毛森电戴笠，报告杀李经过，并请求免究刘金德一度附逆的罪责。刘金德被毛森任为上海行动总队中队长，直至抗战胜利后。戴笠为除掉了破译军统密码这一心腹之患，对毛森、刘金德甚为赏识，毛得以升为少将处长，刘金德得奖金法币十万元。

我的特务生涯

刘峻德* 口述

我是怎么进入特务组织的

1939年8月，我以录取名次第二考进了湖南大学经济系。当时慈利与我同时考取的有李文进（别号李子大，现在台湾）、李伯先（系王育琰的外甥）、安齐家（女）等4人。1940年12月，我经政治系同学李笑白（临湖人）介绍，加入中国湖南省调查统计室（简称中统），直属湖大干部小组。1942年6月，李笑白在湖大政治系毕业后，赴重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干事，我继任中统湖大干部小组组长。当进中统在湖大的主要任务有四项。第一，发展中统组织，竭力为成员服务。几年内，我先后介绍湖大同学30余人加入中统，其中慈利人有莫博、卓尚瑞、安齐家等。莫博在湖大毕业后，想当国民党慈利县党部书记长，我给他出点子，要他来长沙找王本来，因王是继我之后担任中统湖大小组组长的，并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机要秘书，是个能千人。莫按照我的意见当即找了他，马上得到了支持。第二，把住权柄，控制学生活动。我自己担任学生会自治代表大会的秘书和主席，主要活动由我出面。曾以主席的身份接待过莫国学生联合会主席Montg和从莫国牛津大学回国的地质学

*刘峻德曾任中统湖南大学干部小组组长、津市国税稽征局局长，建国后曾任慈利县第一届政协委员。

家李四光。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天他从湖北鹤峰山顶上带来4个大卵石，送给湖大一个，是我亲手接的，我们热情招待了他。其后，还剩3个他带去到英国发表了地质论文。文章中说，若干年前从湖北西部到广西北部曾在新生代发生过冰川，卵石便是具体证据。象这样的大事非中统的人则无权接待了。第三，千方百计防止异党活动。当时所指的异党除了共产党外，还有国家主义派、汪精卫国民党和汉奸。1942年10日，湖南省调统室将在长沙的地下党员、湖大同学方心黎交我领导，其意防止他活动。1943年2月，方赴贵阳，我给他把关系随即转去，并暗中派人监视（方后自首）。1943年5月，我的同班同学朱正平因被人在邮政检查中发现他和共产党方有信件来往，沅陵专署将他逮捕。同年6月，我们系主任周德伟对我说：

“你去把朱正平保出来，他要参加毕业考试了。”我难为情地说：“此是事关重大，我看要学校出正式公函为宜。”周认为我的意见很好，当即开了一具湖大的正式公函，并附上他本人给沅陵当局陈迪光的亲笔信，一同交给我，我便接受了这一任务。到沅陵之后，先找了中统沅陵区室主任杨盛英，要他同我一起去找了陈迪光。经过一番交涉之后，将朱保了出来（朱在解放后任湖南日报编辑）。1942年10月，湖大体育系主任袁浚起意要把湖大校长胡庶华赶走。胡见势不妙，为挽救自己的命运，启用李祖荫担任训导长。一天，李对我说：“你知道校长要我担当此任的作用吗？”我摇摇头。他告诉我：“这件事你不明白吗？他认为我与你亲近，要你帮忙，抵挡袁浚。”我们相视一笑。湖大的同学都知道李祖荫出版的“民主概论”是根据我所讲的笔记补充而成的，李在序言中也曾说明了这一点。有几次袁浚还挑起三青团份子闹学潮，气焰嚣张，大有倒潮江之势，校方由于我的帮助给镇压了下去。1943年6月，中统王开晋到辰溪办事，见面问我：“你知道胡庶华辞职后的继任人

选吗？”我不假思索地说：“易鼎新合适。”（易是湖大区党部书记、全国有名望的机电专家）王说：“教育部已内定由李毓尧继任，并要你留在湖大帮助工作。”我说：“我的锋芒太露，搞下去就会月盈则亏，还是让王本来干吧！”（李当任后，仅一年时间，1944年5月，湖南发生特大学潮，大家都说我有先见之明。）第四，作反动宣传。我们利用报刊、传单等舆论工具攻击敌对派。其文章内容多是对付共产党的。我曾亲笔写了一篇关于文化的斗争的论文，寄往重庆，得到好评。

赢得蒋介石的青睐

1943年5月，三青团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我利用三青团中的中统分子以及和我接近的三青团员首先进行活动，拉自己可信的人作人选，获得成功。我平日最信得过的瞿楚（安徽人，政治系教授，现在台湾）和萨本熙（即国民党元老萨镇冰之孙），二人为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湖大代表，目的达到了，为此感到高兴。我因此趁机吸收瞿楚加入中统。瞿在重庆与会期间，蒋介石亲自召见了。瞿楚向蒋汇报了湖南的情况，并说湖南有作为的青年大有人在，第一是刘峻德，第二是江国栋（当时是三青团湖大佐理书记），第三是萨本熙。蒋介石当即记了下来。瞿回湘告诉我，我未作声。后经证明他并非讨好，的确为我作了推荐。

1943年6月，我在湖大毕业后，校长要留我在本校经济系任助教，兼做训导员，瞿楚继李祖荫之事，我发现气候不正，作了推辞。一天从辰溪到沅陵的途中巧遇中统局专员徐政（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的兄长，又是陈立夫的表兄弟）二人寒暄一阵之后，徐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委座已下手令，命令你和江国栋二人到重庆三青团干部大学学习，这可是件大喜事呀！”他

还说：“干部大学教育长是蒋经国，他善于用人，你借此机，一是好好干，二是打入三青团中，为我们好打下基础，此事甚妙。”我沉思良久，没作答复。他催问我，我说待想想再说。适逢国民政府考试院举办全国高等文官考试，沅陵设了一个考区（地址在府坡上，县党部内），其考试内容分普通行政人员、财务行政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三种，我报的是财务行政人员。报考资格规定：凡国内外大学毕业，有一定行政经验，持有证明者方可。我通过考试侥幸被录取，分配到财政部，再由他们分配到衡阳直接税局任十级派用代理第三科科长，调任货运登记室主任。重庆也许因为事忙，再也未来信找我，我谢天谢地。

1944年3月，徐政以国家税务委员会专员兼任衡阳经济检查队队长，同学李笑白担任检查队第一科科长，我任秘书。其时的紧急任务是检查银库。我们共分十个小组，分别对衡阳所有的银行仓库进行检查（当时衡阳有大小银行47家，从铁炉门到大西门称为银行街）。我担任一个小组组长，先后检查了浙江地方银行、中国银行、复兴银行、湖南省银行四家，将仓库的存货逐笔登记，双方签字，贴上封条，并警告对方：非经国防最高会议批准，不准启封。但后来，他们都一一向九战区活动，经薛岳签字后，逐个开封了。我为此曾发过牢骚：“捉鬼是你（指蒋），放鬼也是你。”

隐信在心底的不满信端

1944年6月中旬，日寇逼近衡阳，第十军进驻此区，国税委员会令我们中统人员18人，协助第十军做对敌工作，受军长方觉指挥。其直接与我们联系的人是他的参谋长孙鸣玉。6月22日，日寇进至衡江东岸，碉堡林立，炮声不断。方觉在凌晨5点找我们召开紧急会议，他说：“刚才接到重庆电令，刘峻

德等18人，立即撤退，不作无谓牺牲。”我说：“现在公路已毁过四塘（衡至祁阳，每塘10华里），不能开车，我们步行40里，随时可遇到日寇，不是更作无谓的牺牲吗？”方说：“这件事请你放心，我已派两个连的兵力护送你们出境，给你们每人发一支手枪，以作防卫，到郴州后交给第四战区。”我知道这里面一定有蒋经国的主意，要不怎会点我的名呢？于是我们按令起程了，天微亮，一行18人，从衡阳起步，两个连的士兵护在两旁，安全地走过四塘。一到站，两辆吉普早已等候待令，我们分乘两车，第一组九人坐前车。我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不死为胜，我坐在最后拔出手枪，将保险盖打开，命令司机加油门开车，喇叭不断。其意是要前面车不停，以冲过险关。刚开几分钟，九架日机凌空而来，俯身向我们扫射。司机扭头问我怎么办？我果断地命令：“加大油门，继续前进。”同时，暗作打算：要是司机是汉奸，必将停住车，任其日机击毙。我下了狠心，只等他一停车，立即将他打死，然后自己代开，我自己也做了死的准备。到了冷水滩，日机远走了，我们才松一口气。司机问我：“刘科长，敌机向我们不停地扫射，你为什么不让停车？”我说：“这个问题你自己多想一下自然明白。”到了柳州，立即向第四区报了到，并交了枪。谁知一入城就碰上一件使我不顺心的事儿：张发奎正杀陈牧农（九十三军军长，桑植人，我们在衡阳见过几次而）。这件事引起我的深思。陈牧农不是抗战派吗？为何被杀呢？在柳州没呆多久，我坚决要求离开。后又到衡阳税局报到，任第三科科长。对于陈为何被杀，脑海中总是有一个问号。

1946年至1947年，我任衡阳直接税局审核员（副局长），1947年9月，江国栋从南京来电，要我速赴南京，接着又收读他的来信，信中说：“蒋经国已任上海经检队队长，因你帮徐政搞经检有方，我又向蒋荐举了你，蒋要你担任经检队秘

书。”（江是蒋的政工处长）我看罢信，思之再三，决定不去，也未回信。其理由是，往事醒目，若有所悟。1943年徐政要我赴重庆三青团干部大学学习，嘱我为中统打下基础。事情很明显，让我作派系斗角的工具，为他们的利益付出自己的血汗。今天又来找我，还不另有他图？1944年查封衡阳银库，原想通过检查经济以平衡物价，稳定战局。以后，谁知人家向薛岳一活动，都被启封了。这又说明了什么？同时也使我想起陈牧农的惨局。陈本是在湘桂边境黄沙河布防，可有人向张发奎说是道非，给陈栽祸。张硬说他是临阵脱逃。归根到底是张的嫡系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失守长沙，蒋介石把他押往重庆枪杀了。张发奎不服以陈是黄埔第一期生，抓陈抵帐。这叫做郎中抗衡，病人遭殃。我的友人说：“我们的人没死在日本枪口下，而死在自己人手中，那简直是轻如鸿毛呀！”这又何必，说明什么呢？一幕幕往事和现实，使我清楚地看到了当时的局势，不禁失望地哭了起来，眼前感到无限渺茫。此时好象自己已飘零汹涌澎湃的波浪之中，不知何处是我归宿的彼岸。

彼岸向我慢慢靠近

1949年3月，我的老师、湖大法学院院长李祖荫（此时是湖南教育厅厅长）从长沙给我一封信，叫我速去见他，另有安排，信中没说明其他所以然，我看罢信一声冷笑，将信撕毁了。不几天充任了津市国税稽征局局长。我从一些迹象发现，津市地下组织活动正勃勃兴起，新华工厂可能是据点，该厂工作人员高丕新常来找我扯谈，其他如老屠、老贾、吴景美等人（后来知道了，他们都是地下党骨干）也是我的常客，我的随身勤杂人员肖茂熙经常与他们来往密切，还有左承统、胡有盛也常与我来往。尤其是龚剑平（后来才知道他是第六突击队队

长)更是与我形影不离,也是我吃酒的好对手,这一切反常现象使我似乎懂得了一些什么,何去何从,决定听从命运安排。同年4月,我在国税局油印机旁发现一张《新华日报》,上面全是宣传共产党好的事。我大吃一惊,事关重大,知道自己暗中已被地下组织包围了。唯一的出路只有投其所好。于是将报纸折好,亲手交给高丕新,对他说:“你们只怕要小心点儿,最好是把‘新华’二字删掉,以免张目。”从此,高也推心置腹地对我说:“刘局长呀,你要明白,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大局了,望你三思而行。”他向我进行了宣传,要我弃暗投明,还向我保证:“你只要听我们的安排,一切后果由我们负责。”我说:“任其春水向东流吧!”

1949年5月22日,第十七绥靖司令部李默庵调周淘漉担任澧县指挥所主任,他一上任,就对津市进行了一次突击检查,从当晚11点开始到凌晨5点才结束。天晓得,这时新华工厂的领导人也许早有察觉,将所有的东西都收藏在我的柴炭房中,让我不知不觉地为他们作了一道挡风墙。晚上我回家,妻子蔡修漆告诉我说:“峻德,他们搞的事不会连累你吧!”我也有所觉察,对她说:“请夫人放心,我自有办法来个两头对付的。”果然周淘漉斗胆领兵11人,冲进办公室,找到了我说,要对国税局进行检查。我面带微怒地对他说:“难道对我们国税局也信不过吗?”他微点头。我火了:“按你的意思,我们国税局也藏了共产党啰!”周这才连说:“别误会,别误会,我是对你们自己负责呀!”我想把我的调查证亮出来,杀杀他的威风,但想到这是4月30日的,过期了怕惹麻烦,冲他没好气地说:“你知道我刘某人是干什么的吗?”周也气愤了,一挥手:“走!”边走边说:“好,我不管了,由你自己负责,到时谅你也跑不了。”周一回常德,就向李默庵汇报了我的情况。幸好李湘薇在旁,便问他:“那刘某不是那个刘峻德吗?”周

答：“正是这小子。”李告诉他说：“你放心，他是中统那边的。”李默庵只好作罢了（这话是湘薇后来告诉我的）。不几天，周又来津市，直接到办公室找我，我准备与他斗一场，没料一反常态，倒向我认错了：“刘局长，小人有眼无珠，冒犯了您，请谅。”我哈哈大笑说：“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我这时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看来只有靠岸才是唯一的出路了。

终于冲出了大漩涡

1949年7月22日下午4点，长沙来电命令我立即撤退。下午8点，长津轮船公司经理吴春芳到国税局对我说：“刘局长，我们的轮船已达码头，请您马上搬行李上船。”说罢他就走了。他一走，肖茂熙立即对我说：“我和太太已经讲好了，我们不走了。”当时吴景美正坐在我的旁边，用眼神在向我说话，其意思以不走为妙。我对肖说：“不走就不走，你赶快给吴春芳回信，说风浪太大，不去了。”

7月23日早上7点，商会送来迎解通知。通知一来，全机关注目以待，第一个签名的是我，签了名还不算，我叫税务股长庞锡纯替我在上面盖上私章，大家见我诚了心，接着都签名盖了章，共200张，张张都如此。上午9点钟，商会集合。当我到商会后，大家商议迎解之事。他们说突击队第六大队正在后湖坪堤上，要派人迎接他们入市。派谁去合适呢？大家都对我望着，常务理事汪文斋说：“我建议刘局长走一趟为宜。”接下理事长龚道广说：“龚大队长和刘局长关系很好，当去无疑。”我满口答应了，但内心有些胆怯，我提议要老贾（老贾是地下党）陪我去。商会同意了，我和老贾二人去了。二人来到湖坪，先要老贾对龚说话。龚与他通了暗号。于是，龚剑

平率领100余人，来到坪中，他们个个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一样。我对他说：“你们辛苦了，我受大家的委托，前来迎接你们入城。”他抓住我的手说：“你干的很好，进城我俩再喝几杯。”我俩都笑了。我对他说：“你把队伍集成两路纵队，我和你走在最前面，老贾跟着我，大队伍在老贾后面，若遇异情，你开枪先将我打死！”龚见我说话诚恳，向老贾暗示一眼，老贾点点头。就这样按照我的意见安全地进入市区。战士们在商会街中整队就地休息，我和龚大队长进入商会，龚一眼见到商会礼堂悬挂有孙中山和蒋介石的画像，即令人将蒋的画像扯了下来，他向战士们要来了一张毛主席的画像（记得是戴八角帽的），亲手挂上去，随后商会负责人和我给战士们散发了慰问品，还在商会办了19桌酒饭，请战士们会餐，同时在礼堂里办了4桌，我和龚剑平同桌，各喝了一瓶泸州大曲，直到下午5点方才散席。我高兴地说：“我庆幸自己没被风浪吞没。”他向我投以赞许的目光：“祝贺你呀！”紧握我的双手，二人大笑。

1949年7月26日，四十九军进驻津市，高丕新陪同军事代表到国税局，给我带来猪肉5斤，白面10斤，小米5斤，说是给我的慰问礼品。我当即将国税局的请况向他作了汇报，他叫我召集全局干部职工大会，会上他给大家讲了话，其大意是：大家要安心工作，争取留用，仍照旧征税，只是改用人民币。不久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税务局重新组阁，李谦、王庸之分别任正副局长。这时我才正式办交手续，计交现金16000元，已征未收税款24000元（光洋），此款经人民政府下令，十天全部收清。政府本要我到常德专署学习之后留用，因爱人要生小孩，放弃了良机。尔后由高丕新同志介绍到长沙湖南省茶叶公司参加了工作。当我用颤抖的双手捧起人民政府发给月薪时，泪水夺眶而出，我自语道：“终于冲出了漩涡。”（周保林 整理）

回忆在北平草岚子监狱

扶 屏* 口述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定为“六十一个叛徒”之一。其实，我没有叛变。

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仅仅是因为革命，与一些共产党员一起被抓进了北平草岚子监狱，坐了三年零七个月的班房。

入 狱

1930年古历正月，我刚满20岁，离开长沙省立第一中学，去到北平求学。

是年上半年，在国立北京大学读旁听。下半年，才考入北平私立今是学校高中部就读，于1932年上学期毕业。同年下学期，考入北平私立中国大学经济系。

由于1927年我在家乡参加过农民运动，打“暴徒”时，曾躲到长沙，在以李达为教务长的国共合作办的省党校学习过，深敬李达教授。在中国大学打听到李达教授正在北平大学任教。我毅然去到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听名教授李达、陈豹隐讲授的社会科学。而在中国大学则成了个只缴费的挂名学生。

* 此文根据扶屏同志的回忆整理而成。

连住我也搬到靠近北平大学的李阁老胡同去了。

在北平大学法学院，深受李达教授的影响，我靠拢了四川籍学生符亚衡等进步同学。并由符亚衡介绍，加入了中共北方局地下党在北平学校中的外围组织之一——北平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研究会。

1933年4月下旬，符亚衡同学以北平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研究会名义，交给我中共河北省委印制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传单千份，叫我在节日前到市上散发。我作为“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会”会员，接受了任务。乃于一个灯火辉煌的晚上，前往北平市闹市区的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门口，在来往行人密切时，将传单散发。后，隐入东安市场的书摊上，去翻阅和购买书报刊物。

由于自己不机警，散发传单后没有即时离开现场，避开正在满街巡视的“狼犬”。突然，一个便衣侦探，手持正是我刚散发的数十份传单，怒冲冲地冲到我的面前，问是不是我散发的？不等我回答，他就对我进行搜身。且又从我身上搜出了数十份散发未了的同样传单。我无法辩解，只得当场承认，我一承认，那个便衣“国特”，立即吹了一声口哨，马上从四周涌来十几个特务警察，将我捕住捆绑，用汽车押往王府井一个警察派出所。几小时后，又转解北平市公安局。在局里，只简单地问了一下口供。我的供词，除将姓名、年龄照实供认之外，其余只说我是中国大学的一个学生。对住处，不敢实供，深怕因我累及与我有密切来往的好友符亚衡，以及当时在北平汇文中学高中部就读的进步学生——湖南桂东籍的小同乡邓力群。因为我们住在一起。

在北平市公安局关了约四、五天后，又将我转解至北平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拘留所监禁。所中一些早受拘留的有经验的老难友，晓得了我被捕入狱的情况后，关心地告诉我：象你这样

的案子，不须去硬充好汉。可改供是他人所散发的传单。自己只不过是街上拾得了几张放在身上罢了。如此便可减轻判刑。听了难友的话后，在拘留所对我再进行的两次审讯中，我改供说传单不是自己散发的，而是在街上拾得的，是侦探警察硬要说成是我散发的，在屈打成招的情况下，不得已才承认的。

但是，口供改与不改，承认与不承认散发了传单，都是一样，被抓了就没有好下场。北平市军事委员会拘留所，拘留了我两个月后，国民党当局照样判了我二年半时间的徒刑，投入北平市草岚子胡同军人反省院进行监禁。实实在在坐了三年零七个月班房。后来，在党的营救下，才得出狱，恢复自由。

囚 徒

草岚子监狱，是1931年奉军搞的。原名称“奉军陆海空军司令部行营军法处草岚子胡同监狱”，受东北军控制。成立后不久，改名叫“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也还是监狱。我们就是在这个“反省院”里过囚徒生活的。

这所监狱，地处北平北海道附近，在北平图书馆后面的一个小胡同中。铁窗林立，电网密布，警卫森严，俨同人间地狱。

狱内分南、北两廊，中间有一条走道。东边大院是单人监房，住的是所谓“重要犯”，西边靠后院，是住四人或三人一间的大房，住的是所谓“次要犯”。我初进监狱，仅因放发传单一事被捕，被列为“次要犯”，关在北廊四人一间的号房里。直到出狱，一直被关在北廊。不过，在一个号房里关了几个月之后，监狱管理人员就要将犯人重新分调一次房号。

监内，除放风时间外，牢门日夜落锁，钥匙由看守管带。

监房后面装有小铁柱的铁窗，并密布铁丝网。房中有一土炕作为床铺。

新犯人一进监狱，看守立即就在犯人双脚上钉上一副四、五斤重的大铁镣，铿锵沉重，挂得双脚鲜血淋漓，行走艰难。难友们通过不断的斗争，才争得一个月洗洗澡的机会。洗澡时，才可开镣。浴后，仍要再钉上。时至今日，我的双脚，因气候变化，伤口又痛起来时，当年脚带重镣，遭受种种磨难的惨境，就会浮现在我的恶梦中。

我们每天吃两餐，吃的都是虫比饭还大得多的发霉米饭，砂子、稗子极多，饭色黑黄，煮而不蒸。这样的饭，加上几片盐萝卜，就算一餐。难友们在牢中虽很饥饿，但总咽不下肚。尤其是北方人，更吃不下这等伙食。日子久了，由于严重缺乏营养，个个面黄肌瘦，无一人不得胃病。

在四周密布铁丝网，厚墙高筑，插翅难飞的后院，便是犯人放风的地方。每天三餐饭后，便对犯人放风。犯人有半小时至一小时的时间，去那块小天地里走动散步、喝开水和解大、小便。其他时间，坐在号房中的犯人要方便时，则只能由管钥匙的看守，打开门后，才得到南廊小便处小解。

狱中，总共约有30间号房。我入狱时，监押在狱的难友有百人左右，分押在南、北廊两侧。日夜有持枪的看守分班轮流不停地走动于走廊过道中，不断从每间牢门上方的小四方洞中，窥视监察犯人在房中的一切举动。他们都是满脸横肉、怒目而视我们。日子久了，通过狱中的秘密组织作了工作，看守中的多数人才会和我们聊聊天。

因我们坐的班房号称“反省院”，犯人在学习上就受到更严格的控制。一是严格限制我们看书报，规定我们只准看于反动统治无碍的老古文和作教科书用的英文、数学之类的书籍，有关时事和政治理论的书报，则无论其内容是进步的还是反动

的，一律不准我们看阅，妄图封锁消息，使犯人看不清时局的发展变化。连内容反动的报刊，也深怕犯人阅后从反面识破“庐山真面目”。二是继承“草岚子监狱”刚创立时，以天主教牧师进行说教的衣钵，给在押犯人每人散发一份《太上感应篇》，企图让囚犯从愚昧中麻醉自己，消磨斗志，收到“反省”效果。三是一月一次在饭厅上大课，请些所谓社会“名流”来监狱上大课，讲什么《大学》、《中庸》、《三民主义》以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什么“八德”教育，等等，妄图使囚徒改变信仰和意志。每次讲课后，还要求犯人写心得、体会，发表反共文章。企图以此来达到关押我们这批人的最终目的。

本来囚徒就是囚徒，为什么把囚徒生活说成是“反省”呢？“反省”是1931年底南京军委派改训处长刘建群来北平搞的。刘提出，对待政治犯，来了硬的后要来软的，来了软的后又要来硬的，只有软硬兼施，才能使其归顺。他把对待犯人肉体上的摧残、精神上的折磨和思想上的毒害，以及严格限制和不断灌输反动思想溶为一体，称之为“反省”。并规定犯人以六个月为一个“反省期”。一期不行搞两期，三期还不“反省”者，则严加处分甚至枪决。在“反省”期内，除要犯人写反共文章发表外，还采用授意犯人的亲友写信或探监诱降等办法。但总达不到目的，他们又想出了一个极其简便的妙计：他们事先草拟并铅印好一个“反共启事”，只要求犯人在上面捺个手印，即可出狱。并规定，凡刑期已满的，其必须履行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的手续，才准出狱。否则，就继续留在狱中受折磨。个别贪生怕死和有背景的人，不等刑满，主动去请求捺了手印，就出了狱。

敌人这软的一招，确实毒辣。原来狱中关禁过四百余囚徒，除极少数是因病保外就医和极个别无条件释放外，不少人

都是捺手印出狱的。等到我入狱的1933年，全监只剩下一百来人，在继续坚持顽强的斗争。这是狱中斗争最艰苦的时期。

斗 争

在困境中，狱中党支部带领拒捺手印的共产党员和全监难友，与敌人展开了坚决斗争。

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又是一名刚刚进监的新囚徒。狱中的党组织在敌人鼻子底下活动，一切都是绝对秘密的。我当初根本就不知道监狱里也有共产党支部，更不知道党在狱中活动的底细。但在长时间的斗争中，我明白了，狱中有一个秘密组织在带领我们和敌人作殊死斗争。我们这些因追求进步而遭迫害的青年，都自觉地团结在这个秘密组织周围，积极投入了在狱中的一切斗争。虽然没有那个从嘴里讲出来，但大家都心照不宣，这个秘密组织就是共产党在狱中的支部。我们也不称它为党支部，就习惯地叫它为“秘密组织”。囚徒中的活跃分子，如黄建纯、张永璞（薄一波的化名）、徐子文（安子文的化名）、杨仲仁（杨献珍的化名）等，经常代表全体难友和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也经常指导难友们怎样去和敌人斗争，无形中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领袖。实际上，他们都是这个秘密组织的领头人。

为了粉碎敌人实施的“反省”美梦，这些领袖人物，串通全监难友，进行了坚决的反“反省”斗争。组织狱中秘密读书会，让难友们不断进行自我教育，提高觉悟，坚定革命信念。难友们一直坚持两年多时间的集体学习，就是狱中坚决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

要学习，需要资料。张永璞、徐子文等亲自向看守活动，打通关系。那些看守，把这看成是生财之道，很乐意地就从外

面把我们需要的报纸、刊物买好，偷偷地运入狱来交给我们。使我们不但可以在当天或隔天看到当时北平在国内发行的而当局不准难友们看的《世界日报》、《天津大公报》等报纸；而且，连他们所忌、当时在市面上也很不易购得的由邹韬奋主编、上海出版的、只能半公开出售的《生活周刊》，也能及时看到；甚至禁止国内发行的，连他们自己都不能公开阅读的、莫斯科出版的俄文版共产党刊物《国际周刊》也偷运到狱中，供大家学习了。

这些刊物本来价格昂贵，要经过几手才能转到狱中来，就更贵了。每月定价1元2角钱一份的报纸，我们要花5元或6元钱一份才能弄到手。大家为了学习，都自愿合力出钱。那时我堂兄扶盛周每月从武汉汇10元款子至北平邓力群处，转交我在狱中食用。狱中开展学习后，我立即写了封密信，托张永璞打通看守，密交邓力群。嘱其按月以一半为我购置衣物、食品等，公开送入狱中，供我日常用度；另一半，则嘱其交来人秘密带归，交张永璞供狱中作秘密组织的活动经费。其他难友，也都主动地采用各种办法积极筹钱。这样，狱中秘密组织自己有了—笔可观的款项，不但可用高价去购买大批书报刊物文件，维持难友们的持久学习，而且还经常买些鱼肝油、蛋品之类，为病友补充营养；还给些钱救济那些经济贫困的难友，把全监囚徒紧紧团结在一起，再也不必完全依赖狱外地下党给狱中经济救济了。

狱中的学习，是在秘密组织缜密的统一安排下进行的。规定：大家都能看懂的中文版的《世界日报》、《天津大公报》和《生活周刊》等，偷运入来后，立即分散到各监号，轮流在单人号房传阅，在多人号房内，则由一人低声读给大家听；对外文版的《国际周刊》，及其他有关革命理论的外文书刊，则由杨仲仁带领一批精通外文的可靠难友，先行秘密翻译，译出来

后，再送到各号房传阅或传读。我记得，当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里，我们看到过的译本有列宁主义问题、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半月刊、国际通讯、布尔什维克等等，不下几十本。我还看到过《布尔什维克能否维持政权》、《马克思学说》、《社会主义与战争》等译书。

杨仲仁擅长俄文、英文和法文，中文也很好，能写一笔好字，他用手抄的办法，主编出版过一个监狱刊物。在这个刊物上，他经常撰写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指导性文章，以及一些有关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性文章，给全监难友传阅或传读，对大家进行自我教育启发很大。

因此，我们在狱中的学习内容非常丰富。为了学习的顺利进行，秘密组织还制订了严格的保密制度和谨慎的学习办法：规定狱中一切学习资料，都属秘密文件，在单人号房，只阅不读；在多人号房，只能由一人低声读，而不再传阅。学习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时刻严防看守巡监。对那些早已打通关系的看守倒无所谓，因为他们早已从中得到过好处，如果东窗事发，必须牵连到他们自身。当然，我们也会注意保护这些人，这些人万一发现了我们在学习，也会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但对那些还未打通关系的和新来的看班看守，以及那些死硬的狗特务，如果被他们发现，必然凶多吉少，惹来麻烦，后果不堪设想。为谨慎起见，我们在学习时，人人都高度注意，严格谨防让任何看守发现。全监统一规定暗号：用举起拳头，表示有人来了，把拳伸直成掌，用五指以示来人走了；以屈着的指头连续敲壁，通知住在隔壁的难友，有人来了，用拳头在壁上重捶，用夯声告知隔壁，来人走了。每次集体学习一开始，住单人房的“重要犯”就负责站岗，站在炕上盯住前院。正在学习的人，一收到有人来查监的暗号，立即迅速收起正在阅读的书刊文件，在面前摆出准许读的课本、旧书装样子。待查监人一

走，又把那些秘密资料拿出来，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

我们除了白天学习，夜晚九时熄灯以前，还要进行小组讨论。多人号房，由秘密组织指定了一人作学习讨论小组组长。小组长根据秘密组织草拟的讨论大纲，每次学习后都要负责组织讨论发言。并将难友们在讨论时提出来的各种问题，交上去集中综合，上面作出结论后，再带回来，交难友们传阅或传读。住单人号房的“重要犯”，既不能参加白天的集体学习，也不能参加夜里的集体讨论。但他们的政治水平较高，他们首先自己单独认真学习，独立思考，再负责精心指导全监的学习。他们抓住日间的两次放风时机，在后院喝水散步时，边走边谈，互相交换对有关学习的意见，统一认识。并将各组提出的疑难问题和重大问题，作出结论，答复难友们。还拟定出下次的讨论提纲。

有了这样的学习，我们这些囚徒头脑中充实多了，在暗无天日的班房里，知道外面的东西也多起来了。从《世界日报》、《大公报》等报纸上，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行程，看到了红军到达陕北后又打入晋西，将要接近华北抗日前线等军事活动；从《生活周刊》等刊物上，看到了国内抗日民众运动风起云涌；读《国际周刊》等理论书刊，更使我们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特别是明白了我们为什么坐班房，应该怎样坐班房。看到了革命的前途和方向，学会了与敌斗争的许多方法。后来好多难友都说，坐了几年班房，胜似进了几年大学堂。

我们边学习边和敌人展开坚决的持久的斗争。在斗争中，黄建纯、张永璞、徐子文、杨仲仁等不浮众望，总是站在最前列，充当全监难友的代表。在平时，他们乐意当秘密组织指定的发言人，由他们当中的一人或二人，经常在饭厅里餐后代表大家把有关伙食、下镣、看报、接见、写信以及洗澡、理发等

RESEARCH

1

不敢象过去那样当场拒绝，而诱称说，须呈请北平军委会主任批复后，才能实行。

在斗争的过程中，秘密组织在囚徒内部也做了大量工作，对动摇份子，耐心地教育他们，长期地争取他们，更多的鼓励他们，向他们指出革命的前途，反动派的脆弱，使他们坚强起来。对看法不一，认识模糊的人，就通过再学习，引导他们，统一认识；对极少数的反对派，自愿去履行反省手续，贪生怕死要出狱的人，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是毫不含糊的。从政治给予坚决的打击，生活上也与其严格分开。与他们同住一室也“老死不相往来”，谁都不屑与这种人为伍，处处严防和打击这种人的出卖活动。

我们的学习、斗争，使敌人非常害怕，想尽办法来对付我们。尤其在我们进行绝食以后，敌人派出宪兵三团打入狱中，把一直站在斗争最前列的数十名“重要犯”，更为严密地监视了起来，不许他们和其他人见面，还扬言要进行屠杀。但这些经过斗争考验的坚强战士，一眼就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死就死，视死如归。根本不理敌人的这一套。他们紧紧地团结在秘密组织周围，和全监难友一道，更巧妙地组织学习，更坚决地和敌人斗争。敌人也毫无办法，结果，宪兵三团也只好被迫南开了。

到1936年春，狱中剩下七、八十名难友，团结得象一块钢铁般的坚强，一个个都始终坚持不悔过、不反省，不反共、不履行出狱手续。秘密组织在狱中的威信越来越高，群众和党员，一切都听秘密组织的。当时，我们当中有二、三十人不是共产党员，经过学习，却表现得非常坚强。其中有几位难友刑期已满，监狱当局要他们履行反共手续后，取保出狱。他们就是坚持不履行手续，去过那没有政治灵魂的行尸走肉生活。宁愿继续留在“狗洞”里，和大家一起学习、战斗，不怕把班房底坐穿。我自己原来也只被判了二年半刑，刑期满后，监狱当

局曾找我谈过五次，要我履行手续出狱。每次都遭到我坚决拒绝，被打回监房。并定我“是个冥顽不灵的人”，一直坐牢坐到三年零七月后，才在组织的营救下，和大家一起出狱。

出 狱

正当我们处在“宁死狱中，亦不反省”的斗争热潮中，正当我们狱中的反反省斗争取得节节胜利的重要时刻，于1937年7月，有消息传到狱中：说狱外地下党允许我们办反共手续，登反共声明出狱。

这消息太突然了，大家对此都感到惊愕。秘密组织当时对此事没有进行传达。但因事关重大，且与两年来狱中的学习、斗争精神不符。大家在暗中还是议论开了：多数人认为狱外地下党根本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怀疑是国民党、托派在捣鬼、设圈套、耍新花招，妄图引诱难友们投降。因此，谁也没有去履行出狱手续。大家一致坚持“红旗出狱”主张。

过了一个多月后，监狱内又传说狱外地下党又来了指示，确实同意和批准了我们办手续出狱。还说外面形势紧张，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需要大批干部参加工作，不必再留在狱中。有人还根据当时报纸所载分析：《何梅协定》签订后，日寇会很快占领平、津，华北政权也将汉奸化。如不及时出狱，难友们就有全部被杀害的危险……

正当众说纷纭的时候，狱中秘密组织这次按组织系统，将中央的决定作了正式传达。说党完全相信我们这批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坚强战士。办手续出狱后，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由中央负责。如果狱中再不执行，反而要犯更大的错误。并布置在放风散步时，和多人号房的学习小组会上，都要进行讨论。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明确表个态。这场讨论确实很热烈，各种意见

都谈了出来。最后还是统一了看法：服从组织决定。

但是，大家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在不反共的前提下，可以同意集体出狱。后经黄建纯、张永璞、徐子文等，向监狱管理当局，用口头提出了大家的要求。管理当局答称：这要求须经北平军事委员会最高当权批准后，才可办到。而他们只可以转请。事过十天后，管理当局再次把黄、张、徐等找去谈话，宣称军委已批准集体出狱，而出狱手续还是要办。不过，可以用集体签名的方法办理。而且，在声明书上已不再骂“共匪”，而改为“共党”了。

1936年9月间，在一份铅印好的《声明书》上，黄建纯、张永璞、徐子文等，已经签了名。我看后也在上面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过后不几天，监狱当局把我们集中在饭厅里，作了一次“训话”。还请来了军管会的一个“代表”致“训辞”，要我们什么“自后痛改前非，不再误入歧途”，什么要“接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为国出力”云云。当场还发给每人一份《准许出狱证》，上面用教训式的口吻，印上了与《声明书》差不多的内容。大家走出饭厅后，在中间大院里还照了一张相。

回号房还住了几天，才正式释放我们出狱。这一批出狱的一共59位难友。其他难友后来也分别出了狱。

出狱后，国民党对我们还很不放心。将我们的出狱《声明书》和59人的姓名，在北平版的《华北日报》上，全登了出来。

难友们一出狱，就象飞出囚笼的鸟，海阔天空，一下子就投向大自然去找各自的归宿了。特别是那些被囚禁的共产党员们，出狱后，积极地与组织上接上关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前线，与敌人浴血奋战，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新篇章。

我由于在狱中受到非人的折磨，身体垮了，兼患有久治不愈的风湿病，行走极其不便。出狱后，回家养了一年多时间的

病。于1939年初，经新四军驻桂东沙田办事处主任顾星奎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共桂东地下党，为党为抗日战争做了些应做的工作。后因时局的变化，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又走了一段坎坷不平的路程，直至1949年5月，才又加入我党领导的湘南地下武装，为解放战争出力。

（方楠 整理）

零陵大火前前后后

陈雁谷*

1951年元宵节（二月二十日），零陵县城区党、政、军、民各界七千余人，在县中大操场举行抗美援朝、拥军优属军民联欢大会。会后游行。下午一点钟，游行队伍正敲锣打鼓，沉浸在欢度佳节喜庆中，突然解放北路鼓楼街端和祥店冒烟起火。接着吉州小学、省立医院、府政街、外河街等处相继起火。由于零陵街道多系木板房，加上当天大刮南风，熊熊烈火一直烧到下午五时，火势才在我军政民共同奋力拼搏下，基本扑灭。事后调查，此次大火焚毁房屋512栋计1033间，烧死3人，烧伤16人，受灾户口632户，占全城户口的七分之一，受灾人口为2111人，占全城人口的十分之一。损失约达159亿元。

反革命匪特有计划地纵火，造成零陵如此巨大的火灾事件，它给全国人民敲响了革命警钟，也使全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是非常英明、非常及时；并表示坚决贯彻执行《条例》，积极投入“镇反”运动斗争中来。

匪特活动

（一）阴谋烧城

建国后，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都以主人翁的姿态，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奔向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自己应有

* 陈雁谷，当时任零陵文化馆馆长。

的力量。可是躲藏在阴暗 角落里的反革命分子，却在咬牙切齿，与人民为敌，一有时机，就蠢蠢欲动。放火匪特黄建中是反共救国委员会成员，受广西××领导。周静是救生救国队分子。刘显达为湘鄂赣黔边区反共救国军成员。祝松林在解放前任空军总司令部电台台长，潜来零陵开设裕民拍买行，为华南自卫救国军区直属湖南情报联络总站零陵分站负责人，受台湾领导。张景星是湘桂粤黔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的首要分子。这些反动组织原来各行其是，到1950年农历十一月，他们才由张景星串连起来，统一行动的。由于张景星是原国民党零陵县党部的书记长，他不仅是当地反革命的头面人物，而且他还有一个当地的反动势力班子。如王养吾是县商会主席、三青团商业界区队长， 欧阳绍唐是国民党县监委， 屈仲衡是县三青团干事，周静是县妇女理事长、三青团区队长。1951年1月19日，张景星召集王养吾、黄建中、周静、王诗来等人在张家开了一个所谓宣传“保家园、防土匪”为名的会议，密商火烧零陵城的纵火计划，并派匪徒王诗来置办纵火用品，拟于1951年元旦春节行动。后因准备工作没赶上来，未果。

1951年元宵节前一天，张景星再度召集匪特王养吾、欧阳绍唐、唐玉钦、李纯、唐放仔等在朝阳洞开会，阴谋乘元宵节晚上，以耍龙灯为掩护，在城内放火。元宵节那天，恰巧天晴刮大风，又值我军民集会游行，他们临时改变计划，在是日下午一时开始行动。匪特乘我不备，先从城北纵火，烧主要领导机关和仓库，再烧城南，如是全城即可付之一炬。现象说明：纵火是从鼓楼街开始，左经道司岭、外河街，向潇湘门粮食仓库延伸，右经人民医院、府政街，向百货大楼延伸。这样形成一把势不可挡的火焰钳，使我县政府、地委会、专员公署等领导机关和价值十亿元的地直粮食仓库，腹背遭火，毁于一旦。可是匪特的企图并未得逞，他们的行动恰恰是在自投罗网，自取灭亡。

（二）连放九把火

匪特的企图虽未得逞，但他们的反革命行动，却是十分狡猾、恶毒的。他们为了在光天化日之下，多处纵火，不被我们发觉，其放火工具，除火柴、汽油、纸煤子外，还有一种燃烧球。2月中旬河西杨梓塘庄家园王诗来，受匪特头头指使，自制一种易于燃烧的球砣。2月11日，王诗来要唐松柏在小西门炮响铺买回半斤硫磺，王本人买了半斤松烛，第二天在河西潘家岭茶山里用锅子把硫磺、松烛熔化制成潘砣。圆砣只有鸡蛋那么大小，中心含有引火线，便于携带，易于点火，把它引燃任意打在木板上或墙上，都可就地爆发火点燃烧起来。

我们联欢大会是在十二点钟开始游行的。当时，我任零陵文化馆馆长职，被选为零陵城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委员会的主任兼秘书股长，所以这次大会是我在台上主持。为了游行队伍按照大会布置的路线和单位顺序号码井然有序地游行，我丢掉台上手里的喇叭，跑到会场门口，严格控制单位号码出场。就在这时，吉州小学校长黄建中，还在队伍中向我哈要点头微笑。谁知道他游行到鼓楼街又一村，以小学生扛不起大旗，代为寄放大旗作借口，走出行列，爬到吉州小学二楼，将一瓶煤油浇在办公桌上放火。原零陵地区人民医院护士长周静（女）在医院大楼放火后，又到机器房放火，企图烧死200多名抗美援朝伤战员。张景星、王养吾等在潘放后受到政府管制，可是狡猾的敌人，竟把我们的管制，变成他们翘翘行为的合法掩护。如张景星居然在那杀气腾腾地放火烧城的前一天，还佯装低头，向我公安机关汇报他当天的思想和行动情况。

鼓楼街一冒烟起火，走在临近的游行队伍，马上投入灭火

战斗，可是他们还没来得及冲向火场，附近的吉州小学楼上又冒出烟来，接着人民医院、道司岭街多处着火冒烟。长长的游行队伍，竟被一时的起火点断成数截，游行队伍里的壮男健女，个个在与大火搏斗。走在队伍前端的扛大旗的地区文艺宣传队，他们望到西南天空冒上来的几处火烟，连忙偃旗息鼓，从北门街急速返回，向他们的宿舍所在地外河街奔去，谁知还没到达宿舍，宿舍的斜对面又冒出了一股浓烟。他们立即扑上前去灭火。半小时后，火势虽被控制，外河街得以幸存，但几家民房业已化为灰烬。

火，越烧越大，我们军政干部上街救火的人员也越来越多。一时水龙头、面盆、提桶齐上阵，火场也就成为人民与火搏斗的战场。奇怪的是，前面的火被扑灭了，后街又冒出烟来。原来匪特又混入我救火队伍，他们一面装样救火，一面鬼鬼祟祟乘隙钻到民房放火。以致火海战场上的干部、群众和消防队战士，从下午一点钟起一直奋战到下午四点，大火还在此伏彼起，无法控制。

坚决镇压

（一）定计擒敌

火警发生后，我地区领导分析多处起火情况，肯定为特务纵火。当即紧急动员，兵分两路：一是动员零陵分区部队及公安武装，分别在城区布置警戒和巡逻秘察；二因火势延烧甚猛，专署、地委、县府、百货公司及专署直属粮食仓库等处都受到极大威胁，立即动员机关、部队干部及训练班学员，分别警卫机关，搬运物资、档案。

狐狸再狡猾，也躲不过猎人的眼睛。匪特就在我天罗地网

的火海战场上，被我秘察人员当场抓住几个“舌头”。下面是纵火犯艾玉振被抓住后的供词：

我叫艾玉振，男，现年19岁，河西杨梓塘的农民。我上午舞狮子参加县中操坪大会，十二点钟散会后，在小西门分得火药。我这一组是三个人，于下午二时左右，我们在府政街放了一把火。他们说，放一把火五块光洋，我如不干，他们两人就要下我的毒手。我只好随他们走，从府政街经鼓楼街到道司岭猪仔巷下面一个小茅房里，在杉木皮壳上又放了第二把火。沿河走到三多坊，打算去南门放火，先到火神庙的对面角落里烧把火，把住在火神庙的解放军烧死。走到大西门，解放军站了岗，不准过，我们就折回三多坊到兴隆巷。我在兴隆巷转弯处一个厕所里解小便，化了一根火柴，抽了半支香烟，一位老板说：老弟别抽烟！我刚把烟头扔掉地上用脚去踏时，肩膀上猛受一拍，就被抓住，逮到公安局来了！

纵火犯艾玉振被我当场抓获，不但对此次大火性质的分析给以铁的佐证，而且对迅速破案，也带来有利条件。

当匪特混入救火队伍，鱼目混珠，继续作案时，作战指挥部当机立断，定计擒敌。其方案是：一方面封锁火海战地，除在场的消防人员和部分青壮干部持续作战外，其余救火人员，不管是干部还是匪特，一律撤出阵地，集中指定地点受检。另一方面进一步布防，不仅对城门、要道，严加把守，即街头小巷，亦不准通行。这样一来，火势于下午五时，才被我基本控制，混入我救火队伍里的匪特，也一一被擒。

当天晚上，我公安人员根据侦讯线索，即到河西杨梓塘一带逮捕纵火犯9人，第二天拂晓，我们又逮捕放火重点嫌疑犯25人。

(二) 人人称快

为了进一步证实材料，发现更多线索，教育群众，提高警惕，在3月5至6日，分别在医务界、文教界、工商界以及居民特别是灾民群众中，分片召开控诉大会。黄建中、王养吾在控诉会上坦白了部分材料，周静被群众进一步揭发了部分材料。

为了正确结案，保护好人，坚决打击反革命，公安人员在广大人民群众协助下，夜以继日地连续奋战十五天，将人证、物证、时间、地点，对照本人口供，完全证实，由原全案先后逮捕92名中，正式结案确定纵火犯28名，前后释放误捕者52名。3月7日将首犯张景星、王养吾、欧阳绍唐、周静（女）、屈伸衡、唐王钦等22名匪特，分别在工商、文教、政法三个片进行公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当纵火匪特被绑赴南门外沙洲刑场枪决时，沿途居民莫不拍手称快。

为了破获全案搜缴电台、枪枝，有意识地将匪特祝松林，邝光辉，李芝蔴等三名留下继续审讯。唐松柏、艾玉振、李纯等人因坦白主动，对破案有重大贡献，而又确系被人收买的从犯，当场宣布释放，回家生产。

重振家园

(一) 安抚与善后

大火发生后，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有的说：“这是天火。”有的说：“这是人民政府拆城墙，城皇菩萨见了怪。”有的怪人民政府召开联欢大会，招来的大灾，有的还在街上大喊：“冷水滩也被火烧光了。”这些谣言，远因是出于居民封建迷信，近因是匪特造谣，企图以此嫁祸于人民政府，造成社会

上的思想紊乱，藉逃其罪责。根据以上情况，我们既要在社会上辟谣，与匪特展开一种针锋相对的思想战，又要发放物资，及时救灾，使灾民迅速恢复正常生产和生活。为此，在大火的第二天，我们立即建立救灾委员会，由零陵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李秀山同志任主任委员，专、县、区等机关、部队、团体以及各居委会、灾民代表等14人为委员。

救委会第一件工作，就是从机关、部队里调来 250 多个干部，组成一支强大的宣抚队伍，从事宣传安抚活动。通过挨门访问、座谈会、大字报、黑板报、街头宣传等形式，揭露匪特纵火害人的阴谋，并向广大人民群众表明人民政府为人民救灾的决心，以及镇压匪特为灾民报仇的明确态度。这样，转变了群众的看法，提高了群众认识水平。广大群众也就逐渐从埋怨政府，一变为仇视纵火的敌人，进一步靠拢人民政府。在处理匪特纵火案件过程中，我们又有计划有步骤地分别召开行业及居民控诉大会，把参与纵火的活生生的人和事摆在群众面前，藉以激发人民积压已久的义愤。省政府慰问团来到零陵慰问灾民，拨来大米二十万斤作救济粮，召开了座谈会，更给群众尤其是受灾群众一个很大的鼓舞。

救委会另一艰巨任务，就是在物资和生活上给灾民以及及时的救济，使灾民炙手可热地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温暖和实惠，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和安慰。我们为了把这一工作做好，做得及时，在一切尚未就绪的前三天，发动戏院、工会、居委会三个单位组成了十一个救济队，定户包干，每天给灾民送饭、送水，找临时住宿地。除极少数灾民不愿离开原来被烧地点外，其余都得到了暂时安身的住处。我们对物资救济，采取五种形式：一是群众捐助，二是政府拨发救济粮，三是银行贷粮贷款，四是医疗免费，五是平稳物价，优惠灾民。

在募集与发放救灾物资方面，群众自觉捐献衣裤、鞋袜

787件，大米5333斤，现金4900万元。政府发放日常生活用品如铁锅、碗筷、草席等1738件，计用款529万元。其救济粮是省政府下拨大米20万斤，专区与县里的地方粮又划拨50万斤。首先发放七天的安抚粮，以每人每天大米1斤、菜金1千元计，计发给593户，2064人，共发放大米14400斤，菜金2064,000元。通过这七天的安抚救济，灾民们情绪稍定，生活也较正常。我们就在这一基础上，召开灾民大会，提出把救济粮款的发放同重建家园工作结合起来进行，让大家讨论。同时把发放工作交给灾民群众，组织评议小组，根据对象的家底和行业情况，经民主评议进行发放，既使人人都能安居生活，又使各行各业都能得到一定扶持，迅速恢复生产。这样一来，一般居民都能得到500——600斤的口粮，织布、铁铺、磨房等小手工业生产，除领到救济口粮外，还能得到1000斤以上的救济贷粮。在救灾贷粮中因对象家底不同，又分无息和有息两种贷粮。计发无息贷粮8万斤，有息贷粮12万斤，解决他们在盖房和恢复生产上的困难。受灾的四十四户商家，也得到银行2亿2千万元的贷款，使他们迅速恢复营业。灾民中有十九户军烈属，在救济贷粮贷款上也得到优惠供应。当时市场上的木材砖瓦价格上涨，救济会通过政府和交易所规定，凡灾民购买木材，必须按原价出售，又与十多家砖瓦窑协商订约，凡灾民购买砖瓦，以每万瓦由原价800斤米，降为650斤大米出售。在灾民医药费上，我们约定三个诊所，给58个烧伤的灾民和病号，前后施诊159次，药费、手术费免收，由救济款代为开支，计支出20万元。

(二) 安居乐业

灾民得到救济粮款后，忙着购买砖瓦、木材、杉皮，在被烈火烧过的道司岭街废墟上，重新搭起房屋和厂棚。有的购买生产工具，订出建房、生产和营业计划，有的边建房边在空地

摆小摊。他们在重建家园恢复生产、营业活动中，还体现了团结互助精神。如前进街十五组彭芷卿，原来小组评给他 300 斤救济粮，过了一天，他便自动要求只要300斤，把多余的粮拿出来，救济其他贫困户。

由于我们善后救济措施得力，政策对头，六百多户灾民，在三个月内基本上得以安居乐业，在生产、生活轨道上运转正常。由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灾民，大力支持灾区建设，拨出专款，在被烧的废墟上，重画蓝图。不到一年，把昔日坑坑洼洼，污水四溢的旧道司岭街，建成一条长约一华里、两边排着整齐划一铺面的前进街。

三十六年前的匪特，梦想九把火烧掉零陵城，事实告诉我们烧掉的恰恰是匪特自己。而昔日的零陵城，今天的永州市，作为开放旅游城市，已在展翅高飞。

财会人才的摇篮

——记湖南中山财经专科学校

龚业隆*

湖南中山财经专科学校是民革湖南省委主办的一所初具规模从事学历教育的财经专科学校。这所学校是徐行方等同志于1979年2月创办的，曾四次更名，四易主办单位，初创时名“向前职业学校”，由长沙市北站路街道党委领导，首届入校学生2个班，学生105人；1981年更名为“曙东财经专科学校”，由东区教育局领导；1982年更名为“长沙中山财经专科学校”，由民革长沙市委委员会领导；1983年更名为“湖南中山财经专科学校”，由民革湖南省委员会主办。校长周怀久办学多年，因年老多病辞职，保留校长名义，徐行方任代校长，袁征益任副校长。

这所学校现有三年制大专、两年半制中专、一年半制脱产及一年制不脱产班四个层次，设会计、统计、企业管理三个专业。其中专部份于1985年经湖南省教育厅批准成立湖南中山财经职工中等专业学校，招生纳入国家计划，参加全省成人中专招生统考，国家承认其中专学历。

现学校已步入第十二年，1990年下学期在校学生20个班，800人，比初创时，班级增加10倍，学生增加8倍。社会办学以质取胜，该校经过十余年的艰难探索，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努力，逐步发展起来的。

* 龚业隆系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

(一)明确办学指导思想。该校办学的宗旨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又红又专的财会人才。

(二)建立健全领导班子和素质好的工作队伍。学校设校务委员会和校委会常委会，民革湖南省委主委潘基硕同志兼任校委会常委会主委，重大事宜由校常委会讨论决定执行。行政机构在校长领导下设教务、学生、总务三处和教研室、校刊编辑室，现有正、副校长3人，另设分部于长塘里。学校成立了民革支部、中共党支部、共青团工委，团工委下辖12个支部，办学人员绝大多数是离、退休人员，多是从事行政、财经和教育工作多年的同志，政治素质较好，业务能力较强，有10人获得从事会计工作30年荣誉证书。大家怀匹夫之志，存报国之心，不计条件，任劳任怨，把晚年献身于教育事业。

(三)严抓教学质量。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该校为提高教学质量采取了下述措施：

(1)慎选师资。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是教师。该校聘请教师，极为慎重。现已建立了一支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有常任教师和兼任教师63人，其中教授、副教授占40.32%，讲师占45.16%。有15人获得30年教龄荣誉证书，他们对学校怀有深厚的感情，多年来，合作无间。对学生教书育人，循循善诱，受到学生的尊重和欢迎。这支教师队伍是保证教学质量，使教学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力量，是经过长期考验的。

(2)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首位，严格学生管理。现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管理网络。学生处主管思想政治工作。中共、民革、共青团组织与行政合作思想政治工作。1989年起开学时在两周入学教育中进行军训。开设了比较正规的德育课，自

编了德育教材，开展了学雷锋活动。两个班设专职班主任，并发动学生自我教育，协助管理。学生中建立了班委会和班联会，组织各项活动，提高学生认真学习，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严格执行关于学生管理的各项制度和奖惩办法，对优秀学生实行奖学金办法。对违反纪律而又屡教不改的学生根据不同情节予以处分，绝不宽容。考试时指派专人监考，防止舞弊现象，务使考试成绩反映真实的教学效果。

(3) 搞好专业学习，加强教研工作。为了培养学生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学到扎实的会计专业知识，除课堂教学和学术报告外，还举行了书法、珠算等项比赛，使学生适应经济管理和财会工作的需要。为了增强学生体质，开了体育课，坚持课间操，举办了六届运动会，并经常开展体育竞赛。寓教于乐，每年“五一”、“五四”举行全校文艺汇演。各班经常开展文娱活动，以活跃校园生活，更好地学习专业。

教研工作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该校由一位副教授担任教研室主任，积极开展了如下教研活动：①根据国家教委对教学的要求，从实际出发，制订各种学制的教学计划，并认真编写了各科教学大纲，作为教学的准绳，并按照编制教学进度计划，保证教学均衡进行；②开展教学检查，通过现场听课，进行质量跟踪，并广泛听取教师和学生意见，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关于加强行政管理等项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③为加强理论与实践结合，毕业前进行现场或模拟实习，编写了一些科学情景材料，出版了《校刊》12期，以交流经验，辅导学习。1990年8月4日在《团结报》第四版整版出刊了《艰苦的历程，默默的奉献》专刊。

(4) 为保证教学需要，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购置必需的教学及生活设施，如微电脑，收录机、扩音机、风琴、电子琴、课桌椅、床铺等十多万元的教学设备，建立图书室。

(四)各项工作力求制度化、正规化、经常化。该校根据领导部门的要求、社会办学的特点和学校具体情况,制订了学校章程、教学管理、财会、奖惩、福利等31项规章制度,多年来坚持执行,严格检查,做到了经常化。经过实践,证明这些规章制度是切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对提高教育质量起了积极作用。

二

十二载辛勤耕耘,收到了良好社会效益,赢得了荣誉。历年来,委托该校培训的有省、市的纺织、轻工、机械、冶金、煤炭、地质、农业、劳动局等部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昆明军区等百多个单位。由于师资优良,教学严谨,教学效果良好,受到委托培训单位和家长赞扬。1982年长沙市财会人员技术职称统考,全市合格率为31%,该校为54.83%。在校学生龚长宁名列第一;1988年,长沙市成人中专数学会考,该校合格率为100%,获文科第三名;广西梧州地区1983年会计职称考试第一、二、三名都是该校学生;常德市纺织系统职称考试,该校毕业生彭秋英名列第二;1987年起湖南颁发《会计证》和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该校毕(结)业学生获准免试;大专班学生参加高等自学考试,大多能顺利通过,取得合格证。部份学生毕业时因全科通过而取得国家承认学历,有的考取研究生,有的出国深造。

截至1990年上期止,已毕(结)业104个班,学生4052人(与湖南图书馆、长沙市财会学会合办读书班、高等教育自考辅导班等非建制班学生均未计算在内),缓解了“文革”造成的人才奇缺与社会发展需要的矛盾。他们绝大多数已经就业,分布在北京、广西、贵州、浙江、云南、河南、珠海、深圳和湖南各县、市。大专班毕业不包分配,学校也不承担推荐

责任。但该校领导理解学生三载刻苦学习，期望就业的迫切心情，高度关心学生的就业问题，在每届学生毕业前后，都尽心竭力，通过各种途径向各方推荐，还派人到广州、珠海、深圳、海南和本省各市、县联系推荐。学校虽经济困难，却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人力、财力。推荐工作难度虽大，但在有关单位支持和家长配合下，多已走上工作岗位。历届毕业生分布在全国各省市和经济特区，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和重用。在有些单位的计人员中该校毕业生占的比重很大。如湖南纺织系统239人，广西纺织系统41人，中南水电八局41人，湖南制药厂28人，水利水电工程公司30人，长沙毛纺厂共有财会人员34人，其中该校毕业的有28人。初步统计，已被提拔为科以上领导骨干者800余人。在工作实践中，有些单位领导认为其能力不在公办院校毕业生之下，主动报请承认其大专学历。部份获得高级会计师、会计师、经济师等职称；不少人被评为优秀教师、先进会计工作者、厂劳动模范。这些青年当高考落榜之际，徬徨歧路，前途未卜，通过在该校学习后择优推荐，获得理想工作，受到重用。不仅为国家培养了财会人才，社会也增加了安定因素，效益是显著的。

十多年来，民革中央和省、市党政领导对该校高度重视和关心，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李贻骞，已故的省政协主席程星龄和省、市政协、中共省、市委统战部的领导先后到校视察。该校建校十周年纪念会，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刘正同志亲临祝贺，说该校发挥民主党派优势，积极参与教育体制，发展社会办学，是为国家多育人才的好榜样。刘正同志还在1990年9月1日举行的湖南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肯定社会力量办学由于贯彻了群策群力，艰苦创业的方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表彰了中山财经专科学校。

这所学校先后被民革中央，湖南省、长沙市政协，省教育

厅，省、市民革等单位授予先进集体、社会办学先进单位等光荣称号12次，有59人获得先进个人、优秀教师、德育工作先进个人、优委民革党员、省老年精英奖等光荣称号和荣誉。共青团员中一人获得市优秀团干部称号，4人获得市优秀团员称号。

晃县“同善社”的来龙去脉

张朝玉*

晃县“同善社”是1917年由四川省传来的。当时，晃县龙溪口有个叫胡小欧的商人（前清秀才），在贵州经商，无意中结识了四川省长寿县秀才余崇广。余是该县同善社“天恩”。二人谈得投机，便邀请余来龙溪口传道，余欣然应允，随同胡来晃，寓居在万寿宫。余凭着他长期传道的经验，经常出入商界和绅士黄干卿、余朝栋、胡小欧等殷实户之家，同时还广交晃县的文化人士，不断扩大影响，积极宣传“同善社”宗旨，发展道友。是年成立晃县“同善社”，社坛设在万寿宫内。众道友推选胡小欧为“善长”，姚沅丰为“副善长”。

这时，在众道友中有个年仅十七岁的“众生”，叫吴敦明，刚进“初层”，十八岁的上半年进“二层”，下半年进“三层”；十九岁时吴敦明去长沙学药技，同时又受晃县“同善社”的委派去湖南省“同善社”深造。省“同善社”的“顶航”见吴年轻有为，堪称道门后起之秀。几经口试考核，见吴对答如流，颇为高兴，当即晋升吴为“四层天恩”。吴敦明学习结业回到万寿宫传道，一时坛威大振，名扬城乡。

万寿宫原是江西人旅晃的会馆。这时，他们要在会馆内兴办豫章小学，“同善社”才搬到姚家院子魏老发家。后来又从魏家搬至尹福盛家。

“同善社”内，设有众生、天恩、正恩、保恩、正、副善

* 本文系新晃县政协联谊委员会副主任张朝玉根据调查，访问整理而成。

长、顶航、教授等职。每年三月十五日 and 五月十五日烧龙票（一种纸印的符），九月十五日办“龙华会”。这些活动的经费，由众道友捐资，有钱的多出，无钱的少出，不强求规定。

1939年，吴敦明由于传道有功，晋升为“五层正恩”。这年，他到洪江串联，见到该地“同善社”改名为“先觉祠”，回晃后召集众道友讨论，并提议改名。讨论结果，大家一致同意改名为“先觉祠”，并公推杨福田为正祠长，吴敦明为副祠长。同年，湖南省政府发布了保护善堂的布告，他们获得这张护身符后，便积极发展道友，先后发展到120多人，并呈请晃县县政府备案。

1942年，晃县另一“同善社”天恩吴宗尧、秦善人等，利用封建迷信组织，大肆宣扬有“真命天子降世，救苦救难，枪打不响，刀砍不入……”组织3千余人的队伍，在湘黔边境十多个县发动有名的“黔东事变”，震惊了国民党当局。当时，国民党驻芷江宪兵司令谷正伦接二连三地向驻晃的宪兵队、独立团及贵州省玉屏、三穗、岑巩、天柱，镇远等县政府发出清剿命令。闹了将近一年的抗兵，抗款，抗粮的“黔东事变”，由于寡不敌众，弹尽粮绝，终于被国民党军队镇压下去。晃县“先觉祠”组织亦被查封，一切器具和文书材料全被收缴。

这次暴动，吴敦明虽未直接参加，但出了银钱。在吴宗尧举暴动时，他曾乔装步行到贵州省镇远县小青溪镇，想劝阻吴宗尧偃旗息鼓，但为时已晚，湘黔边境的国民党军队及各县都已先后出兵包围攻打吴宗尧的暴动部队。在这十分紧要关头，吴敦明只得只身逃往黔阳等地匿藏，待事态平息后，才悄然回到晃县龙溪口家中，为了掩人耳目，立即登报申明与“先觉祠”脱离关系。从此之后，他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公开活动，但暗地里却仍“打坐”、“念经”，勤苦修炼，没有停止过活动。

1949年上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地渡江南下，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人心惶惶。是年3月吴敦明又召集众道开会，经讨论一致同意他主持的“先觉祠”正式恢复为“同善社”。并决定租用龙溪口姚家院子杨仕汉家楼上楼下两间木房作为敬神打坐、念经的社坛。从此，众道友又早晚聚会于此。他们打坐叫做“渐法”，念经时说：“大劫大难又要到来了。有屋无人住，有路无人走，有饭无人吃，只有敬菩萨才能免遭劫难。”还说：“有穿白衣，戴白帽的真命天子下界，他才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晃县的“同善社”有两种：一种叫乾道，一种叫坤道。乾道全是男信徒，坤道全是女信徒。坤道由“天恩”戴光早、朱玉洁主持，社坛原设在江西会馆，后迁至龙溪口河街。

1952年，晃县人民政府发布《坚决取缔反动会道门活动》的布告，吴敦明在人民政府政策的感召下，召集道友开会，宣布解散。至此，在晃县城乡历时三十五年的“同善社”组织，彻底宣告结束。

对文士员的《近代中国新化邹氏地学与武昌亚新地学社》的订正与补充

邹兴畔

《湖南文史》第38辑中文士员先生写的《近代中国新化邹氏地学与武昌亚新地学社》一文，内容比较丰富，发表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有系统的珍贵史实，深表敬意。但也有些错的地方，因为我是邹代钧嫡系子孙，耳濡目染，更为熟悉，我建议订正以下几点：

1、38辑123页倒数第七行，“因为半尺是根据地来定尺的”，其中“半尺”应改作迈特或米。当时中国地图在测绘上，有一个大问题，即地图上的经纬度数与实际里数不相符，而所译绘西方地图原本，比例有用英、法、俄尺者，杂乱无章，代钧公在伦敦研究地学时，专心潜推度里之差，骤悟以尺量地，尺有差、地亦有差，以地定尺，地有准、尺亦随之而准，以地定尺，是为迈特或米突尺，法国之尺度名。一迈特为四千万分地周子午圈之一，以我国华尺与迈特比，为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万分与四千万分之比，故华之一尺，适等于百万分迈特之三十万零八千六百四十二。代钧公以此率，命西匠制成中国舆地尺，纠正了中国地图度里之差，统一了中国舆地尺。亦当时中国五千年以来，未有之创举。

2、38辑124页顺数第12行，“非特点楚所凭陵”，其中“点”字应改为吴字。这是我弟妹于1984年在美国和加拿大共同寄给我的《邹代钧传》等资料上有：“南皮张文襄公（张之

洞)督雨湖时,具百金为代钧寿,电调至鄂,主修湖北全省地图以兼会典馆差,奏得圣旨俞允,图成,辅之以说明,其论湖北全省形势有曰“武昌、荆州、襄阳,同为湖北重镇,然荆扼江而不能扼汉,襄扼汉而不能扼江,武昌江汉之会,可以制东西之命,可以交南北之冲,非特吴楚所凭陵,实为四方之辐辏,观此则知所轻重矣。文襄赞为卓识伟略,殆过顾宛溪。”

3、38辑125页第一行,时年“55”,应为54岁。代钧生于咸丰四年(1854)甲寅三月二十一日,逝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戊申三月初六,故应为54岁。

4、38辑第126页顺数第12行,“并助代钧堂兄代藩”,其中“兄”字应为弟。代藩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九月二十七日,逝于民国十一年(1922)壬戌十一月初七,是我的十叔祖。撰有历史精义4卷,孝经通义1卷,人学堂文存3卷,诗存2卷,资州日墨1卷等书,是老同盟会员,是谭人凤亲家。谭人凤是受代藩的影响鼓励,才参加辛亥革命的。

5、38辑第129页顺数第11行,“永煊,字煊廷,系代钧之子”,其中“子”字,是大错而特错的了。代钧只有两个儿子,长子安图,字郑伯,无子早丧,其妻于1982年7月19日逝于加拿大多伦多市,终年83岁。次子安众,字郑叔,1946至1949年任汉口交通银行行长,解放前夕迁往香港,1969年8月2日在九龙患脑充血死,葬九龙基督教坟场。安众有两子两女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均系专家和大学教授。我的资料,家无存,均是他们在国外寄给我的。安众第三子邹平仲率妻美国小姐 Linda Beamev博士,于1985年应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邀请,回上海、武汉、四川、云南各大学讲学,于1986年8月返回加拿大多伦多市,仍任加拿大工业大学教授。回国时,要我亲至新化(现隆回县)罗洪乡,重新修建好邹代钧墓碑,高3米,宽2米。不幸于1990年7月3日晚,被盗墓犯挖开,代钧遗

体仍十分完好如生，肤呈黄色，墓内宝玉等文物，均被窃去，并扒去代钩口腔内 4 颗金牙等物，惨不忍睹！

邹焕廷系我族伯，兴钜系我族兄，兴被喊我兴晔叔。

对曾伯贤的《我所知道的 的克强学院》的订正

唐 葆 春

我读了《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0期刊载的曾伯贤同志写的《我所知道的克强学院》一文（以下简称“曾文”），就几处情节与作者商榷如下：

1、“曾文”第66页第1段所称，1945年初，农、工、商三专校师生要求改为独立学院，酝酿一段时间之后，三专师生联合请愿……的问题。据我所知，1944年日寇进犯湖南，6月，长沙、南岳等相继沦陷，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前，农、工、商三专校均已停办，未见有发起改院的事。三专校发起改院有商次：第一次是1942年春，后经教育部于1944年5月核准改为三个独立学院，因日寇侵占南岳，三专停办，改院未能实行；第二次是抗日胜利后三专复校时，1946年春夏之交，师生再次要求改院，恢复教育部原议。是年5月16日到7月6日的《湖南日报》作过12次报道。这次改院运动导致将三专合并，成立克强学院。

2、“曾文”第76页“二、教育行政组织和人事简况”内所称，教务处教务长、总务长……负责人职务名称问题。此时，教务处等三个处的负责人，已不称“长”，改称“主任”，见于1947年5月《克强学院全体教职员一览表》。有时还将训导处主任称为训委会常委。

3、“曾文”第70页第1段所称，教育厅长王凤喈要曾约农把衡阳的本院迁到长沙合并起来，以便控制。曾约农也因“怕乱”，接受王的面谕，决定并院的问题。据我所知，要将衡阳院本部迁长沙，是该院师生的要求，不是王凤喈、曾约农的旨意。1948年，全体教授在索薪运动中，就曾提出：要么按长沙物价指数发薪，要么迁院长沙。同年，学生肖继濂组阁竞选自治会主席时，就把迁院长沙列为竞选政纲第一条。这样，才迫使院方扩大会议作出翌年春迁长沙的决定。1949年1月放寒假后，学生和教职员分别在长沙成立“促进迁建委员会”和“迁建委员会”。3月21日，省政府主席程潜召见教授理监事会代表时，当面同意迁长上课。次日，省政府批准曾约农辞职，旋由代理院长廖训渠筹划在长开学时，王凤喈还曾以×××令反对迁长，要院方本期仍在衡阳上课，导致学生进驻教育厅，王凤喈辞职，由程潜兼任院长，该院才于5月上旬在长沙开学。

同时原在长沙分院上课的工科学生于1949年1月都已毕业离院，长沙分院随之撤销，乃另设长沙办事处，陶伯愷任主任。因此，衡阳院本部迁长沙是事实，但不存在“1948年到1949年元月，衡阳的克强学院全部迁到长沙稻谷仓与分院合并了。”的问题。

4“曾文”第70页第2段所称，学生会理事长肖继濂慢条斯理，已不适应需要。中共地下党决定从金陵大学调高继青来到克强的问题。当时学生自治会每学期改选一次。肖是1948年下学期组阁竞选获胜上任的，但1949年上期未参加竞选，故未继续任理事长，并非“曾文”所述原因。高继青对学运作出了很大贡献，直到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受到人民崇敬，但非中共党员。他到克强学院是自己要求转学的，也非“曾文”所述原因。

5、“曾文”第72页第1段所称，王况裴为民社党的问题。王况裴是湖南青年党组织的执行委员，不是民社党成员。

